

FUDAN 復旦人 FUDAN TRIBBLE

2019年10月 总第33期

复旦“第七教学楼”的 二十年青春接力

家国志 卿云梦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19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



点亮一本书的生命

图书馆发展基金

亲爱的校友，您是否想过有一天，当您漫步于图书馆，翻开一本犹带墨香的新书，在洁净的扉页上，看到您的姓名？您是否想过，小小的一份爱心，将会为一本书的生命点亮不一样的光彩？

从2014年6月开始，您向“图书馆发展基金”捐出100元，即意味着图书馆将收藏一本只为您一人永久纪念的书。认领随书永久有效，伴着这册书的流通、借阅、品读、珍藏，您都将是自始至终、独一无二的见证者，点亮这册书荣耀的生命。

截至2018年底，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纸本文献资源约559.9万册，并以每年10万册的新书量丰富扩充。2018年图书馆迎来了百年馆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描绘宏伟的新蓝图，“图书馆发展基金”更需要校友们的点滴支持。

对于每一位参与“点亮一本书的生命”的校友，我们都将在为您匹配的书的扉页上盖上“鸣谢专用章”，标注您的院系、年级、姓名，让每一位读者都感受到您对图书馆事业的真诚与爱心。

捐赠办法

扫码捐赠：



银行转账：

人民币 (RMB) 银行转账
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帐号：4572 5923 3986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复旦大学支行
网点联行号：104-2900-0505-3

美元 (USD) 银行转账
Tax ID: 98-0483202
Account Name: Fudan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686 718 995
Bank's Name: Chase Bank
ABA Number: 021000021
Bank's Swift Code: CHASUS33

港币 (HKD) 银行转账
Account Name: Fudan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012-875-1-134176-5 (港币)
012-875-9-232765-0 (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Bank's Name: BANK OF CHINA(HONG KONG) LIMITED
Bank's Swift Code: BKCH HK HH
请注明”姓名+手机+捐赠项目”

现场捐赠：

请至复旦大学（邯郸路220号）一号楼117室办理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3:30-17:00
联系电话：021-55664929/55664307

卷首语

读完新一期《复旦人》清样，最先让我有说话冲动的是《张胜友：大时代的阐述者》专辑里的两篇文章，都是纪念校友张胜友。胜友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复旦中文7711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后来担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务，但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数量不小的报告文学和电视政论片。胜友是从思想解放运动中走上写作道路的，纵观他一生的创作，贴近时代主旋律，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歌颂改革开放，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立场。记得1978年早春刚进校的时候，胜友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作家，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一本叫做《闽西石榴红》的散文集，到处送人，接着又积极投入学生社团春笋社的组建，编写《大学生圆舞曲》，还参加区人民代表的竞选……精力过人，我们年轻一点的学生都有点羡慕他。他看上去长得老相，也比较成熟，但是内心却有一团火在燃烧。毕业北上，他站位越来越高，人也越来越有活力，真可惜天不假年，正在大有可为的壮年撒手西去。感谢编辑部及时登载了两篇文章，把胜友的充沛生命力永远定格在“复旦人”的心目里。

由张胜友说开去，本期刊物编得文气浓郁。张力奋教授在申报馆筹办的复旦诗人手稿展，别开生面地重筑了一场1980年代青春与诗歌的春梦。无独有偶，复旦诗社的首任社长许德民校友同时把大量珍藏的诗歌手稿、诗社文献无偿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之，文科图书馆大堂举办了许德民诗歌、绘画艺术展。两个展览遥相呼应，文星闪烁。诗歌啊，那是复旦大学校友们的精神高地，也是复旦精神传统的一脉，正如艾可校友所吟唱：*白发繁星 / 当年校园诗人的光环……*

难以忘怀的不仅仅浪漫诗歌，还有许许多多脚踏实地在工作岗位上流淌的汗水和不平凡的业绩。本期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也是复旦建校114周年庆典，逢“9”值年的五届校友3000多人携眷返校，欢聚一堂。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复旦新生70年，复旦大学的发展与新中国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大师云集、名流蜂拥、学科腾飞，都发生在1949年以后的岁月。本期所载的复旦校友在各自岗位上奋力拼搏的感人故事，都是与祖国建设和道德发展紧密相连的小插曲。校友季昕华说：“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可能成为撬动时代前进的支点。”由此他开启了云计算的梦想。张东辉说：“做科研是很费时费力的，只有热爱，才能不在乎其中所经历的艰苦。”就是凭着这一份对专业的深深热爱，他攀登了化学反应动力学的高峰。柴国生说他一生只发明了三只灯泡：一只白炽灯泡，一只节能荧光灯泡，还有一只LED灯泡，他“很骄傲能够把知识用到了产品的生产、科研的发展上，为国家、社会的环保做出贡献。”我更欣赏的是像王伟叶那样，从名校出来，回归基础教育，深深扎根到一所中学，安心培养下一代的数学人才。他说：“我对成绩不是特别地看重，只是希望能教给学生们发现数学之美的能力。”他说的何等好啊，这才是复旦所谓“无用而自由”的精神内核，“无用”即破除社会功利心，而唯有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是把美好的人类理想推向极致。我之所以要把这些话一一抄录，就是因为这都是复旦人说的话，值得我们所赞美。

更需要推荐的是《复旦“第七教学楼”的二十年青春接力》和《守护心脏：记中山医院心研所的医者》两篇长文。篇幅虽然长了一些，但是扎实感人，篇幅长是为了突出“时间”的难度。两篇文章，一篇介绍复旦学生的支教活动，坚持了整整二十年，培养了一代一代的优秀学生，如今还坚持不懈；一篇是报道中山医院的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六十年，写出了几十年，几代人，为了同一个目标，攀登科研高峰不止。我经常对学生说，大学的功能就是一个字“传”，传承学术精神，传承思想薪火，这也是我们复旦精神血脉的传承。

读完这一期清样，忍不住写下上面的几行文字，表示我对编辑部同仁们辛苦工作的感谢之意，希望校友读者能够喜欢这期《复旦人》。

陈思和

2019年10月22日

编委会主任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陈思和 Chen Sihe

编委会 Editorial Board
(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玉刚 Chen Yugang
傅盛裕 Fu Shengyu
华彪 Hua Biao
靳建平 Jin Jianping
陆颖丰 Lu Yingfeng
盛青 Sheng Qing
杨增国 Yang Zengguo
恽小婧 Yun Xiaojing
张国伟 Zhang Guowei
章晓野 Zhang Xiaoye
周桂发 Zhou Guifa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恽小婧 Yun Xiaojing

责任编辑 Editor
褚菊梅 Chu Jum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李伟 Li Wei

摄影 Photographer
慕梁 Mu Liang
褚菊梅 Chu Jumei

主办单位 Organized by
复旦大学校友会
Fud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复旦大学对外联络与发展处
Department of Liaison and Development,
Fudan University

本期封面:
2019 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当天校友返校欢聚

复旦大学校友网电子版网址
<https://alumni.fudan.edu.cn>



复旦大学校友会
微信订阅号



复旦大学
校友服务平台

返校专题

- 4 家国之志 卿云梦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2019 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活动举行
- 8 垦荒的“基石”
北大荒开山采石
- 10 我的复旦一九九五

创业与梦想

- 12 季昕华：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

复旦人物

- 15 张东辉：思考着，热爱着
- 18 柴国生：三只灯泡缔造中国电光源传奇
- 21 王伟叶：光环褪去 师心长存
- 24 傅盛裕：与自己相处的自媒体人
- 27 一名青年医者的健康中国梦

美丽复旦

- 29 复旦“第七教学楼”的二十年青春接力
- 38 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名单（1999-2019）

上医情怀

- 42 守护心脏：记中山医院心研所的医者

读书复旦

- 58 “毅公书屋”收藏记

复旦故事

- 61 那些年，不曾忘记的亚丁援教岁月
- 67 周谷城与周予同六十年的君子之交

- 70 当五角场遇上复旦

- 74 夜来幽梦忽还乡
写在《复旦人》十周年之际

捐赠故事

- 76 温润如玉 饮水思源

校友走访

- 78 2019 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开展寒假学生走访校友
活动回顾

新闻图录

- 84 母校要闻
- 87 校友风采
- 88 校友会动态

逝者永恒

- 90 张胜友：大时代的阐述者
- 91 张胜友笔下的四十年
- 92 对话张胜友：
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春笋文学社创办始末

诗与远方

- 95 按下诗歌的重启键
- 96 诗与手迹
- 97 致敬“老年轻一代”
- 98 长安客





家国志 卿云梦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2019 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活动举行

□ 文/王翮 祁金 整理/邓丹

5月26日，适逢复旦大学建校114周年前夕，“家国志卿云梦：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19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活动在正大体育馆隆重举行。近3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值年校友（1969届、1979届、1989届、1999届、2009届等五届）携家属重返母校，畅叙师友情谊，畅谈时代人生，共庆母校生日，共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次返校日活动由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校友会、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共同承办，香港智华基金赞助支持。

当天虽疾风劲雨，但丝毫没能阻挡校友返校的

热情。正大体育馆活动会场精心布展，迎接校友回家。到场校友先至签到台签到、领取返校大礼包，在“亲爱的校友，欢迎回家！”留言板上签名留言，手持“我爱复旦”“毕业了，我们还在一起”“旦复旦兮心如故”“永远以母校为荣”“铭记青春，感恩母校”“归来仍是少年”等KT板标语合影留念，用笔尖和镜头诉说着对母校的爱和思念。

上午10点，“家国志卿云梦：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19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主题大会正式开始。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出席大会并致欢迎辞，



▲ 焦扬书记致辞



▲ 1979届物理系校友陆昉演讲



▲ 1989届法律系校友徐永前演讲

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各院系、部门领导及师生代表出席大会。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一华主持大会。

首先，全场高唱国歌，共同观看返校日主题视频。校友会提前专访张东辉、柴国生、施天音、孙惠川、汪新芽、王伟叶、傅盛裕等值年校友代表及汤钊猷、洪家兴等教师代表，诚意制作主题视频《家国志卿云梦》并于主题大会现场首发，讲述复旦人的爱国荣校事迹，擦亮母校的名片。

“看到从全球各地回到母校的校友们在合影，在欢叙，我感到无比欣慰和温暖！”焦扬在致辞中饱含深情地欢迎校友回家。她表示，返校校友以横跨数十年的光阴，贯通半个世纪的接力，见证了这几十年来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投身时代大潮中作出了复旦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也无愧于母校的贡献。焦扬说：“校友永远是母校最好的名片，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并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发展近况，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完善校友工作机制、夯实校友工作基础、强化校友工作保障、提升校友服务水平，永远当好校友的“娘家人”，做好校友的“大后方”，架起校友的“连心桥”，将校友资源转化为办学资源，增强校友对母校事业的融入感，团结和凝聚全体复旦人的力量，共同为母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顶尖大学而努力奋斗！最后，焦扬向所有校友发出邀请：“欢迎各位校友，常回家看看！”

随后，校友代表发言，一起讲述“家国志、卿云梦”。1979届物理系校友，复旦大学原副校长、物理系教授陆昉在《复旦，我为你骄傲》的演讲中讲述1979届物理系校友群体在母校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以来的奋斗历程，并以守望复旦40年的经历，向在场校友介绍了母校取得的进步与成绩。“我们有理由为复旦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复旦的明天会更好。”1989届法律系校友、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产业园区课题组副组长、大成律所北京总部党委副书记、高级合伙人徐永前从个人事业切入，对《新时代复旦人的战略价值》进行了分享，他表示，在国家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强国梦的关键时期，复旦人应肩负起使命，做两大战略性调整的积极推动者、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构建的中坚者、“一带一路”和全球各领域标准的制定推广者及全球治理的率先垂范者。“母校终将因复旦人而大放异彩，屹立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冰心玉壶，桃李春风，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会上，何桂芬等校友代表向易昭阳等45位教师代表献上鲜花，向授业恩师表达感恩与敬意。

“青春不散场”主题环节，1999届新闻学院校友、上海加值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瑞祥与2017级新闻学院硕士生张嘉匀畅谈校园往事，并带领全场唱起《同桌的你》，向最美同窗致敬。“复旦同心圆”主题环节，“清单”联合创始人龚瀛琦，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徐鹏，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 当日返校最年长校友顾月琴（1949届）



程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梓萌，思来氏教育课程开发总监王蓓茹，华为海思高级工程师王伟威，深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张躬，同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嘉瑜，阿里巴巴高级营运专家张锐等 2009 届校友代表携手登台，讲述他们毕业 10 年来始终与母校同心同德、与祖国同向同行的奋斗历程。

鲜活、昂扬、多彩的校园生活永不散场，“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薪火相传。返校日会旗交接仪式上，本届返校日班级联络员代表、1969 届化学系章巨修校友，校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2020 年返校日班级联络员代表、2010 届经济学院王欣婷校友共同完成会旗传递。最后，校友返校日主题大会在悠扬的校歌声中顺利结束。

下午，返校班级回到各自院系，与多年未见的教师、同窗共话师生情谊，畅谈青春岁月。为欢迎校友回家，校友会在邯郸、枫林、江湾、张江四校区特别布置了“2019 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毕业了我们还在一起”展板供大家合影留念，组织开展返校校园体验活动、返校日足球赛、在校生与校友面对面、复旦



大学 ECHO 合唱团十周年庆典音乐会等活动。为营造温暖的返校氛围，校友会还为校友精心准备了“返校礼包”，包含返校纪念衫、返校纪念袋、精美校园手绘地图、“返校护照”、怀旧午餐、订制款校庆主题小点心、返校日专享校园商户优惠卡等纪念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 114 周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70 年来，一代又一代复旦人怀揣家国志与卿云梦，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书写在人生旗帜上，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无愧于“复旦人”的称号！母校也始终热切期待天南海北的复旦人常回家看看！



▲ 返校日会旗交接仪式，1969 届化学系章巨修（左）、校党委副书记许征（中）、2010 届经济学院王欣婷（右）

垦荒的“基石”

北大荒开山采石

□ 文/张一华



▲ 1979届化学系本科生毕业合影

今年的复旦返校日特别热闹。三千多位校友从四面八方齐聚校园，我当年带班的学生（1979届化学系）也已毕业整整四十年，他们有的从内蒙、甘肃等地方回到复旦，也有的专程从国外回来……重逢的喜悦仿佛可以抹去岁月的痕迹。“毕业了，我们还在一起”，大家看到校园内这几个醒目的欢迎大字都觉得“很文艺”，韶光不再，但大学时代成长的记忆和心

灵共鸣却长存心底、历久弥新。

在我的青春年代，除了青葱的大学生活，还有一段更为刻骨铭心的经历时常牵动着我的思绪，在脑海中激荡。那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北大荒建设兵团五年的垦荒和生活。建设兵团属于沈阳军区，初期实行军队化管理，经常真枪实弹训练，当年正值特殊时期，连长和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因此大家的内

心还时常涌起保卫边陲的神圣使命。

那时北大荒大半年都是严寒，冬天气温甚至低至零下四十多度，虽然黑土地肥沃多产，但每年能播种抢收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三四个月。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在开垦早期，只能用“苍茫荒芜”形容。我们这批“老三届”是奔赴北大荒的拓荒先行者，一到那里，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临时安营扎寨的帐篷根本不能抵御漫长的极寒天气和暴风雪，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就地取材的一项巨大工程。

脱胚烧砖、砌砖盖房、挖沙铺路、筑防火道、上山伐木、挖井取水、冰水沏麻、开山采石、挑担上屯、持枪站岗……忆往昔，在那片荒无人烟、野草丛生、狼群出没的土地上，每项工作都充满艰辛和危险，时刻考验着我们这些年轻生命的极限，不少战友长眠于那里。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最危险的是开山采石。

北大荒的初夏，夜间气温仍可接近零度。天还没亮，我们一排二十人已经整装待发。排长是位二十岁出头的“老战士”，来自哈尔滨，每次出发前点名，声如洪钟，让大家精神一振。出发前例行要检查所带装备，从长钢钎、短钢钎、大锤，到炸药、导火线，甚至点火用的香烟和火柴。

紧张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从后山爬上二百米不到的石山山顶；选派两人带上长短钢钎、大锤，腰带上紧系粗绳，绳子另一头牢牢固定在山顶；众人拉住绳子，缓缓放出，把系着绳子的两人稳稳放到前山的半山腰。

两人在半山腰找到足够施展的位置后，一位双手紧紧抱住钢钎，另一位抡起大锤，用尽全身力气把钢钎往山石里敲打。累了乏了就两人互换，一直抡到手臂粗肿、精疲力尽为止，然后再换另两人。就这样轮番上阵，短钢钎换上长钢钎，不停把炮眼凿深，直到打进两米深处。随后，小心放入炸药和导火线，再留下一人点导火线。导火线必须留得足够长，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把点火的人迅速拉回山顶，最后大家集体躲到后山。

当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后，大家又一起转移到前山清理“战场”，锤碎大块搬不动的石头，将大小石头装上货车拉到建房工地。我们就用这些形状不规则的石块，伴着沙和水泥浆，巧妙堆砌夯实，作为盖

房子的地基。待到这片地基露出地面大约一米后，再在上面层层砌砖，我们住房的墙体就这样完成了。在严寒和暴风雪来临之前，大家陆陆续续从帐篷转移到简陋但坚固的房子里。

无论是扶钢钎、抡大锤，还是点火引爆，集体行动快速转移，都需要体力、技术、勇气、胆量和集体的协作配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期间也会有受伤乃至危及生命安全的时刻。记得有一次一位最后点燃导火线的战友不幸受伤住院，当他在北安医院醒来时，我们都关切地问他感觉如何，他第一句话是：

“我只知道我点燃导火线后呼叫一声，你们把我拉上去，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事实上，在他被拉到山顶之前，火药就提前爆炸，巨大的爆炸瞬间把他震昏了。如果拉得再慢一拍，人就有可能与碎石一起飞出去了。多危险啊！还好这位战友命大，醒来后身体并无大碍，休息几天就自己要求出院，团部给他记了大功，战友们也为他庆幸。“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北大荒”“青春献祖国，热血融寒疆”，这就是当年我们的豪言壮语，也是大家每天面对异常艰苦的环境和超强体力劳动时的精神支撑。

当年我们离开城市，踏上北大荒这块黑土地时，没有人敢想象自己的人生境遇将面临什么样的跌宕起伏，更没有人敢想象今天的一切又会是有一番景象，激情、勇敢、奉献、痛苦、迷茫、无奈的情绪交织伴随着每个年轻人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在邮政无路，半年一封家信甚至根本没有家信的漫长岁月中，大家是如何度过时常想家的煎熬，远方的父母又是如何克制他们对子女的强烈思念和牵挂！

转眼间共和国已步入七十华诞，同龄人的故事太多，今年也正值我赴黑龙江北大荒五十年纪念，庆幸自己既是北大荒垦荒参与者，也是祖国日新月异见证者。冰魄雪魂，春华秋实，基石坚固了，家就坚固了。四十年前我在复旦带的班，学生一半以上也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的比我年龄还大，我们既是师生也是“战友”，如今大部分虽已满头银发，但依然精神饱满、志气不减当年。大家愉快地回忆起艰难岁月中度过的青春，也彼此分享着现在的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又到返校日分别时，大家在互相祝福中，约定等到共和国八十华诞时，一定再聚首复旦校园。

我的复旦一九九五

□ 文/申剑敏



▲ 1995年入学时申剑敏（左二）与室友合影

2019年5月26日，离家不远的正大体育馆在风雨中迎接校友。我在北阳台进进出出，洗拖把晾衣服，不时凝神远望，想像着人声鼎沸和盛华灼灼。

1995年我入校，仿佛经过高考一役到达顶峰，多年后才知这不过是漫长人生的某个节点。相辉堂因我们的意气风发和人生正得意，又因其承载着厚重历史，在新生眼中变成古老雅致的校园主标识。当时它体量甚小，容不下一届新生，以至于大家必须分批入场开会。相辉堂在以后的生活中承担如下角色：携亲友打卡，校园街拍，老乡聚会，以及体锻盖章的终点。多少次清晨从东区挣扎而起，过国定路经校园主干道，一路踉跄至相辉堂前，又盖好一个章！往回走时，见舍中最有大姐风范的海燕，骑车带着最瘦弱的小鱼儿，一路飞驰而来，她俩把车停好，再跑去终点盖章。宿舍姐妹关系极佳，于是其他人屡屡吃醋，争夺有车带跑的特殊待遇。我对相辉堂的个人记忆来自不成功的两次自编话剧演出，算是了却文学青年未竟的梦。集体记忆当属1995年的“一·二九”歌会。

法学院当时是大院，集法律、国政与社会学系之力，召集了百余新生参加歌会。学院请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校友夏旸老师兼职做指挥。夏老师温文尔雅，下班之后匆匆从市中心赶到文科楼，带着音乐素养高低不同的一众人等投入排练。从秋入冬，无数次在文科楼的楼道里，响起轻吟和低唱，那是参加排练的我们深夜而归。然而法学院最终惜败！我们眼眶湿润了，在比赛结束后自发整队上台，夏老师一声叹息，把外套脱下又用力掷于地上，两手一扬，再度指挥起《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悲壮与激愤的乐章响起，法学院唯一的一次集体出演黯然落幕。

1995年的校园东北角，是一店（旦苑）、一池（游泳池）、一场（射击场）和一馆（体育馆）。旦苑仅一层，菜略贵且多油，“有朋自远方来”时，去此处点个小锅菜颇能撑得了台面。旦苑旁的小电话亭永远人满为患，乡音弥漫。我和舍友去游泳池游过几次，遗憾的是没有自学成才。游泳池的后面是一个小型射击场，1996年暑期军训，不少同学在这儿打响了人生的第一枪。体育馆是当时闻名上海东北片的一处胜景，因为附近高校的学生喜欢周末到体育馆跳交谊舞。女生通常一排排坐在观众席上，不知哪个高校的男生陆续进场，仿佛巡逻一般在馆中游荡，目光交错，两两对望之后，一个短暂或长久的校园故事便在舞曲中开始了。沿东北角往校园深处走去，零号楼是到“南京路”的必经之路，这栋不起眼的小L型小楼，彼时因设置院系信箱成为信息中枢。一楼入口处还有一家裁缝店、一家复印店和卖日用品的小商店，1995年入学第一周，我在那儿买了人生中第一盒高档次的面霜，24元的夏士莲，它散发着似有似无的淡淡清香，让我深感大学的美好。

从零号楼拐个弯，便到了大学后面两年居住的五号楼，即今天的校医院。还记得1997年在搬宿舍之

前，我和几个同学先去“新家”踩点认门，看到宿舍楼前毕业生们尚未清理完的许多废弃的棉被和衣物。一至三楼是经济学院女生宿舍，四至五楼则分给了法学院，因而被戏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从我们从东区学生宿舍搬到校园里之后，男生们终于可以突破东区门卫的藩篱，在宿舍楼门前拿着热水瓶和饭盒，三三两两等着接女友去自习。我的宿舍543室堪称最佳观景处，远可见文科楼与李达三楼，近可俯瞰篮球场，往里一看则楼道动态一览无余。隔壁最用功的女生是法律系学霸，总在深夜走廊的灯下背着法条或英文，让看完小说后上厕所顺路经过的我颇感羞愧。在她们的激励下，我也曾深夜坐在转角楼梯，前面摆着高凳，以勤奋的姿态完成了数篇课程论文。

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不分专业，印象中在3108或是3106，三个系的学生一起修完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原理类课程。上社会学原理的是刘豪兴老先生，上课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我却还能听懂，故而也颇为得意地给舍友作了翻译。二教侧面的一间大教室中，上社会心理学课程的孙时进老师某次课上给大家做了集体催眠，在他的循循善诱中，有多少同学真的入睡？三教地下有间听音室，颇受外地学生青睐，凭借哑巴英语挺过高考的我，既听不懂英语老师授课，更不谈如何应对听力考试。无他良策，只好经常潜入地下，领得一盒磁带和一副略显破旧的耳机，在颇感阴森的听音室苦练“英国老鼠”。

1995年收到的复旦通知书上，赫然印着“邯郸路220号”。当时邯郸路周边既无中环通过，也无五角场商圈，校门前有条人行地道，据说是80年代为方便师生出行而修建的便捷设施。一次到文图看书，地道中遇见匆匆而行的蒋昌建老师，我与舍友几乎是欢欣雀跃，紧紧尾随几步，又怕他回头发现，只恨手中没带着《狮城舌战》，让最佳辩手签名赠言。蒋老师可知？经狮城一战和他仰首喟叹的康德语录，让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子在高考志愿一栏，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复旦国政。通过地道，便是在邯郸路另一端的复旦教学和生活区，除文图、文科楼与五教六教外，还有十多个生活小区。这是如今郊区大学城无法享受的“福利”——一个融合于市民生活中的大学，这让复旦总带些日常烟火气，温暖又真实，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藉此便利，我们在邯郸路另一头活动时，时常看到穿着随意，拿着菜篮子或带着孩子的老师，

也到不少老师家中做过客，在辅导员陈超群老师（我们称为“超哥”）简陋狭小的教员宿舍中，听他激情讲述自己研究的生存哲学。彼时的师生之间，关系亲密，年长的如长辈，上课循循言及人生；年轻的亦师亦友，系中一位刚留校不久的年轻老师，一次上课迟迟不来，我们在教室中苦等半节课后，老师冲进教室，喜气洋洋地宣告：“女儿上午出生了！”7位上这门课的政治学专业同学课间凑些钱，跑到超市买了包纸尿裤送给老师，这是真诚地分享喜悦的礼物。

1997到1998年间，校园中有些不大不小的改变。叶耀珍楼大约在1998年修建完工，一楼教育超市开张，二楼建了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厅，大家沙龙也正式搬到叶耀珍楼，除继续讨论诗歌与哲学之外，开始出售咖啡和茶点。在沙龙里，印象中我曾喝过几次8元一杯的咖啡，也欣赏了复旦诗社的吟诵……80年代到90年代间，复旦诗社与燕园剧社同为全国高校文化活动的两大主阵地。这一时期，我们543室集体生活也有起色，舍友们凑钱买了台386的二手电脑，高调进入电子化的写作阶段。美中不足的是，电脑键盘有些老化，输入速度很慢，在论文写作高峰时段，只有合理安排档期才能兼顾彼此。大学后两年的生活随意散漫，同学们因兼职或家教，袋中多了些除口粮之外的余钱，故不时呼朋引伴。几家散布于复旦周边的大排档中，年年红、德利、川妹子等成了聚会首选，每人5元，大抵凑个40或50元，便可在排档吃一次小炒以改善生活。

1999年是大学最后一年，同学当中分几“派”：考研派早出晚归面容憔悴但矢志不渝，就业派穿上正装奔波辗转，直研派则相对轻松，安然撰写毕业论文。因复旦而相聚、相守、相知的一些人，此时站在人生另一个十字路口，各奔西东却难问前程。偶尔在校园里遇见，相熟的寒暄一二，“工作找了？”来往甚少的同学，似乎不再交集，就这样相忘于江湖了。盛夏很快来临，5号楼五楼因毕业生离校而空空落落，亲密无间的舍友陆续搬走，我因参加交流活动而暂居543宿舍，苦苦撰写交流报告。偶尔抬头，看见正对着书桌的一面长镜，只有自己！镜旁柜中还留着一个空瓶，那是舍友每次从家中装来红烧美味的瓶子。我哭了。凡是过往，皆为青春的序章，那些听见思想的瞬间，那些无疾而终的暗恋，那些意犹未尽的交谈，那些镜头留下的岁月……

季昕华： 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

□ 文/唐云路

中国商业今天的格局与中国人的生活，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被互联网技术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尤其是云计算的起步与发展，则是最近的一次从基础设施开始的变革。作为中国首代“红客”的代表，2011届复旦校友季昕华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创办一家中立的云计算服务公司。

从“红客”到管理人

1996年，季昕华考入同济大学电气自动化控制专业，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学校的机房。“第一次进机房时，都不知道开关在哪里，按遍了键盘上每一个键，看屏幕还不亮，就怀疑电脑是坏的。”他开始利用大部分业余时间学习计算机语言和知识，甚至会去旁听计算机系的课程。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位当时几乎没有碰过电脑的大学生，未来会成为“中国第一代红客”的代表人物。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预言：“未来每个人都能接触电脑，有电脑的地方都能连上网。”这在今天看来是司空见惯的常识，在当时则还是大胆预测，因为电脑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小众的产品。受比尔·盖茨书中的观点的启发，到大三的时候，季昕华就开始了创业之路。他先后做了网络教育公司仕易和“阿拉上海”点评网，看起来领域跨度很大，实际上都是利用爬虫技术，将相关的信息都搬到网上去。赶上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潮头，这样的技术还是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

但是由于资源有限以及市场的不成熟，这两次创业都算不上成功。回忆过往，季昕华说其实自己更擅长的领域还是互联网安全。他常常在“网络安全”的聊天室里与高手探讨安全技术等问题，钻研不同系统

漏洞并无偿进行反馈、公布。他破解过中国互联网领域早期的各种系统，并发现了很多系统的漏洞，还编写过震荡波等蠕虫病毒的示范代码。大学尚未毕业，季昕华的能力就获得了圈内人士的认可。

相比较“黑客”，用“红客”来形容季昕华则更为贴切，他利用技术发现漏洞，目的并不是为了破坏系统，而是为了找出漏洞后提出解决方案。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络安全应急专家组名单上，除了院士、教授外，还出现了4位民间“红客”的名字，季昕华就是其中之一。

大学毕业后，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研究漏洞的网络安全公司，主攻网络安全产品设计，为证券公司、银行检测和修复安全漏洞，防范黑客攻击。

在公司被收购之后，季昕华选择加入华为，并先后担任华为公司安全团队负责人、腾讯公司安全中心副总经理、盛大在线首席安全官、盛大云计算公司CEO等职务。经过“十年磨一剑”的历练，季昕华开始了从技术人走向管理人的转型之路。“做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程序写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做管理就会对个人能力、综合素质有非常大的考验和磨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成为管理者之前，你的主要工作是成就自己，而成为管理者之后，主要工作就是成就别人。”

重返校园 只为云计算而来

2010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云计算峰会上，来自阿里巴巴的王坚博士介绍了阿里云的构想。当时整个云计算的市场不过刚刚起步，阿里云成立不到一年。“大家都说王坚是忽悠，只有我支持他。”季昕华时

任盛大云CEO，而该公司的产品也是在一年后才开始面世公测，“当时人们对云计算的了解还是云里雾里的，业内做云计算的也只有盛大和阿里云。”

两位竞争对手惺惺相惜。“和巨头PK是一件不容易但很有意思的事情。”季昕华说，他的理想就是要创办一家中立的云计算服务公司，让每一家创业公司团队都享有与BAT（百度、阿里、腾讯）同样好的互联网基础服务的条件，都有与BAT这样的巨头公司同台竞争的能力，希望中国的未来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企业。

那时中国的云计算技术方兴未艾，只有嗅觉敏锐的“红客”们觉察到，一场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此峰会之前的2009年，季昕华就已经做好重返校园“回炉”深造的重大决定。“我16岁上大学，因为阅历尚浅又没有社会经验，不知道学的东西将来是不是有用、能用在什么地方。但是当我30岁再去复旦读书时，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学什么，因此动力十足。”他说，“我想更多地拓展网络安全以外的业态，目标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做云计算。那时候，电商类型的创业公司不敢用阿里云，社交类型的创业公司不敢用腾讯云。巨头得到的是一棵树，而我们可能得到的是这棵树之外的整片森林。所以在产业互联网中，中立云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会很可观。”

求学复旦对于季昕华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说：“复旦的老师们做学问认真严谨，以身作则，让我受益匪浅。学校在专业知识体系的学习和训练上给我很多成长空间，让我在软件研发等方面有更多技术经验的积累。另外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涉及的知识面很广，让我们在学习本专业之外，还有机会接触非专业的知识。比如在文学方面，文学素养的提升对情绪的自我调节有非常大的帮助，使我能沉下心来，在创业的过程中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坦然面对和解决，这也是‘回炉’深造的收获之一。”

从网络安全领域转向云计算，从知名公司职业经理人转型为一名创业者，正是这一段“复旦时光”正式开启了季昕华的“云世界”之旅。

小胜在智 大胜在德

“我先后考察了深圳、杭州、重庆、北京、苏州



▲ 季昕华 2011届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硕士，
优刻得（UCloud）创始人兼CEO

和上海等六座城市。”走过不少路，见过不少人，但是当时资本市场对做云计算的创业公司并不看好，所以最终季昕华卖了一套房，和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凑了400万元创业基金，在复旦附近的杨浦区云计算创新基地租借了一个小会议室，正式开工。

2012年，UCloud正式上线运营，并明确了“只做平台，不做内容”的原则，为互联网创业、研发团队提供所有的基础IT架构服务。

上线初期，UCloud在选择客户方面并没有追求大而全，而是选择从爆发性强、对弹性计算资源需求高的游戏行业切入，包括“刀塔传奇”和“啪啪三国”等榜首游戏在内的两万多家公司都成为了UCloud的用户。

云计算服务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回报周期较

长的领域，大浪淘沙，最终一批真正能坚持的公司生存了下来。

“十年前，虽然大家都知道云计算是趋势，但谁也不敢用。”季昕华回忆道，“作为创业型团队，每天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资本市场不看好我们，客户不看好我们，应聘员工不看好我们。不仅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做云计算的创业公司都很难。”

季昕华也经常被人反复问到“UCloud和阿里云、腾讯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问题。创业将近十年，他带领团队选择扎根上海，专攻“中立云”技术的开发，走的路远比那些业内巨头公司要艰难得多。

之所以选择走“中立”路线，其初衷就是为互联网创业者、传统企业以及政府等提供安全可靠的云计算服务平台。季昕华说：“观察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大部分公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被更大的公司吞并、收购，出现大鱼吃小鱼的局面，创业公司看不到任何的机会。我们的想法是，能不能趟出一条路，让这些公司能够在现有的竞争环境中更有广阔的成长空间。这个摸索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想要去尝试一下，可能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起码过程会很有意思。”为梦想者助力，这是最朴实的原动力。

在华为，季昕华学到一句话：“小胜在智，大胜在德。”他诠释为：“你靠自身的努力，能够获得个人的成就，但要取得更好的成绩，就要看你个人的品德，乃至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正向的，是否能够为社会创造出价值。”

在他看来，做云计算的人，尤其是坚持做“中立云”的人其实蛮傻的，聪明的人不会干这个活儿。

“但是这个世界总需要一些傻子做傻事儿，我的英文名叫‘Benjurry’，就是‘笨极了’的意思，我这个笨人来干这样的傻事挺合适的。”季昕华自嘲道。

8年来，UCloud没有接受BAT中任何一家公司的投资，从底层内核到数据库、大数据、AI等方面都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术。云计算在发展初期是一个相对标准化的服务，但随着市场进入差异化竞争阶段，用户对云服务能力的要求则更加具体。目前，UCloud已经服务了包括政府部门、传统企业、新兴科技企业等在内的数万家客户，涉及领域包括政务、教育、金融、智能制造、新零售、医疗等行业，为他们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另外，UCloud还有一个独特的标签，就是“内资”。2016年，UCloud花了一年的时间把VIE架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实体）全部拆完，并放弃去海外上市的机会，这是因为云计算产生的很多数据，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行业。“我们希望这些数据的存储与流通，对国家及企业来说都是安全的。”

如今，在“小胜在智，大胜在德”之后，季昕华又加上了一句：“更大的成就，要靠更好的对手。”

“人都是有惰性的，创业型公司也是如此，但如果有个好的竞争对手在持续给你很大的压力，就能逼着你不停地去思考和创新。”季昕华这样理解市场竞争，却选择反其道而为之。

在2019年的用户大会上，UCloud宣布进行品牌升级，启用中文名称“优刻得”，并发布“优刻得中立云，不和用户竞争的云”品牌标语，强调要做“不和用户竞争的云”。优刻得的使命则是利用云计算服务平台尽可能帮助每个新兴的创业者，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帮助传统企业转型。“我希望云计算能像电一样，让每个客户都用起来，既用得起，又能用出效益。”

季昕华于2013年岁末写道：“在这一年中，我们为云计算的发展而鼓舞，为云计算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平台而激动，为云计算加速传统企业的转型而兴奋。而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可以预见云计算的力量将不断地发展，并以摧枯拉朽之势产生变革，对IDC（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变革，对服务器厂商的变革，对传统IT厂商的变革，对软件厂商的变革，对传统行业信息化的变革。”

现在，这一切也已慢慢成为现实。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百万家企业上云”。中国云计算服务又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最近，季昕华在朋友圈写下了一段话：“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可能成为撬动时代前进的支点。时至今日，UCloud依然不改初心，始终陪伴梦想者，助力他们走得更远。”

张东辉：思考着，热爱着

□ 文/潘佳钰 褚菊梅



▲ 张东辉（右）1989届物理系本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东辉教授对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的理解非常透彻，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力也是世界顶尖的，与他的合作，能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透彻地了解数据和理论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张东辉工作上的好搭档、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院士给予他的专业评价。

在复旦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18岁的张东辉进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就读。这样的机会虽然只是偶然，但今日回想起来却也是必然的结果。当年张东辉所就读的高中获得一个推荐免试进入复旦的名额，而成绩排名第一的张东辉自然拔得头筹。有趣的是，即使提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张东辉仍然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取得了超过国内所有大学录取线的成绩。“这



▲ 谢希德校长与通过CUSPEA考试的同学张东辉（后排中）、臧军（后排左）、施忠（后排右）合影

被发现时的成就感，这种简单的快乐纯粹而满足。”也正因为如此，张东辉练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校内高水平的国际水平学术交流也会给张东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他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受邀来到复旦进行演讲，在听完他的报告后，张东辉对他的研究方向——交叉分子反应动力学产生了兴趣。当他后来通过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到美国留学，面临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的时候，便毅然决定做与李先生

相同的课题，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科研之路。

1988年，他赶上CUSPEA项目招考的末班车，并通过考核于1989年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截止到最后一批结束，前后十年间共有约一千名中国学生通过CUSPEA项目被送往美国学习。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部分人并没有继续顺着科研的路读下去，而是转行到金融、IT等领域打拼，并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面对人生的抉择，张东辉也曾彷徨过。

“那年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非常流行在华尔街用物理、数学的模型等方法做金融分析，但总觉得还是有点遗憾，没有体现该项目成立的初衷和期许。”最后他放弃了成为华尔街“弄潮儿”的机会，仍然选择了与之相比更加“安贫乐道”的科研工作，正因为如此，也成就了一位优秀的研究者、一位科学院院士。

在通过CUSPEA考试后，经常在校园里散步的谢希德校长，与包括张东辉在内所有通过考试的同学见面合影，并帮他们亲笔写了赴美留学的推荐信，这给了他莫大的鼓励。

在外漂泊经年，游子归心似箭。分别在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研究之后，张东辉于1997年应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科学系任教，2000年升为副教授，同年获得新加坡杰出青年科学家奖，三年之后又获得新加坡国家科学奖。然而，事业上的顺风顺水并没有给他带来归属感。2004

年，张东辉在即将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教职之时，毅然选择回国。“不管走到哪儿，我的根在这片土地。”回国之后，张东辉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化物所）开辟了一片研究新天地。他与实验化学家杨学明院士展开合作，达成了理论结合实验的联动机制，形成完美的配合。同时，化物所也在竭尽所能地为该项目研究创造更好的实验条件。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研究氛围中，张东辉团队将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研究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谈到国内理论化学的发展，张东辉感触颇深。当年他赴美求学时，国内理论化学领域相对还是比较落后。近20年来，由于国家在科研方面的不断投入，国内理论化学研究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许多方向已经与欧美几乎可以并驾齐驱，个别方向甚至取得领先的地位。但总体来说，在基本理论以及计算程序发展上，由于我们起步较晚、经验积累不足，与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

张东辉的研究偏向基础理论，即研究化学反应的本质、化学反应的微观机制、发生时的伴随现象等，并为控制化学反应提供思路。所以在化学反应动力学精确研究这一方向上，张东辉和他的团队是具备了当仁不让的世界顶尖科研水平。所有的成就始终都离不开他对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研究充沛的热情。

期间也曾遇到困境，尤其是在第一次计算一个四原子反应体系微分反应截面的时候，张东辉持续了十年之久，“但在最终成功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所有的挫折和痛苦都是喜悦的催化剂。”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张东辉坦言：“做科研是很费时费力的，只有热爱，才能不在乎其中所经历的艰苦。如果可以做到于公能够为祖国、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于私能够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则是最圆满的结果。”

复旦对于张东辉的影响，不仅在于学术，更在于思想和精神。校训有云：“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他秉承着自己一贯的风格，不追求四项俱全，而是把“近思”做到了极致。多年以来，思考一直是他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也是他的兴趣爱好，更是他的信条。张东辉笑着说：“有一次，上小学的孩子捧着奥数题来求助，就是这么简单的题目我也是要找出N种解题的方法，并选择最优的方案。”

“治学不求多，但求最优。”张东辉用自己的热爱和投入，孜孜不倦地实践着母校赋予的求索精神。也许正因为如此，离开复旦如许岁月，张东辉却并未对校园产生疏离。他说，他很喜欢复旦校园，每次来上海，都要到校园里走走，近些年也建起了一些新的校舍，但是自己当年住的宿舍都还保留着，还有当年读书的物理楼。每当春芽绽枝，梧桐落黄，一景一物都会展现出不曾被忽略的美，纵使此身已遍历诸国、踏遍天涯，也感觉仿佛从未离开过。

个分数也算是对得起母校的。”他风趣地说。

世代以打渔为生，张东辉的父母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却用勤劳的双手为孩子们创造了比较宽裕的生活条件，也愿意全力支持他的学业。

高中时候的张东辉是一个“不做数理化作业”的学生，这并不是因为他偷懒，而是因为他觉得“我都会了”。在保证老师布置的题目都会做之后，张东辉会自行翻书寻找题目练手，并在上完课之后把相关的题目都浏览一遍以确定自己是否掌握。“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会不会做，会做的就不用去写了。”利用这种快速做题方法，他在大学期间做完了好几本厚厚的专业课习题册，题量远远超出了老师的要求。喜欢跟着自己的节奏去思考问题，这是张东辉从学生时代延续至今的一种学习习惯。

在名师云集的复旦，他记忆中最清晰的还是当年物理系的任课老师们，提起他们的名字，恍然如昨。最早的专业课是力学课，教这门课的郑永林老师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板书。教量子力学的苏汝铿老师，上课时声如洪钟，把抽象的量子世界描述得通俗易懂，很受学生欢迎。教固体物理的金晓峰老师，后来成了物理系的系主任。

在复旦读书的日子，简单而又充实。张东辉回忆说：“那时，同学们在一起最大的乐趣就是比赛做题，一道道难题被攻破时的喜悦，一种新的解题方法



▲ 建于1960年的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

柴国生： 三只灯泡缔造中国电光源传奇

□ 文/王梓杨 刘畅

“中国需要强大，光源更需要自主创新！有自己的新技术，我们就能站起来。”

——蔡祖泉

1953年，在云南省南部一个名叫“个旧”的小城，柴国生出生了。十年之后的1963年，有着“中国爱迪生”之称的蔡祖泉先生在复旦大学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只高压汞灯。那时没有人能想到，在又一个十多年之后，柴国生在蔡祖泉先生的引领下开启了他电光源领域不断探索追求的一生。



▲ 柴国生 1978届光学系本科，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学毕业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没能上初中的柴国生只能将就着在小学办的初中班里学习三年。17岁时，也算是“准初中毕业”的柴国生得到一个可以不用下乡，而是进入当地灯泡厂当工人的机会。1975年，全灯泡厂“最勤奋、学习能力最强”的柴国生，通过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度进入复旦大学光学系电光源专业学习。

就这样，22岁的柴国生从一位灯泡厂的普通工人，变成了一名电光源专业的大学生。能够进入复旦这样一所中国顶尖的高校，并能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柴国生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怀揣着兴奋和对未来的憧憬，他踏进了复旦的校园，也迈出了今后数十年深耕电光源产业崭新的一步。

“听天书”的好学生

进入复旦以后，柴国生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并逐渐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现在这么好，尤其是朝北的房间，冬天的早晨玻璃上都会结厚厚的一层冰，每天早上叫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冷飕飕的被窝。但更大的挑战是在学习上，由于入学前文化基础不好，柴国生刚开始听课时，就如同在听天书一般。面对差距他并没有服输，而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奋起直追，他在心中悄悄定了一个目标，无论严寒酷暑、狂风暴雨，都必须在5点半起床读书，要在毕业前“做全班最优秀的学生”。这样严格的自我约束和作息规律，柴国生坚持到大学毕业。

回忆起在复旦的求学生涯，柴国生最难忘的还

是往返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三点一线的打卡生活，他说：“能进复旦学习的这个机会非常来之不易，所以我要好好把握，不能浪费时间和生命，更不能学无所成。”

除了图书馆，柴国生每天最常去的就是电光源专业的实验楼——红旗楼。因为有着五年在灯泡厂当工人的工作经历，与其他同学相比，柴国生在实验的动手操作上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他回忆道：“当时我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因此和各个科目的老师交流也比较多，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这是非常难得的‘补课’机会。”

求学的过程虽然清苦，但是复旦严谨踏实的学术氛围，让柴国生如雨后春笋般，在这片知识的土壤中汲取养分，奋力地向上生长着。他用很短的时间自学完初中高中的所有课程，并在后来的研究生升学考试中取得平均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然而，命运还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仅因4分之差与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失之交臂，这也让柴国生重新开始思考和规划人生的方向。从复旦毕业后，他婉拒了去云南大学当老师的邀约，而是选择回到以前的灯泡厂做回自己的老本行，成为一名工程师。“既然当初自己选择电光源这个行业，那就一定要继续把它做好。”

三只灯泡的故事

回到原点，柴国生不仅将在学校里学到的先进技



▲ 七十年代末的学生宿舍（78级新闻系陈小鹏校友供图）

术和理念运用在实际的生产中，还带领自己所在的厂率先研发生产节能荧光灯。在那个连LED灯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年代，荧光灯无疑是全球节能效果最好的灯泡，比普通白炽灯可以节约80%的电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进一步提高产能效率，引进更先进的机器，1990年柴国生到欧洲进行技术考察。也是那次欧洲之行促使柴国生开始思考，“我认为中国的电光源产业要进步，就不能简单地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而是必须去走自己的路”。

于是，在邓小平南巡那年的春节，柴国生来到广东佛山开始“下海”创办雪莱特公司，从此走上创业之路。

九十年代初期，“下海”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但是也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气和努力。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浪潮里，没有谁能够真正看清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柴国生选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

对于这样的选择，柴国生诠释道：“就像一群人有的坐在山上观望，有的坐在海边徘徊。而我当时就属于坐在海边的人，渴望去海里游历一番，哪怕会经历磨难也是一种收获。等山上的人都下来到海边的时候，可能先去海里的人已经开始上岸‘看风景’了。”

依托与复旦大学电光源专业的合作，特别是来自蔡祖泉老师的支持，公司研发团队在“紧凑型高效节能灯”方面实现两大创新：一是创造了65瓦以上的大功率节能灯，突破了节能灯没有大功率的禁区；二



▲ 2006年10月2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柴国生（中）和蔡祖泉（右一）为雪莱特上市敲钟

是规格往更小的方向发展，研发出3瓦、5瓦的小越亮“火箭泡”。这样最大和最小两种功率的节能荧光灯，不仅迎合了市场需求，更是填补了国内外的技术空白。这两大突破，使产品产量达到全世界90%的市场占有率，雪莱特公司也因此确立了在电光源领域的领跑位置。

在节能灯研发制造的基础上，柴国生又开始在现代的紫外线杀菌灯生产领域进行探索，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只汽车前大灯——HID汽车氙气灯，以独有的球泡技术，创建起HID汽车灯领域里唯一的民族自有知识产权体系，使我国在车用氙气金卤灯水平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升了中国照明行业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

2006年10月2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热闹非凡，这一天，柴国生陪同蔡祖泉先生共同为雪莱特敲响上市的钟声。这意味着，他的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忆往昔，柴国生说道：“我这一生虽然在照明行业里摸爬滚打了49年，但是总结起来也很简单，我就做了三只灯泡：一只是白炽灯泡，一只是节能荧光

灯泡，还有一只就是LED灯泡。”他这样算过一笔账：用一只11瓦的节能灯替代60瓦的灯泡，一年可以节约71度电，十亿只节能灯所节约的电力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我很骄傲能够把知识用到了产品的生产、科研的发展上，为国家、社会的环保做出贡献。”

这三只灯泡不仅是柴国生“下海”创业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改革开放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奋发图强的缩影，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贡献了力量。

柴国生坦言：“我这一生都得益于在复旦的学习经历，复旦教给我‘笃志’的精神，认定做一件事就要做到最好，做到行业一流。所以我经常说‘知识创造价值，科技改变命运’。现在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完全局限于电光源领域，更多是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向，所以唯有科技创新才是企业延续生命力的来源。”

如今，在LED灯浪潮袭来时，柴国生再次带领雪莱特打响技术转型之战，真正引领“品质源于科技”的经营理念。📖

王伟叶：光环褪去 师心长存

□ 文/刘冰 张嘉匀 褚菊梅

铺开一张上海市的平面地图，以家为中心，画一个半径不出四公里的圆圈就能覆盖到控江中学，这就是进入复旦之前，王伟叶每天的活动范围。

2000年9月，18岁的王伟叶骑着自行车来复旦大学报到，没有大包小包的行李，没有父母的陪同，从走出家门到完成注册不过半小时，这就是他入学的第一天。

对于复旦这样一所就在自己“家门口”的高校，王伟叶坦言是再熟悉不过。因“恋家”结缘复旦，因喜爱数学而结缘复旦数学系。导师洪家兴院士这样评价他：“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小孩，各门课程成绩都是第一。除了考试出色以外，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特别强，我很少碰到反应这么快的学生。”

然而，导师眼中这位出色的学生，在博士毕业之际选择回归基础教育，去控江中学做一名数学老师，这个异于常人的决定却是王伟叶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说：“我对成绩不是特别地看重，只是希望能教给学生们发现数学之美的能力。”



▲ 王伟叶（右一）数学学院2004届本科、2009届博士，上海市控江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图为课后为学生讲解试题

梦起控江 师承复旦

王伟叶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家里和数学有关的书籍他总是主动找来看。上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经常会做一些 20 以内的加减法运算题。王伟叶回忆道：“我都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基本上每次都是全对，这是我小时候最自豪的一件事情。”作为控江中学七年一贯制班的学生，初中的时候王伟叶开始参加区里的数学竞赛，当时为他们做赛前培训的就是控江中学的许敏老师，他不仅后来成为王伟叶初三至高三的班主任，还是指引他潜心数学研究这条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许老师真正的厉害之处是他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尤其是在解题的过程中，他会将难点讲解得浅显易懂，易于学生理解和消化。这一点也是我后来在教学中一直去学习的。”

凭借数学联赛一等奖，王伟叶获得了保送复旦数学系的资格，并从硕士阶段开始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家兴，开启真正的数学之旅。

中国数学界素有“南苏北华”之称（苏步青与华罗庚），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苏步青先生是谷超豪院士的恩师，谷超豪一生培养出 9 位院士学生，其中就包括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的李大潜、陈恕行、以及王伟叶的导师洪家兴院士等。

洪家兴先生的办公室是王伟叶读书期间经常光顾的地方，许多次在深夜经过光草，一抬头就能看见光华楼东主楼 19 层那间熟悉的办公室窗户常亮的灯光。在王伟叶的记忆中，洪先生永远精力旺盛，从不感到疲惫。他对学术的严谨、对工作的热情无不让王伟叶印象深刻。“很惭愧没有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洪老师这种对科研的热爱和执着，对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大一、大二的数学分析课是姚允龙老师，他讲课时喜欢掺杂着上海话。那时候数学系的同学们住在北区，离南区的数学分析课教室很远。所以经常有同学带着早饭进教室，但是不敢在课堂上吃。“姚老师的观点是等到下课再吃早饭肯定冷了，饿着肚子听课效果也不好，所以就允许我们边吃早饭边听课。”如今在王伟叶自己的课堂上，他也不介意学生吃东西。

“高三的学生压力非常大，所以吃东西是很好的减压方式，否则注意力可能还无法集中。我觉得，老师对

学生们这种小行为的宽容，也是师德的一种体现。”王伟叶说。

复旦一直提倡和鼓励教授、院士给本科生开课，因此还在读本科的时候，王伟叶就已经领略过数学系许多知名老师上课的风采。他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们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他们就背着一个包过来，可能包里面装着几本书，但从来不出包。将近两个小时都是脱稿上课，并且讲课和演算都不会出错，这说明老师们对自己要上课的内容掌握得非常透彻，但事实上为了上好这两节课，他们在背后的备课工作是远远超过这两小时的。“即使是在院士这种身份地位的光环下，老师们对于本科生的基础培养，都是完全一丝不苟的，这非常令人钦佩。”王伟叶感慨道，“除了讲课之外，老师们的板书写得井井有条，就像事先已经演练过一千遍的那种写法。”王伟叶认为，这才是真正高水平老师的讲课方式。“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大段地推演，如果是看着稿纸来推导，实际上是很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不仅要能脱稿授课，还要能把复杂的问题讲解得干净利落。现在我也是力争去这样给学生上课的，虽然我教授的是中学的数学知识，从内容上肯定比大学老师教的简单得多，但这种一丝不苟的讲课态度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王伟叶说。

在王伟叶看来，复旦给他最大的感受是“外宽内严”。“我个人非常反感把所有人都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复旦赋予了学生充分自由的自主学习机会。在复旦，没有人会给你列出严格的时间表，要求你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而是允许学生依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掌握时间。我想这个就是外宽，是很自由的一个方式。”在王伟叶看来，自我管理是一个人的必备素质，复旦留在他身上的印记，影响了他在工作中对待自己学生的态度。他试图激发学生的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不是以一个“设计师”的姿态去管理学生，尽力争取实现学生的个性化成长。而复旦的“内严”则表现在专业方面的严格要求，与管理方式的自在宽松不同，上课时老师一丝不苟。“我碰到的所有教过我的复旦老师都会做非常周全的课堂准备，不会是拿一个 PPT 过来，然后放一遍 PPT 就走了，而是认真地对待每一节课。”在复旦老师们这里看到的严谨负责的品质，对王伟叶之后的工作生涯产生的影响很大，他坚信，“凡是学生的事都是大事情”。

师心长存

面对自己的得意门生王伟叶在博士毕业选择回归中学母校控江中学教书的决定，导师洪家兴院士认为：“推动数学的发展不仅仅只有做科研这一条路，也不只有从事高等教育才叫作为社会做贡献，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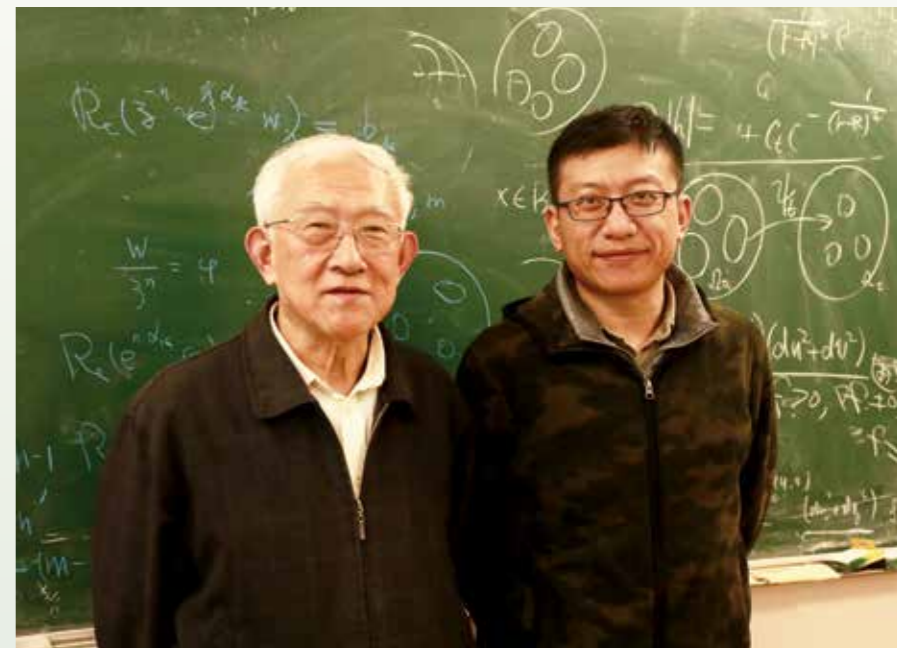
顶着“博士”的光环，并没有给王伟叶带来任何的便利，相反，而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是非师范生，他只能从教师资格证开始考起，开始一段时间“摸石头过河”的教书生涯。

王伟叶最初遇到的“水土不服”是把握不准课堂节奏，这也是许多新老老师的通病。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教第一节课的情形：“认真地备课写讲稿、做课件，甚至把每句话该怎么讲都写了下来。本以为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然而直到下课铃响，才发现自己只讲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一节课该讲多少知识点？花多少时间和学生互动？如何设置教学目标？这些我都完全没概念。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感觉自己空有一身本领，但是传授给学生的这个过程做得是非常差的。没有教学方法，仅凭一腔热血是教不好书的。”好在王伟叶是一个擅长学习，喜欢革新自己的人。他经常去旁听学校其他老师的课，互相交流，学习别人的经验，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断地调整授课方法，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

王伟叶的教学方式侧重于发散学生思维，鼓励独立思考，对于思维活跃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到控江中学的第二年，他开始教创新班，来自校方的支持和家长的信任，让他在教学方法上敢于不断做出新的尝试和突破。

“我上课的思维跨度是非常大的。我会引导学生思考，甚至迫使学生去思考，一个问题不光要告诉我答案是怎样，还要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除了多思考，他还希望学生们有敢于质疑的精神，不盲从，在学习上和生活中都养成这样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

王伟叶常说，作为一个老师，比教出成绩更重



▲ 2019年4月30日王伟叶（右）回母校看望导师洪家兴院士（左）

要的，是培养习惯；比了解课本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学生。“教不同的学生，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有学生评价王伟叶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师，除了有很多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在班级管理上，他也同样不按常理出牌。有一次本该是班上的几个男生值日，但他们逃掉去打球了。“我本来可以只批评他们就结束了，但我陪着他们一起重新值日，在限定的时间内活没有干完，我又陪他们一起接受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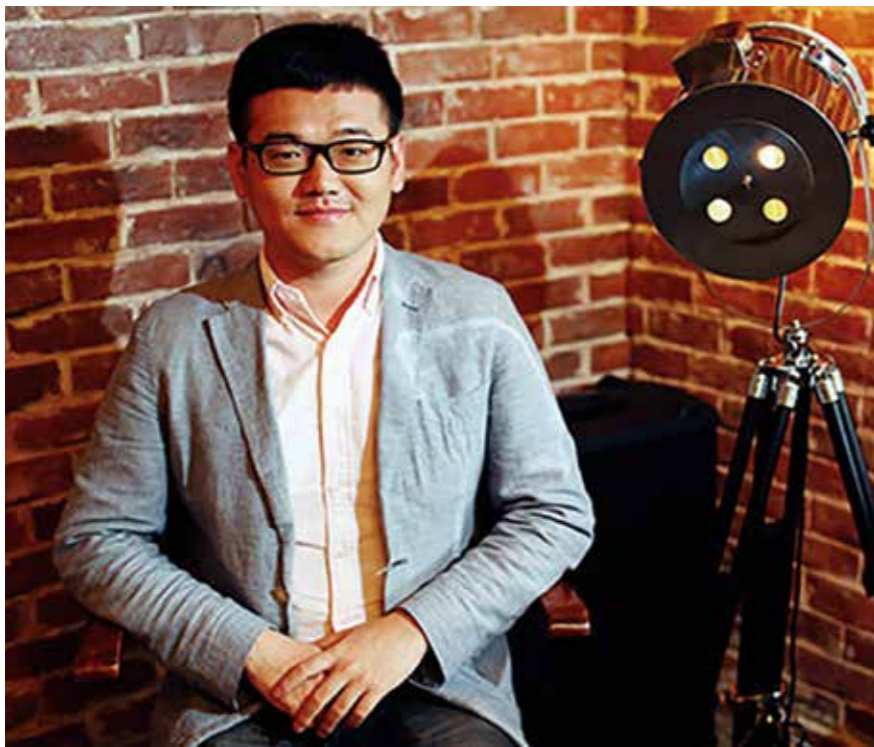
在王伟叶心中，老师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走进学生的心里，所谓“亲其师信其道”，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他越发看重与学生的沟通。“我觉得能够跟学生亲近，走到学生心里去，是成为好老师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即便是教授高三数学的日子里，我想的还是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些应试之外的东西。”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王伟叶想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而是让学生激发更多潜能和兴趣，让他们拥有更健硕的鳍背、更茁壮的翅膀，在更广阔的天地中遨游。

从 2009 年毕业至今，王伟叶在三尺讲台“十年磨一剑”，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弦歌不辍，薪火相传。不看重个人成绩，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时常开玩笑地自嘲这种状态为“超然物外”，这或许就是复旦人的气质。🌟

傅盛裕：与自己相处的自媒体人

□ 文/张嘉匀



▲ 傅盛裕 新闻学院 2009 届本科、2012 届硕士，青年作家，编剧，自媒体人

这样的寻找在傅盛裕上中学时有了答案，他渐渐发现了兴趣所在——写作，可以有机会一窥外面的精彩世界。也是从那时起，傅盛裕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在高考志愿中填报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编辑、记者、专栏作家到编剧，还有知名的自媒体“傅踢踢”，他一直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断前行。

旦复旦的日子

2005年9月，傅盛裕来到复旦报到。“我印象最深的是开学第一天，正门口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同学！’——不是‘全国各地’，而是‘世界各地！’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就读的这所学校与这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我只是一个很渺小的、平凡的个体，但在那一刻，能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为我指明方向……这是我来到复旦的第一天。”

之后的七年时光，傅盛裕都在复旦度过，除了一待就是一整天的图书馆，他还喜欢去听讲座，去旁听其他专业的课程。

在校园里散步，是傅盛裕喜欢的运动方式之一，也因此有着关于校园四季的专属记忆。

春天的光草是校园民谣的专场，空气中回荡着吉他的旋律，氤氲着轻柔舒缓的浪漫。生物楼前有一棵繁茂似伞的大树，它在骄阳似火的夏天傲然撑出一大片树荫，在那个没有空调与微信的时代，这片地儿就是最好的聊天室。秋天的光华大道铺满落黄的梧桐

“我长大想做科学家！”“我要做警察！”“老师、医生、消防员……”当其他的幼儿园小朋友很积极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标准答案”时，小小年纪的傅盛裕犹豫了。

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专栏作家、什么是媒体人，只是懵懂地知道，未来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有意思的事情。

叶，细细碎碎的“啦啦”声和着人们轻轻浅浅的脚步，交织成别样的“秋日私语”。复旦的冬天是安静而湿润的，大家都躲在围脖和棉袄中，偶尔也有片片雪花飘进同学未来得及合上的书页中，慢慢融化，晕开一抹淡淡的水渍，这是雪花的梦，也是傅盛裕记忆里最值得珍藏和怀念的“奢侈品”。

为你照亮一条路的人

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带 2009 级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已年近花甲，傅盛裕常常惊讶于自己导师的“时髦”——看最新的书，关注最时兴的话题，以及永葆一颗好奇心。

每两周一次的读书会师门“华山论剑”的时间。从热门话题到学术概念，从新闻时务到媒体改革，从社会阶层到宏观经济……同学间思想的碰撞往往能擦出新的火花，这是单枪匹马钻研学术很难得到的多维思路。最后，导师就大家的观点和想法做归纳提建议，也会推荐阅读书目，他的总结总是更有高度和深度，让大家受益匪浅。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回忆起复旦求学的心路历程，傅盛裕感慨道：“当我们在一片茫茫的黑暗中摸索的时候，其实比你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已经给你照亮了一条路，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路走。当然同时也应该抱有坚持、反思和质疑的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为你照亮的那条路，能够让你更明确地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思辨，受老师潜移默化影响的还远不止这些。“和十年前相比较，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学习能力等各方面都有所下降。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到 50 岁、60 岁，甚至更年长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去迎接生活带来的新挑战，不断地去适应这个世界的新变化。导师身上这种持之以恒的自律，以及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事业的热爱，也会激励着我们去不断刷新自己，与时俱进。”傅盛裕说道。

梦想，从《复旦青年》出发

傅盛裕报考新闻学院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

做记者。

都说大学是个小社会，小社会中的新闻也是需要记者来报导。校园的环境相对封闭，各类消息便于收集，傅盛裕认为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于是他加入了《复旦青年》这个校园媒体，这里成为他朝着梦想启程的始发站。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复旦青年》由头版、新闻、学术、国际政治等板块构成，傅盛裕负责头版和新闻板块的素材内容。从讨论选题到定版定稿，指导老师 and 学长学姐们会手把手向他们传授经验，也很尊重每个人的想法，这样的训练给刚入职的“媒体新人”很大的发挥空间。

新闻无小事，再小的报道也需要记者去跑现场，因此在采访的过程中傅盛裕体会到了做记者的乐趣，锤炼了自己做新闻采访和写作的技能，积累了很多课本外的实战经验，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新闻行业和记者这一职业的理解。

除了写新闻稿之外，傅盛裕也常涉猎其他形式的写作。临毕业时，傅盛裕的一篇关于《舌尖上的复旦》美食文章成为毕业季爆文，一时“复旦纸贵”。谈及此文，他谦虚道：“文章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自己写得好，而是因为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文化认同。”每一个感受过复旦生活、复旦美食的人，那些在每个餐厅、每道菜里留下故事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中读出内心的留恋和渴望。由此他逐渐明白，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因为有天花乱坠的辞藻，而是要有能直击人内心的情感共鸣。

记者采的是食材，编辑练的是刀工

2012 年，傅盛裕毕业进入《文汇报》工作，四年间经历了三个部门、三种职位，分别是编辑、记者和评论员。编辑是磨练心性，记者是驾轻就熟，当评论员则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初进《文汇报》的应届生都要经历近一年的轮岗期，傅盛裕的这一年被分配到了国际新闻部。这里的国际新闻采写都是由驻外记者完成并发回的，驻守后方所做的则是编辑工作。“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你知道我们在学生媒体，包括我在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实习的时候，都是可以出去‘跑线’（做记者）的。跑线就会感觉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你

只要找到线索、找到联系人，然后编辑或部门主任认可你这个选题的价值，稿子就可以由着你自己的兴趣和你的想法去写。来到《文汇报》之后发现做编辑更需要耐得住寂寞，要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施展精炼的功夫。”

形成一篇好新闻就像做功夫菜，看上去都是很日常的食材，不用添油加醋也不用重麻重辣，刀工的精准度和分寸感才是尤其重要的。有了这个能力，才能把事情掌握在合适的节奏上。

轮岗结束后，傅盛裕来到《文汇报》的经济部，有了在编辑部的经历，再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他感到跑新闻更加得心应手。工作之余，他也没有放弃在网上的关于文化和情感的专栏写作，并在机缘巧合下，被领导看到了自己的文章。

随后《文汇报》改革并转型为文化类大报，版面经过调整后，经济和政法类报道被削弱，因为之前在网上写专栏的原因，傅盛裕被转到文化部写评论和深度访谈。

“对我来说，在文化部那一年是特别好的职业过渡期。因为做记者每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采访、联络、沟通这些跟人打交道的事情上，而我在轮岗一圈后感觉自己最大的兴趣还是喜欢单纯的写作。”由此，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公众号“傅踢踢”。

自媒体：与自己相处

2016年8月，傅盛裕做了一个选择，从《文汇报》辞职去做自媒体。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经过一番纠结的。在《文汇报》工作期间，同事和睦，领导赏识，一切发展顺风顺水，并且在父母和外界看来，这是一个“铁饭碗”，可以受用终身。但他更喜欢自媒体工作带来的新鲜感，也相信自己在这份工作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都不会退缩的热爱与激情。

“我觉得追求安全感完全没错，但对我而言，如果一份工作失去了挑战，失去了焦虑和不安，那么我的成就感同时也就失去了。在报社工作，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它的挑战对我来说越来越小。同时我感觉传统媒体给一个人的成长空间相对来说越来越有限，我对职业的追求没办法在传统媒体的某一个岗位上实现。”这么想着，傅盛裕决定放手一搏。

最初傅盛裕注册公众号的想法很简单：它是一

个自留地。在本职工作之外，写一些纯兴趣导向的文章。“傅踢踢”的文章以流行文化和情感为主，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我写过一篇关于《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的文章，有很多粉丝看完之后在文章下面留言讲述自己异地恋的经历。当你把这首歌的故事剖开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读者是拿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跟你交换的。而且公开的留言所有人都能看到，就像是一颗颗星星在夜雾中被点亮，你会发现原来一首歌可以让那么多彼此不认识的人，基于这个话题、这种情感产生关联。所谓的流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看上去像是在描述一种现象、一种结果，但其实我觉得流行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共通之处。”

自媒体人的自我认知常常处在天平的两端：写出一篇爆款文章时，很容易自信心爆棚；如果之后发表的文章无人问津，便会让人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

“做了自媒体以后，我发现和自己交谈的机会变得非常多。”傅盛裕说，“我觉得如果把自媒体当作一个产品去做的话，一定要尊重数据，它能帮助判断读者的想法究竟是否跟你的一致。但数据只会告诉你目前的情况，至于要坚持走这条路，还是要基于这些数据反馈换一条路来走，这需要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做了决定之后，你会去关注每一篇文章流量高不高、评论的人多不多、当中有多少骂你的人……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和自己较劲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我的日常。”

这也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最大的差别：传统媒体的反馈链条比较长，且不量化，除了读者回信以外很难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被大众认可，只能靠从业经验大致判断；而发表在自媒体上的文章，实际效果则可以通过数据和留言回复等方式迅速且直观地看到。

如今，随着即时通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走上网络媒体的变革之路，这是趋势，亦是诸多媒体人转型的契机。傅盛裕只是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在“自留地”里和自己相处。

如果有机会，他会这样告诉曾经刚踏入复旦校门的那个自己：你很优秀，但还没有成为你心目中那种了不起的人。你会不断奋斗，永远坚守自己的内心，总有一天，在烈日当头时，你会成为自己的树荫。



一名青年医者的健康中国梦

□ 文/吕京笏

从高中起，周峰就特别关注民生，关注人民群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当他为自己提出并设计的《上海地铁空气质量调查报告》课题，忙碌地穿梭在上海各条地铁线路采集样本时，周峰并不觉得辛苦劳累，因为研究初衷是出于一名普通上海市民对公共交通卫生的关心，该课题获得了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上海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一等奖、复旦大学“望道学者”等荣誉。能在调研过程中收获市民对于该问题的关注和支持，能用自己的所学为老百姓解决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周峰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进入临床学习后，周峰始终将“帮助更多的人”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了解到脑血管病是我国第一大死因，即使保住生命，严重的后遗症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周峰查阅了上千份病例，并和化学系团队合作，一起开发了用于脑血管病的新型医用液体栓塞剂，这是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材料，量产后有望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同时又能提高目前临床手术的治疗效果。后来该研究项目获得了挑战杯全国二等奖，上海市一等奖的成绩。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周峰会顺理成章留在华山医院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时，在博士毕业前夕，周峰却选择离开熟悉的华山医院，这个被世界神经外科主席誉为最好的医学中心，独自一人从故乡上海来到西北，在陕西宝鸡，在西部基层，成为了唯一一名来自一线城市的选调生。他认为，成为一名好医生，一名科研工作者固然能帮助病人，但是作为医疗的最后



▲ 周峰（右）外科学2017届博士研究生，现挂职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图为毕业时和导师朱巍（左）合影

一个环节，只能一个一个地帮助个体，要想帮助更多的群众，就需要建立更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才能救助更多的家庭。不忘初心、心系基层，这就是一名青年医者的家国情怀。

想要了解祖国的医疗现状，周峰认为就得走出象牙塔，去西部，去基层，去乡村。在那片广袤的天地，即使没有上海先进的硬件设施，没有优秀的平台团队，但是用青年人的热情、朝气、活力，照样可以做出一番成就，因为科研知识的价值本就应该造福人民群众，这是治学之根本所在。

初到宝鸡，周峰几乎走遍所有区、县医院，进行实地考察。在这里，他找到了更需要有志青年施展

抱负和付出努力的地方。

散落在秦岭山脉的村庄中，由于县医院的条件和诊疗技术有限，病人如果要去条件更好的市级医院就诊，需要一早赶去乡镇上搭车到县城，再乘车翻越秦岭大山，最终才能抵达大医院。就是这样的紧赶慢赶才能在下午停诊前挂上号，如果遇到大雪封路或大雨出现山体滑坡，就医的路程往往更加漫长。即使是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要平均四天上一次夜班，照顾着数十张床位的病人。有限的资源和条件限制了基层医生接触最新治疗方法以及研究学习的机会，在没有充足人力的情况下，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除了要完成日常诊疗外，还要肩负公共卫生、扶贫等任务。

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一往无前。周峰立志要在基层干出一番事业。利用工作的机会，他经常亲历临床第一线，与当地医生共同参与诊疗，遇到难题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请教母校的专家和老师们。另外，在交通、资源方面的短板无法瞬间弥补的情况下，周峰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当地医疗人才培养上，撰写了约7万字的《宝鸡市卫生科技成果及人才培养统计年鉴》。针对人民群众最密切相关的医疗需求，以及医务工作者最亟需提高的临床水平，周峰与母校取得了联系，后在附属儿科医院和妇产科医院的大力支持下，累计计划培养儿科骨干医护人员49名，妇产科骨干医护人员24名。并开展针对常见病、重大病的专题学术讲座和现场教学、会诊、手术等指导10余场，疑难杂症会诊55例。另外在皮肤病学、肝胆外科、传染病学、神经病学等多个领域，周峰都在努力牵线搭桥，为西部的医务工作者，为人民群众做更多服务的同时，还联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精准医保、医改政策研究等，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更高效、更公平、更规范地保障基层群众的健康。

近两年来，周峰开设了20多场科普讲座，开展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带领的团队获得了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科研立项，他自己本人也获得了陕西省科普使者称号，发表的论文获得市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面对取得的成绩，周峰觉得做的还远远不够多。

“那场讲座让我印象深刻，当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王宏老师在讲授羊水栓塞，这个对孕产妇最为凶险的疾病诊疗方法和经验时，我看到台下来自全市各区县百余名基层医护人员，他们有的迅速地抄着笔记，有的拿手机对着幻灯片拍照。所有医务工作者

的眼中都闪着光芒，我想这大概就是最美的智慧之光吧。也是在那一刻，让我更加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力量，能够为西部的医疗和教育事业贡献一己之力，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周峰说道。

以专业之能，行敬业之事，周峰在上海和宝鸡之间搭建桥梁，畅通了宝鸡医疗事业的大动脉，也绘制了一幅推动基层医疗事业发展进步蓝图与模板。

“消防员也是最可爱的人，不惜个人安危守护着我们的岁月静好，”周峰说，“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高强度训练，健康状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街道办事处挂职锻炼的时候，他契合机构改革，对辖区内的消防中队进行了调研。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的消防官兵对每年的体检结果与医师的健康建议不能完全理解，近八成官兵认为体检内容过于笼统。除了生理健康外，消防员常常要在火海惨象中亲历生离死别，心理上难免留下创伤，过半的战士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咨询服务。周峰立刻组织宝鸡市中心医院为消防队员增加个性化体检项目，并提供健康咨询、义诊，帮助困难队员家属方便就诊。

当地高发脑中风，很容易半身不遂，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护理成本像巨大的黑洞，击垮了无数家庭，迷茫无助的眼神和一声声哀叹重重地压在了周峰的心头。然而在西部，疾病的预防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周峰积极推进预防措施，并牵头建立医疗网络，努力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并全力参与瘫痪患者的康复与照料，对他们进行帮扶，在健康领域开展着脱贫攻坚。在他的帮助下，很多患者实现了生活自理，一个个失去希望的家庭重获新生。

“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充满着人性温度的人学。基层工作让我看到了在大城市见不到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医疗。”

刚到宝鸡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时，很多前辈、同事、朋友都担心周峰不做学术和科研后，专业会受到影响，但他却不这么认为。“在复旦大学所受到的科研训练，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科研思维和科研方法，用这些去服务基层群众，恰恰能在基层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走出更为宽广的道路。”周峰说道，“青年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相连的，当经历过从国家医学中心到村卫生室，从上海到西北后，我的视野和阅历都将更为宽阔，我也明白要通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才能担当起新时代的使命，实现幸福的中国梦。”

复旦“第七教学楼”的二十年青春接力

□文/王雨薇 潘晨

1998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为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复旦大学则是最早响应团中央、教育部号召，成立研究生支教团并前往支教地服务的高校，自1999年派出第一批研究生支教团至今20年从未间断。研究生支教团的成立和发展是对“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意义非凡的一笔注脚，支教学生也把支教地亲切地称为“第七教学楼”。

20年来，研支团队员们用青春在黄土地上耕耘，年复一年播种希望。到今天，共有322人次321位队员赴宁夏西吉、新疆拜城、贵州息烽和云南永平开展支教和扶贫服务，是全国派遣支教队员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他们以“教学-家访-文化-资助-宣传”五位一体的帮扶方式、围绕“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努力实现“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扶志”的支教理念，让更多的西部学子实现梦想，走向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20年过去，当年的复旦青年们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已经事业有成，有的去向更远的远方，续写着更多志愿者的故事。而每当提起这一年的支教时光，他们总能想起自己在西部的讲台上用一腔热血书写的故事，那些留下的欢笑和泪水，承载着太多的理

想与情怀。他们不仅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历，更与自己曾教过的学生以及当地人民结下了不解情缘。

与此同时，支教团也成为了连接支教地和外界的桥梁。20年来，支教团为服务学校募集的扶贫助学金、物品等价值已超过八百万元，除了资金捐赠与奖助学金外，支教团还为当地学校捐建了图书室、篮球场、体育活动室和多媒体教室等，大大改善了支教地的教学设施与硬件条件，甚至在宁夏地区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经由支教团被拧成一股绳，涓滴细流汇成爱心的河流，滋润着西部广袤的大地。

在研究生支教团日复一日的奉献中，涌现了冯艾、高天等一批典型人物，复旦研支团也在各类志愿者会议与活动中成为被表彰的团体，多次获得“中国杰出志愿服务集体”“全国百优青年志愿服务集体”“全国研究生支教团优秀组织奖”等荣誉。除此之外，这支队伍更创造了诸多的“第一”：全国第一位博士生支教队员沈宏、全国第一位留学生支教队员蔡沅银，以及全国第一位两次参加支教的志愿者张阳。



▲ 第一届研究生支教团西吉支教合影留念

2000年第二届支教团成员 冯艾： 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 冯艾（左）辅导学生

每一位支教团成员在决定前往西部支教前，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参加研支团就是“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这句话最初就是出自冯艾口中。

2000年是转折的一年，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年。20世纪的脚步尚未远去，21世纪的未知和丰富就扑面而来。时代是新的，研支团也是新的，对于那时的年轻人而言，研支团意味着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丰富的选择。于是在世纪之交，一切都充满着迈入新时代的喜悦的时候，冯艾也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人生的决定——去西部教书。

那年暑假，本科刚毕业的冯艾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漫长假期，但她却强烈渴望着开学——等到开学，她就会踏上那片黄土地，走进中国农村，开始她的支教生活。“当时我逢人就说，等我到了西吉，给我的学生资助啊。”虽是开玩笑，但早在真正身处那片土地之前，她就已经把那里的人和事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在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的西海固地区，多山少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活对于支教团的志愿者们而言非常艰难，但对于冯艾来

说，生活上的难比不上看到学生们基础薄弱时的痛心。冯艾本想着能够通过一年的奋斗，让孩子们的成绩突飞猛进，但到了西吉，现实却给了她无情的打击：“初一学生会写错自己的名字，高二的学生连dog都不会拼，还有孩子问我们：‘因特网’是用来打渔还是捉鸟的？”由于孩子们基础很薄弱，山区师资及教育资源也严重匮乏，复旦来的支教团志愿者当时被当作了万用万灵的“万金油”，冯艾教过语文、英语、政治，甚至还教过全校的音乐课。那时她一周要上30多节课，忙碌到常常连一周去一次县城洗澡都来不及。最忙的时候，冯艾连续工作28天，40多天只洗过一次澡。

在繁重的课业之余，冯艾最想做的，其实是转变当地老百姓的观念。在西吉支教的一年中，冯艾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学生家家访。当走进了学生的家，她更加体会到了农村人在观念上的局限。“我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学生的爸爸问我：‘你家有几个娃？’我说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姐姐。家长吃惊地问我：‘你家没男娃？’当地村民听说复旦的女老师来了，都跑来看热闹，这位孩子爸介绍我的时候第一句话竟然是‘她家没男娃’。”冯艾谈到这里有些哭笑不得，“从今往后我无论走到哪村哪户，一定要宣讲国家的人口政策，强调生男生女一个样。”

冯艾本科的专业是社会学，她一直认为本科期间的专业课学习不仅带给她知识，更多的是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是学会尊重社会差异、关注社会进步，是用所学知识推动群体乃至社会的进步。大学期间，冯艾的老师在课堂上曾说：“中国的文化底蕴在农村，农民是中国的脊梁，不了解中国农村，你就不了解中国。”而在西吉这一年，冯艾读懂了中国，这段经历在冯艾职业生涯的每一次选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几年过去了，冯艾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但工作内容始终围绕青年、服务青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冯艾曾三度支教，当过奥运会、世博会的志愿者；汶川大地震后冯艾甚至在灾区服务了十多天，还带着灾区的孩子们看大海。除此之外，冯艾还成为了第一位去往埃塞俄比亚的中文志愿者，在当地的大学教授中文，并开创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在非洲服务一年的先例。可以说在冯艾的志愿者经历与人生选择中，处处都能够看到西吉这一年的影子。那一句“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始终被冯艾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

冯艾笑称，自己的经历就是从非主流到主流，再到非主流。在冯艾去西吉支教的年代，志愿者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词，而十几年后的今天，志愿者这个词已经成为了“年度十大流行语”，无数的青年如当年的冯艾一样，选择成为志愿者，选择“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这让冯艾感到十分欣慰。志愿服务从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到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也让更多人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

2004年第六届支教团成员 沈宏： 支教就是在更广阔的教学楼里学习工作

如果要问复旦最远的教学楼在哪里，答案一定既不是六教也不是张江，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西部，有“复旦第七教学楼”之称的西吉。

而“第七教学楼”这个称呼，最开始其实是沈宏的博客名。2004年，门户网站和个人博客开始流行，当时的支教队也曾通过各种网络形式进行宣传。顺应着时代的浪潮，沈宏也在歪酷上建了博客，名字就叫第七教学楼。“这个名字来的也很简单，复旦本部编号的教学楼就六座，那么我们作为复旦的一批学生，到支教地的活动不就像在更广阔的教学楼里学习工作嘛。”教学相长，老师教学生，学生也教老师，就是沈宏当时对于支教活动的认识，也是沈宏给自己的博客起名“第七教学楼”的原因。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年他本意是用来和朋友家人沟通的博客，名字却一炮而红，被人们当作了研支团的象征。

研支团对于沈宏而言，是一个延迟满足的心愿。2000年沈宏本科毕业时就想去支教，但在领了报名表填完了基本信息之后，沈宏的内心开始了天人交战。“当时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理科学习的延续性如果被打断后，我可能需要很大的时间精力才能重新回到轨道上。”思虑再三后，沈宏没有提交填好的报名表。

2003年时，沈宏的学习进入博士阶段，并且手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结果，沈宏去支教的想法再次被唤醒了。这一次他没有过多的犹豫，最终成为了研究生支教团历史上第一位博士生志愿者。

沈宏作为博士生加入支教团，为支教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支教团的

经历对于沈宏也是难能可贵的机遇。“在眼下的社会中，真正地用这样的一年时间，在有组织保障的情况下，去到偏远落后地区，从事一年基础教育的工作，这是普通社会组织完全无力提供的。”通过加入支教团，沈宏来到西吉，和当地的孩子们、老师们以及教育工作者们一起探讨实践和教育本身；同时，他也对于完全不同地域人群有了全新的认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认识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塑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支教结束后，沈宏把所有的行李都寄回家，然后自己骑着自行车从三合中学出发，纵贯宁夏直到银川，沿途看遍了黄土高坡和塞上江南的风景，领略了西北之美，深深爱上了宁夏。往后沈宏总是不遗余力地向身边的人们“安利”宁夏的美好。

“一入西吉误终身”，一年的西部生活也让沈宏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不断思考支教的意义。“20年来，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成为一个‘油腻’的大叔，对于支教的思考也一直都在发生改变。”沈宏打趣道，“当时主要是个人的看法，现在更倾向于从国家脱贫战略、从西部发展大战略的角度去看待。”

相比根植于整个西部的贫困问题和众多贫困地区的学生和学校，每年几百个大学生的支教是渺小的，作为支教者个人而言，能够给西部带来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但沈宏认为支教志愿者更大的作用在于，他们成为了东西部之间看不见的管道和桥梁。“庞



▲ 2005年春，逢复旦百年校庆，沈宏（后排左一）和队员穿上校服在支教点附近合影，为母校庆生

大的社会资源通过这些支教队员或高校所构建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落后地区。支教这样的方式的存在，也代表着落后地区的儿童和年轻人对于资源的渴望。”谈到扶贫，人们总会提到“扶贫先扶智”，而沈宏认为，支教团这20年的实践，对于我国如何实现教育扶贫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也许这才是支教真正的意义所在。

光阴荏苒，那个名为“第七教学楼”的博客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沈宏也从一年的支教生活中收获成长，学会思考；“第七教学楼”的名字和象征意义也伴随着复旦研支团的延续而得到传承。

2004年第六届支教团成员 高天： 黄土地上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希望

从小到大，高天一直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好学生：当班干部、上重点初高中，大四的时候绩点3.7，已经足够保研。如果不去到西吉，她日后的生活轨迹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是人们常说“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当她想到自己以后很可能按部就班、工作成家、结婚生子时，她觉得这不是想要的人生，她想要去一个不同的地方，领略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开始一场“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式的冒险。

而当高天真的来到了西吉，她发现情况可能比她

之前想象得要棘手得多。在西吉高天教高三两个理科班的语文，一共150多个学生。他们马上就要和全国的学生一起参加高考，但他们的基础很差，大概150分的卷子只能考个50分。

刚开始，高天常常因为学生的成绩上不去而忧虑甚至发怒。十几年过去了，她至今仍然记得一次因为学生而生气的经历：“10月份的时候我们月考了一次，卷子有道诗词填空题，题目内容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发现班上有一个学生写错了，他周围的其他同学也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说明那场考试他们抄袭了。”高天严厉地批评了抄袭的学生，然而当晚上学生过来道歉时却对她说，“老师我们确实做得不对，但是你骂我们的话太深奥了，我们听不懂。”

面对这群连批评他们的话都听不懂的学生，高天除了愤怒，更感到哭笑不得：“我当时就想着，自己堂堂一个复旦高材生，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本意是为了改变学生，没想到却无能为力。”这一次经历一度让高天有些迷茫又灰心丧气，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和学生交流，让他们在高考前所剩无几的时间里能够把知识掌握得更牢。

转变发生在11月的一个凌晨。西吉的冬天来得很早，11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有一天凌晨三点，高天因严寒而醒来，却发现窗户外面有一簇烛光，还能听到一个女生背书的声音。因为窗户上结了厚厚的冰花，高天看不清女生的面容，甚至分辨不出她背的是中文还是英文。但在那个凌晨，高天感到自己被这簇烛光点亮了。那些灰心丧气的、黯淡的过往，都因为这点微弱的烛光而烟消云散了。“我想，这片土地上什么都缺，它缺水、缺电、缺钱，但是有一样东西它不缺，那就是希望。”高天下定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改变他们，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令人欣喜的是，孩子们最终也没有辜负高天的希望：两

个班一共150个学生在高考那年考出了40个本科、30个专科，没考上的学生里也有人选择了复读。到今天，大概已经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实现了当年高天的愿望，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县城买了房子，还有很多离开了农村举家搬到了银川、固原，有几个甚至当上了大学老师。

在所有学生中，令高天印象最深、也最为关切的是班上一个女同学，她的上学机会竟然是和家里5个姐妹“竞争”来的。在她们父母眼里，学习好才能继续读书，否则上学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挣钱或嫁人。所以她为了能够继续读书，一直拼命努力，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她的高中阶段，高天一直和她保持着书信来往，并为她联系了一份资助，帮助她读完了大学。这个女孩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成为了西吉中学的一名老师，赚了钱买了房子，把家里人都接到了县城。这个女孩的故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努力激励了众人，更因为她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女孩也可以读书，也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光宗耀祖。

学生们喜欢高天、亲近高天，高天也把自己挥洒过汗水和热血的西吉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第二娘家。她直到现在还和当年的学生保持着联系，甚至在自己结婚的时候还回到了西吉，拍了结婚照，请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们吃糖。

高天一直强调，在西吉这一年是她30年的学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我在那一年里得到的，远比自己付出的要多很多。”和自己的许多队友和前辈们一样，支教经历影响了高天的职业选择。

在去到西吉之前，高天的梦想是做一名战地记者，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观察者；而在西吉支教、深入农村之后，她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看到了一片广袤的土地，更看到了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生生不息的希望。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使高天不再满足于成为观察者和记录者，她想要成为参与者和改变者。现在的她希望成为一名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从而去改变更

多人的命运。

2005年第七届、2008年第十届支教团成员 张阳：支教对于我是地图，是指南针

作为复旦研支团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两度前往支教地的志愿者，张阳最开始想去支教仅仅是因为好奇：“大一的时候，我们寝室集体资助了宁夏西吉王民中学的一名学生，我就想去看看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连张阳自己也没想到，一年支教结束之后，她竟不想回来了。

而想要多留一年的原因，是她被学生的坚持和担当深深打动了。张阳教的是高三语文，后来也是高三



▲ 张阳在支教时的日常挑水

文科班的班主任。在高考发成绩单那天，张阳发现很多学生都没有到场，一问才知道班里好几个男生都在城里工地上打工，为了挣够来年复读的费用。于是张阳当时就决定休学一年，延长支教时间，陪着自己的学生复读。

当张阳又回到了村里，有一次在饭馆吃饭，老板坚决不收她的钱。这份朴实的善意使得她对于农村的教育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支教这一年感受到的善意不仅仅来自于学生，更来自于方方面面，如果我只想着陪自己的学生，为自己的学生做点什么，会不会太狭隘了？”于是张阳开始重



▲ 高天在讲台上

新思考，教育问题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更关键的杠杆解。如果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不是能够用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呢？

这样的思考推动着张阳重新上路，她要去寻找这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这样的初心推动着张阳在毕业后选择了讲台，成为了超级中学上海中学的一名老师。

从经历上看，张阳算得上是一个“非典型”教师。一是因为她学的并非师范专业，可以说在三合中学支教的这一年，那一方黄土地上不大的讲台才是她从教生涯的开端；二是因为张阳工作的学校，无论是三合中学还是上海中学，都是很特殊的学校——从硬件条件上来看，它们就是中国中学的两个极端：中国条件最不好的乡村中学和条件最好的超级中学。

面对来自大西北和东南沿海，在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上天差地别的学生们，张阳却始终觉得她面前坐着的是两群既不同又相同的学生：在这两所学校，老师们和学生们都跳出了资源的框架来思考教育的本质。西北是因为确实没有资源，所以不能用传统的资源框架去解决教育问题，只能寻求别的方法；而东南沿海确实资源丰富，但资源并不是越丰富越好。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资源诅咒”，也是张阳在上海中学给孩子们上经济课时必讲的知识点：某种资源的相对丰富可能会引起对这种资源的过分依赖，最终使得经济增长反而受到丰富资源的拖累。

张阳认为，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着资源诅咒。更多的教育资源可以带给学生更丰富的体验，但人们通常并不是通过体验来学习，而是通过对体验的反思来学习。因而她认为做好教育，最为重要的不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而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使学生能够跳脱出资源的迷信，转而将整个世界都视作自己的资源，从而在资源的重新组合和配置中获得创新的能力。

在张阳满怀希望的努力之下，孩子们也用创新性的思维给了她无数的惊喜。“参加上海市教学大赛时，我选的内容是科学发展观，我问怎样才能提高中国的人均钢铁蓄积量？当时在我脑中设想了无数类似于汽车、轨道交通、高铁这样的在城市生活中的真实答案。而当学生说出‘中国的西部还需要钢铁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那一刻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可遇不可求的答案。”功夫永远

不会让有心人失望，张阳相信，总有一天，曾经坐在她的课堂上的两群学生能够同行，并且与国家的、社会的发展同行。

支教给了张阳一张地图，一张关于教育的全景图；也给了张阳一个指南针，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张阳希望并相信着，那一群群与她有着相同志向与目标的少年，真真实实站在西部乡村学校讲台上的少年，能够给世界带来一个个如印度电影《三个傻瓜》中的乡村学校一样小而美的学校。这是当年误打误撞进入教育行业的她所能收获的，中国教育行业最好的礼物。

2007年第九届支教团成员 蔡沅银： 和学生之间的缘分，仿佛是冥冥中注定好的

对于蔡沅银而言，支教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段机缘，因为他在成为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之前，甚至根本没听说过支教这件事。从马来西亚来到复旦求学的蔡沅银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介绍了农村教育的困境，还提到了农村学校师资极其匮乏，尤其是英语老师。“电视上说农村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我觉得这对他们很不公平，所以才起了当志愿者的念头。”

经由当时留学生办公室的杨增国主任介绍，蔡沅银成为了复旦研支团有史以来第一位留学生志愿者，前往三合中学支教。

作为一个东南亚人，突然来到寒冷干燥的西北，初期蔡沅银感到新鲜又有压力。因为西吉天气寒冷，十月初就下了第一场雪，从小生活在热带的他感到十分惊讶和兴奋。大西北严寒的冬天需要他们劈柴、挑火炭和生炉子，这对于他来说是个新鲜的体验。而不适应的地方则在于，西北水资源匮乏，他们只能一两周去县城洗一次澡。作为一个一天至少洗澡两次的东南亚人，这对蔡沅银无疑又是一个挑战。

生活上的挑战容易克服，在教学上蔡沅银也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小时候学英语都是念单词、看文章，没有很强调语法学习，语法是自然而然习惯的。到了三合中学，教英语得教语法，这个我教不来，只好安排另一位支教老师李楠来帮我的学生特别上个语法课。”同时，面对小学三到六年级根本没学过英语的学生，蔡沅银必须在一年里把小学四年的英语课



▲ 2007年蔡沅银（左）和学生王连彪（右）于西吉三合中学合影



▲ 2018年蔡沅银（右）和学生王连彪（左）于新加坡合影

全补上，他感到压力巨大，学生们也感到十分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单词的印象，但毕竟时间紧凑，他能做到的主要还是让孩子们对学习产生兴趣。这让蔡沅银感到有些遗憾，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教学生们。

一年后蔡沅银离开了西吉，离开了他教的六年级学生，但奇妙的是，他们之间的缘分并未结束。支教结束后，蔡沅银回去三合过几次。一次是在他的学生刚上初一的时候，蔡沅银回到西吉看看他们是否能跟得上初中的进度，也算是对自己一年教学成果的检验；另外两次分别是他的学生中考和高考的时候，他回去给孩子们加油打气。

后来他的学生们长大了，很多都到了银川念书或发展，而此时已经毕业在新加坡打理家族生意的蔡沅

银也收获了人生中最奇妙的一段际遇。当年教书时的班长王连彪，两年前从宁夏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去新加坡发展，协助蔡沅银管理生意。“十一年前我去宁夏教他英语，十一年后，他来到新加坡在生意上助我一臂之力，这种缘分确实很奇妙，像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一样。”蔡沅银十分感叹，他当年在西吉播种下的希望，一路生根发芽，最终以他也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他的人生中开花结果。

一直以来，蔡沅银都把自己当成自愿者，而不是志愿者。他的志愿不是去教书，但他是自愿去当地教书的，既然是自愿，当不求回报，虽然不求回报，但蔡沅银在这一年中却收获了太多太多。因此对于这一年的支教经历，对于当地的老师学生和一同支教的队友，蔡沅银心中是满满的感恩；对山里的孩子们，蔡沅银也希望他们能念好书，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

2010年第十二届支教团成员 申宸： 支教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

小时候，每当我们到了上学的年纪，爸妈总是会忙着帮我们在家里寻觅或者置办一张高度合适的书桌供我们学习，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写字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用正确的姿势，不然可能会让我们患上近视或驼背的毛病。

当我们觉得爸妈的唠叨很烦的时候，我们或许没有想过，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孩子连书桌也用不起，只能趴在炕上写作业和读书。而这就是申宸初到西吉三合中学时，去学生家里家访看到的景象。

“刚开始家访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后来有一次家访，我突然注意到，学生家似乎连书桌都没有，我就问学生：‘你们平时在家怎么写作业啊？’学生告诉我：‘趴在炕上写。’”当城里的中学生大学生对宿舍里的小书桌习以为常的时候，原来很多西部的孩子连学习最起码的设施保障都没有。后来申宸还发现，由于长期以来写作业和阅读的姿势不正确，学生中近视的很多。在当时，这样的景象对申宸一贯的认知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让他下决心切实为学生们做点事情。这就是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一张书桌”计划的起源。

“当时我和队友就决定发起‘一张书桌’计划，



▲ 申宸（中）去沿坪村小给小学生们送书

募资为学生们买我们在大学宿舍常用的小书桌。第一批小书桌有近千张，从募捐到采购再到安装和发放，都是我们队员们合力完成的，覆盖了当时在宁夏的全部四所学校。”这是申宸在一年的支教生涯中成就感最高的一刻。

更让申宸和一同支教的伙伴们惊喜和感动的是，后来有爱心人士主动提出要长期资助“一张书桌”计划。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群山里的孩子们，关注到了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困境，并且愿意献出力量来帮助他们。学生们写字的书桌是教育中最小的细节，而正是从最小的细节开始，孩子们的生活因为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而悄然改变。

申宸自己就是一个“教师家族”的孩子，家里人几乎都是老师，而他自己却并不想成为一个老师。

“因为我一家人基本都是老师，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做老师了，所以很想体验下站上讲台的感觉。”对教师工作的好奇和对祖国西北的向往成为了申宸申请去往宁夏支教的原因。在宁夏的日子里，他收获的不仅仅是大西北的美丽和对教师生活以及教师责任更深刻的认识，更拥有一群感情颇深的友人。

“刚去的时候我还跃跃欲试想要在三合练出一手好厨艺，之后有个周末我们王民中学的一个队友于萌来串门，第二天他要早起赶班车回去，而我们三合的姐姐们还在睡觉，我就自告奋勇炒了个木耳给他做早餐，当时他还说很好吃。后来姐姐们起床之后尝了尝发现没炒熟，之后我就死心了，老老实实挑水挑煤洗碗了。”虽然木耳没炒熟，但申宸和于萌的关系倒是快速“升温”，最终两人成为了一辈子的老铁。

西吉带给申宸和他的队友们最多的，还是职业方向的塑造。站在讲台上的满足感使得和申宸同届去往王民中学支教的队友们在研究生毕业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成为中学教师；申宸自己虽然没有成为教师，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基层工作的选调生，曾经从西部离开的他现在又回到了西部，成为了一名村支书。西吉成为了当年这群热血少年们人生路上的指路灯，指引着他们前行的同时，也成为他们迷茫时候的灯塔和疲惫时候休息的港湾，直到现在申宸和队友们仍然不时回到当年支教的中学。看看自己的学生和学校，就好像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 校党委书记焦扬（前排右四）一行在西吉看望支教团成员

后记

2019年5月15日，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始服务20年之际，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来到西吉探望了正在支教地服务的第二十届研究生支教团，并与支教团的志愿者们亲切会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一同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提及复旦研支团的历史，焦书记谈到：20年来复旦研支团为西吉的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志愿者们兢兢业业完成了本职教学任务和诸多的扶贫助困工作，更体现在支教队员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变了山区群众的教育理念，传播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科学的思想观念。

第六届支教队的队长高天曾经讲过一个故事，2008年，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去西吉看望支教队员，和当地教育局局长聊天时问他，复旦在西吉支教十年，给西吉带来了什么改变。在这名局长的眼中，校园设施、互联网、奖学金和成绩都不是最重要的，他觉得最重要的改变在于：娃娃娃读书多了，娃娃们的普通话说得更好了。

在西吉这片土地上，20年来最可贵也最可爱的东西是希望和成长。20年前，女孩子剪短发、穿裙子在西吉被视为伤风败俗；女孩子在家里不受重视，读到高中的少之又少。十年前，在这个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山沟沟里，一群女孩穿着复旦校名T恤，穿着复旦同学捐给他们的牛仔裤，在黄土坡的操场上跳街舞，充满了自信和美；而到了今天，这群在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能够在学校崭新的足球场上为所有人献上一场足球赛，别开生面，洋溢着青春和活力。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与其说我改变了西部，不如说西部让我变得更加饱满”，这一句句质朴的话语，都是支教队员们在西部大地上支教后的感触。支教生活为复旦学子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育。未来，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还会继续前行在西部的广袤土地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用真心和行动书写充满希望的青春篇章。



▲ 宁夏西海固王民中学支教榜（1999年-2019年）

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名单 (1999-2019)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1	崔倩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白崖中学
1	解帆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	丁怡	法学院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1	潘惜唇	法学院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1	黄继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兴隆中学
2	冯艾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白崖中学
2	史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宁夏西吉	白崖中学
2	戴浩然	法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2	张列列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2	董骁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2	苏鸣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3	丁旻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3	黄加锐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3	黄媛媛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3	罗文婷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3	李佳美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3	凌云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3	王鹏	材料科学系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3	赵路平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4	洪苑昌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偏城中学
4	鲁绍臣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偏城中学
4	汤恒晟	物理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4	邢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4	许颖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4	展冬玲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4	钱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4	张勇	临床医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4	侯宇静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4	孙敏莉	临床医学院	宁夏西吉	新营中学
5	高颖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5	乐晓磊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5	吴育晶	药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5	贺振华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5	徐敏霞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5	赵雅超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5	郑拯国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5	牛念宗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5	宋瑞秋	法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6	黄略明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6	裴晓思	临床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6	沈竹莺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6	周莺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6	高天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6	何宏平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6	李晓蓓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6	倪金花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6	沈宏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6	郑娟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6	范惠众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6	朱俊	药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7	房正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7	龚晋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7	李冬茵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7	朱鋆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7	邓竞魁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乔梁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杨溯	法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姚美娟	法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张萍	临床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张潇晗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张阳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7	梁柱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7	周斌	临床医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8	吕双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8	王冰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8	徐圣楠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8	许俊哲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8	胡欢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8	沈东川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8	王帆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8	王凡平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8	王玉平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8	徐贝贝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8	余亚宇	法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8	余佳奇	法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8	朱湘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8	陈哲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8	杨朕宇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9	高飞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9	李楠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9	倪丹成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9	王子文	公共卫生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9	蔡沅银	中国语言文学系(留学生)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车智怡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陈曦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梁佩思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孙欢欢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王昕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王崑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赵琪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9	吴胜春	航空航天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9	孟夏	管理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9	向仕明	法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0	陈冠兵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0	李鸣	药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0	刘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0	姚峥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0	陈命男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董晓易	药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杜小琴	材料科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邱琪华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张阳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郑丹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朱彤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0	蔡璟孜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0	方昊成	化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0	王铸成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0	张韬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0	陈静	哲学学院	宁夏银川	月牙湖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10	鲁康寅	经济学院	宁夏银川	月牙湖中学
10	张叶航	法学院	宁夏银川	月牙湖中学
11	陆婷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1	吴金玲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1	张邢程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1	刘钟元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1	彭先红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1	钱晨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1	肉克亚古丽·马合木提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1	吴恒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1	谭艺渊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1	王凯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1	耿悦	法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1	郭新超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1	韩同超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1	胡捷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1	宋照宇	中国语言文学系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1	徐瑶	中国语言文学系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2	卡丽比努尔·帕日哈提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2	陆秀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2	倪振豪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2	赵恩达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2	秦昀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2	王翠华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2	艾晓燕	法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2	顾萌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2	申宸	软件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2	唐吉云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2	王一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2	沈硕	物理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2	于萌	高分子科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2	李华杉	法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2	李汇东	管理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2	彭晓华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2	苏升	经济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3	陈勇勇	物理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3	杜彦君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13	徐德伦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3	再努热·吐尔逊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3	陈柏良	物理学系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3	顾旻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3	陈无梦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3	顾皓卿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3	卢杉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3	汪一梦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3	陈之衡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3	刘艳波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3	程乐欢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3	何代东	法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3	何京鸿	经济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3	秋钦夫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4	韩康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4	侯玉君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4	刘香花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4	王琛莹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4	蒋民军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4	邵桂龙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4	脱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4	代龙妹	护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4	欧亚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4	王冕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4	张剑兰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4	石烁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4	于米提·吾布力	法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4	樊洋希	经济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4	毛佩瑶	经济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4	唐荣堂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4	宣天晟	管理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5	弭雪莹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5	热依汗古丽·买买提	公共卫生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5	钟山	历史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5	朱学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5	李佳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5	李晓颖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5	姚有为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5	陈叶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15	马继愈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5	沈烨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5	吴曼丽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5	陈静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5	李杨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5	沈逸超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5	魏诗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5	刘晓光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5	谢飞翔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5	李江	管理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5	李路	历史学系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5	刘柯言	经济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5	任家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6	阿迪拉·阿哈提	经济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6	付宇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6	彭坤	新闻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6	诸诣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6	邱宁斌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6	余佳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6	张晓娜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6	杜彧文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6	李璠	计算机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6	刘秀秀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6	袁雪琪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6	范圣男	材料科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6	刘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6	袁鸣徽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6	李浩	数学科学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6	孟亚琦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6	范佳秋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6	韩鹏程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6	刘淑君	微电子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6	茅泽希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7	阿依帕丽	法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7	陈思鹏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7	段玉柱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7	高文红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7	胡热莱依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7	黄温馨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17	冷帝豪	数学科学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7	李雄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7	梁淑娟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7	吕一品	经济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7	倪源蔚	物理学系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7	秦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7	任学欣	法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7	施嘉恒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7	吴梓敬	数学科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7	徐驭尧	历史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7	闫格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7	闫一平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7	张逸佳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7	赵煜茜	管理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8	阿迪拉·阿力木江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8	巢静雯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8	陈辉艳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8	戴祥薇	数学科学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8	高昕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8	管吉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8	江林晚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8	刘雨晴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8	孙毓斐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8	汤添婷	中国语言文学系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8	唐庆国	经济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8	王佳竑	管理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8	王露霖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8	王思琪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8	刑天意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8	徐创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8	张弘	法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8	朱寒焯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8	左旭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9	白钰	经济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9	保琰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9	耿鑫宇	物理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9	古丽米热	历史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9	过馨妍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9	李炼烁	历史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9	李晴菲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9	刘超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9	刘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届次	姓名	院系	服务地	受援学校
19	刘润雨	历史学系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9	马楚涵	新闻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9	乔艳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部计划）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19	史诗奇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9	王璇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19	吴宇伦	法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19	闫雨恒	法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19	杨建伟	哲学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19	殷嘉声	法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19	赵凯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20	阿卜杜米吉提·艾麦提	药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20	曹均艳	护理学院	云南永平	北斗乡九年一贯制
20	迪丽菲热·艾尔肯	历史学系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20	焦莞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20	李倩雯	药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20	廖明月	经济学院	云南永平	北斗乡九年一贯制
20	米钦	法学院（西部计划）	云南永平	北斗乡九年一贯制
20	牟俏寒	中国语言文学系	宁夏西吉	将台中学
20	潘晨	历史学系	云南永平	北斗乡九年一贯制
20	荣星喻	临床医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20	施畅	新闻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20	王丹丹	哲学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20	王雨薇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20	王正娴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20	王志远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20	向橄叶子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新疆拜城	拜城二中
20	杨陈浩彤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20	杨喆军	化学系	宁夏西吉	三合中学
20	张煜昱	经济学院	宁夏西吉	平峰中学
20	张子榆	材料科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20	祝姝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贵州息烽	乌江复旦
20	左宗正	材料科学系	宁夏西吉	王民中学

守护心脏：记中山医院心研所的医者

□ 文/邓昌斌 潘佳钰 王翊 吴彦斌

前言

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是人体循环系统的动力泵，它隐于胸腔深处，个头虽小却动力十足，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血液从心脏出发，以平均每秒几十厘米的速度在血管中奔腾不息，给身体各器官输送维系活力的新鲜氧气和营养物质。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目前国内心血管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现患病人数约2.9亿，其中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1100万，心衰450万，肺心病500万，风心病250万，先心病200万，高血压2.7亿。中国人口的心脏健康问题，形势不容乐观，并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心血管病的防治刻不容缓。

守护心脏，是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的共同责任。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始建于1958年，已走过六十年历程，现主体坐落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6号楼。这里布局了心内科、心外科、心超科、心电图室、中心实验室、卫生部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等科室和部门。风雨砥砺六十年，在历任黄家驷、沈克非、石美鑫、陈灏珠等所长的带领下，经过几代人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在医、教、研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心研所优良的医术、医德、医风在每个人身上不断传承。如今，当心研所的医者把导丝穿入冠脉，或开始一台新的心脏外科手术，或在超声探头引导下执刀，他们都是在以十分甚至十二分的严谨，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呵护、挽救一颗颗脆弱的心脏。

守护心脏，已成为心研所医者六十年来责任所在、仁心所系。这份守护，由心研所新一辈专家学者：葛均波、钱菊英、王春生、舒先红、邹云增等延续、践行，并传递着医者大爱。

心内科：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早上8:00，斜土路1609号，中山医院心血管病门急诊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输着液的病人被匆匆推入急诊室。医生，向来是病人和家属目光聚焦的中心。这天心内科总值班医生是赵吉，她一出现就被家属团团围住，数不清的病历、检查单、手术同意书、住院申请单被递了过来，赵吉需要自动屏蔽周遭的喧嚣，接过单子，镇静地做出最理性的判断。

赵吉在总值班这个岗位上才刚刚工作了一周，她的一天是从早上7:30大交班时开始的，每次值班都需持续24小时。“做到一定资历的医生会申请做总值班，通过见到更多、更紧急、更直接的病例，获得在门诊或病房得不到的锻炼。”赵吉2006年考取研究生，2008年进入中山医院，读博时师从姜红。赵吉前几年反复在病房、急诊及门诊岗位轮转，慢慢觉得需要业务提升，就申请了心内科总值班。她简单介绍这个岗位的概念：“兼顾各个科室对于心内科的需求，包括急诊室、心内科监护室及其他内外科等。”

抢救室里有两例心脏病人需要赵吉会诊，即所谓的“急会诊”。赵吉建议25号病人去做一个冠脉造影，又转身看了15号病人的心电图，听了主诉，赵吉判断这是一例疑似心肌梗塞，建议手术，而且要尽快，“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症状发生12小时以内有急诊做冠脉造影手术的指征”。同时她提醒家属：“心梗瞬息万变，你们也要有心理准备。”赵吉说着拿起手机，打给二楼的“心脏介入中心”，联系尽快安排手术台。

随即，赵吉转到抢救室医生办公室，为急诊的15号病人开单子。“冲在第一线的还是急诊抢救室和台面的医生，我们总值班属于二线。”一路匆匆，她说不了几句完整的话，就会被手机铃声一再打断。

9:30左右，赵吉终于把15号病人送到二楼的“心脏介入中心”。直到此时，病人的儿子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他轻轻按了按母亲的肩膀，目送她被推入手术室。

手术室旁有个“家属谈话室”，房门开合，悬挂的电视屏幕上可以调出放大的黑白冠脉实时影像，直径2-4毫米的冠脉在心肌表层辐射出弯弯曲曲的几条，随着心跳微微颤动。这一天赵吉的硕士导师葛均波院士也排了手术，利用手术间隙，他正满头

大汗地站在这块屏幕下跟家属谈话，在告知病情及风险并得到家属做出决定后，再次快速转身回到手术台继续实施救治。

而此时的赵吉则早已穿过院内的“风雨走廊”，赶往3号楼的肾内科、消化科、血液科病房去看几例“平会诊”病人。

中午11:50，赵吉写好病历，赶回“心脏介入中心”吃饭，同时给手机充电。餐桌上不少医生都是直接从手术台上下来吃饭的，他们来不及褪掉手术服、手术帽，一边扒拉饭菜，一边讨论病情。此时，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东也端着餐盘坐了下来。

“所有的急性心肌梗死抢救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抢时间问题。”面对记者的到访，黄东在午饭间隙，用最快的语速介绍了院内急性心梗介入治疗绿色通道概况。他从加入绿色通道抢救团队到现在，已近十个年头，是跟随业务迅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2009年那个春节，从大年三十直到年初六，我基本上都没有安稳地吃过一顿饭。急诊电话一打给我，就马上放下筷子赶过来。”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这是绿色通道抢救团队的共识。理论上，心梗发作两小时内是黄金抢救时间，否则心肌细胞损伤过多，就无法修复。上世纪90年代，中山医院在华东地区率先开启“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绿色通道”，1999年7月，葛均波主持心导管室工作后，进一步健全了“绿色通道”机制，丰富了治疗内容。“医生们都放弃了休息时间，整个团队接到电话都必须半小时内赶过来，葛均波院士、钱菊英主任都是亲自带着年轻的医生一起做手术，这让我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黄东说道。

“绿色通道”是一整套抢救流程，即院内急救系统针对心梗病人，所有项目都是优先级：先抽血、先检查、先手术，甚至可以先救治再付费，为此，医院需承担一定风险。目前中山医院心梗绿色通道这个团队，能做PCI（经皮冠脉介入治疗）主刀医生的已有十五六位，手术成功率超过96%。黄东的成长得益于医院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我们比较注重梯队建设，年轻医生一般做两到三年助手后开始接手急诊任务，很考验临床诊断能力、手术能力以及精力和体力，同时个人成长也会有很好的上升空间”。

近30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急剧增加，死亡率居高不下。据2015年统计，每死亡5个人中，就



有2例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医疗机构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绿色通道虽然在中山医院层面畅通无阻，能更及时地救助患者，但它能否在社会层面有效复制，则更需注重流程及制度的建设与优化，需要政府搭台、媒体宣传以及社会资源支持。

建设绿色通道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心梗瞬息万变，所以我们更主张就近治疗，怎么把病人送到能做这个手术的最近的医院也是一个问题。”黄东说，“入院前的救治宣传、自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发病，我们不建议病人用私家车，因为120急救有一套抢救设备和救助团队”。2016年，在身为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的葛均波院士的倡导下，根据中国的地域、人口数量、冠心病急性心梗的发病情况等，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和中国胸痛中心总部计划通过3年的努力，在全国建立1000家胸痛中心。按统一的胸痛中心规范标准来要求提交申请的医疗机构，通过一个阶段的建设，达到胸痛中心的认证标准。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心血管疾病的急救、诊疗流程，即抢救人员在救护车上完成对病人信息的有效采集，第一时间将数据传递到医院，在患者抵达医院前的这段时间内，医生完成对患者既往病史的了解，对病情提出预判，提前准备好可能的医疗方案及用药，在患者抵达医院后，迅速开展有效抢救。这一创举的目的是缩短发病与治疗的时间间隔，将大大有益于患者。“胸痛中心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普及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目标是形成全国性的急性心梗救治的一张网。最近三到五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推动和发展也很快，尤其在上海的县级以及区级医院。胸痛中心跟绿色通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院前……”话还没说完，黄东就被一通急诊手术的电话给叫走了，留在桌子上的是没有来得及吃完的午饭。

心脏介入中心的每个人都跟黄东一样，短暂地休息后，脚步匆匆，或奔向手术台，或奔向门诊、病房。患者的病情是无声的催促，他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争取时间。

心外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下午3:00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CSICU）里，摆满了40张病床，各种医疗仪器令人眼花缭乱，并交替发出“滴滴”的声响。期间不时有医生、护士进

出为病人做检查和治疗。这一天的心外科总值班是李化，他除了负责各科室的心外科会诊请求和急诊室心外科病人的诊疗外，还需要在下午五点交班之后，负责ICU中13张床位的心外科病人。

“心外科比较特殊，一般病人病情较重，死亡率高，专业性强，因此要非常密切地关注病人的术后状况。”李化介绍说，“所以心外科医生必须进入监护室，跟重症医学科共同承担病人的术后观察与处理，如遇病情危急，需要就地迅速抢救。”

李化2004年考入心研所，师从心外科主任王春生教授，六年后博士毕业便留在这里工作，如今已是第九个年头。这些年，心外科已发展出五个亚专科，包括“心脏瓣膜外科”“冠脉外科”“晚期心脏病外科”“大血管外科”及“微创心血管外科”等，李化的专业正属于其中的心脏瓣膜外科。

“心外科是外科‘皇冠上的明珠’。相对其他科室来说，心外科医生成长需要的时间最长，放手最晚。”遍观心外科的主刀医生中，没有哪一位不是经历了至少十年的时间才成长起来的。

“最凶险的是主动脉夹层手术，对人的考验、锻炼也最大。发病48小时内死亡率高达50%，及时手术是唯一的救治方式。”李化还记得，几年前王春生主任那次通宵达旦的手术经历。“王主任每天安排常规手术7至8台。有一天晚上，常规手术之后，急诊来了两个主动脉夹层病人，王主任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手术。”那时一台主动脉夹层手术需6-8小时，王春生同时开了两台，一直做到凌晨五点钟才结束。之后的当天上午王春生又参加了院内的主任会议，接着又进手术室开了两台冠脉搭桥手术。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经过王春生不眠不休抢救的危重病人预后都非常好。王春生宛如一个枕戈待旦的将军，星夜驰援、连续作战而无一不乘胜凯旋。李化亲眼见证了导师的“拼”和“稳”，在心底生出由衷的佩服，并时刻以此自勉。

“王主任有幽默的一面，但对人对己的要求却特别严格，他是科室领军人物，担负着临床和科研的重任。”心外科八楼会议室的墙上贴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八个大字，李化说，“是王主任要求贴上去的，应该说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我们心外科医生的状态，不能糊弄，不能懈怠。”这八个字深入人心，俨然成为心外科的第一守则，无人逾矩。“因为我们一

直并肩作战、对抗病魔，所以同事之间彼此的情谊，比一条战壕里的弟兄还要深。”李化一边拍着身边屠医生的肩膀一边说道。随即，他来到病房跟一位病人家属进行术前谈话。

“以诚待人，这是王主任对我们术前谈话的基本要求。”李化约谈的这位病人，将在翌日接受心脏瓣膜手术，就心外科目前的水平来看，难度系数并不高。但术前让病人了解病因和治疗方案，以及风险预判，不仅可以帮助病人做好心理建设，也有助于医患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术后并发症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一旦发生就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心外科的术前谈话比其他科的要求都要高。”李化说。

近年来，心外科不仅在擅长的技术领域方面加强巩固，还开展了多项新技术的临床研发，如多种微创心外科手术、胸腹动脉瘤手术、主动脉瓣成形术、David手术、双侧乳内动脉及全动脉搭桥、微创房颤消融术、ECMO、经心尖瓣膜植入术和机器人手术等，在国际上都处在领先的地位。新的挑战需要勇者，但不需要匹夫之勇。李化说：“迄今为止我们开展的每一项新技术都是成功的，我们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葛均波：梦想在前，使命催征

美国萨拉纳克湖畔长眠着一位特鲁多医生，他的墓志铭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在百年之后仍被奉为圭臬，说明了医学发展至今，医生在面对某些疾病时仍然有心无力。但同时，有理想的医生们也从未放弃过尝试治愈的努力。

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导致我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元凶。在40年前，医生对于冠心病这一顽疾的处理方法，只有让患者躺在监护室接受观察、等待命运的安排。而40年后的今天，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崛起和祖国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冠心病成为了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经过以葛均波为代表的医者们的努



▲ 葛均波（左）院士与患者交谈

力，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重燃起新生的希望。

数十年前，年轻的葛均波怀着“学医学，利天下”的理想，成为了一名心血管病医生。1990年，葛均波赴德国美因兹大学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疗。在那里，他苦练基本功，并且开创性地发现了心肌桥特异的“半月现象”“指尖现象”及其药物治疗方法，这些成果被编入了国际上经典的心血管病教科书中。忘我的工作给他的回报是丰厚的，作为一个外来求学者，他得到了连许多德国医生都梦寐以求的职位——德国Essen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这个职位给了他大展拳脚的空间，在任上，他第一次将先进的介入技术介绍到了国内。

1994年春节，葛均波第一次回国进行学术交流。那一年，有一位患严重心梗的老先生经主治医生的介绍找到了他。老先生的情况不容乐观：大面积心梗，三根冠状动脉全部严重狭窄，最重要的前降支99%闭塞，并且严重钙化，常规的介入手段完全无法应用。主治医生束手无策，他向病人推荐了“来自德国的教授”。黄皮肤、黑头发的葛均波用在德国学习到的最新冠心病介入治疗旋磨技术，完成了国内首例高频旋磨手术。手术后老先生的症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生命危险也已暂时解除。在2000年、2009年、2018

年，葛均波又为老先生施行了三次介入治疗，如今九十多岁的老先生仍然健康且思维敏捷，前不久还带着自己写的爱情小说来拜访他，并为此特地染了发。葛均波从中得到了无比的成就感，因为患者的病愈，无疑是医者最高的荣誉。

1999年，身在异乡的葛均波一直牵挂着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毅然做出了一个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回国。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上医，进入中山医院担任心内科主任。当时心血管病介入治疗已成为国际心血管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人。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全世界共有约200万名患者接受了心血管介入治疗，全中国却仅有不到8000例，中山医院心导管手术量更是不足百例，其中介入治疗仅80多例，仅仅处于起步的阶段。他临危受命，尽其所能地创造条件，鼓励科室每个人发挥专长，培养心血管高端人才，推动心血管诊疗技术的革新。

20年来，葛均波的团队在心血管介入治疗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在2005年自主研发出的国产可降解涂层药物洗脱支架，不仅将价格降至进口支架的四分之一，每年为患者和国家省下医疗费用支出高达数十亿元，而且更适合国人的体质。2013年，他们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完全可降解生物支架，更有利于患者术后的冠脉功能恢复。

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除病人的痛苦。所有的努力，也都以此目标为前行的动力。

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最佳方法是急诊手术介入治疗，尽早疏通堵塞的血管，如果心梗超过12个小时，心脏的大面积损伤将难以逆转。为了缩短急性心梗的救治时间，葛均波和同事们在中山医院设立了华东地区首条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绿色通道”，并24小时向患者敞开生命之门。多年来，他的生活状态经常是被电话铃声从睡梦中惊醒，然后紧急奔赴手术室进行抢救。全天候开通“绿色通道”这一举措的成果也是丰硕的，中山医院每年抢救近40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成功率高达97%。

由于长期在X线下工作，心内科医生做手术时需要穿几十斤重的铅衣，导致很多心内科医生都饱受腰椎间盘突出之苦，葛均波也不例外，常常需要绑着腰托做手术。在病情日趋严重时，骨科医生嘱咐必须卧床休息，他心里何尝不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实在是无

法将自己的病人置之不理。2000年6月，在他腰椎间盘突出病发作期间，心内科收治了一个多支冠脉堵塞的重症病人。在主治医生向他报告了病情之后，他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坐着轮椅到现场亲自察看病人的检查结果、确定手术方案，并与心外科医生讨论之后为病人进行了急诊搭桥手术。18年后，病人超预期服役的桥血管不堪重负、再次堵塞，手术难度进一步加大。葛均波与团队成员经过讨论，决定使用创新技术疏通已经阻塞多年、踪影全无的右冠脉，然后再植入支架。手术进行三个多小时，最终病人转危为安。他时常强调，医生要努力解除病人的病痛，心中要有责任和奉献精神。虽然做介入治疗占用了大部分休息时间，但是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面对疑难复杂的病例，葛均波和他的团队也从未退缩。不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这是中山医院心内科的郑重承诺。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曾经报道过葛均波接治的一个真实病例。一位在7岁时因先天性心脏病做过手术的儿童，术后第3年有活动后晕厥的症状，在多方求医未果的情况下，患儿已经出现心力衰竭，生命危在旦夕。葛均波仔细研究了患儿的检查结果，结合患儿的手术史找出了病因，决定施行介入治疗。然而，当他们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却发现由于患儿体格太小、导致没有适用的导管型号，加上患儿本身心肺功能不全，所以术中情况险象环生，葛均波和他的团队花费超过常人数倍的努力，才将其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在病人家属几乎绝望的时候，纵然有委屈和无奈，葛均波也丝毫没有顾及治疗失败、名誉扫地的风险，没有放弃救治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从一例儿童罕见病救治案例中获得灵感，并向相关日本专家寻求技术支持，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救治这位患儿，孩子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能力。他至今保存着孩子的父母赠送的一面“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的锦旗，是为纪念，也是为了激励自己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更努力前行。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葛均波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和创新，造就了中山医院心内科的辉煌，也引领了整个中国医学界的发展和革新。“鬲兹诸君，功何有？利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葛均波追求的目标远不是现有的成就，造福更多患者、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终生，这才是他终生的信仰。

钱菊英：锐意进取铺就医者底色

在心脏介入手术室旁边一个小小的休息室，我们见到了刚下手术台的钱菊英教授。钱菊英每周安排一天的手术和两个半天的门诊，手底下还带着博士生和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学生。作为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以及新晋中山医院副院长，除科研和临床工作之外，钱菊英还要兼顾科室、心研所以及医院层面的管理工作。即便如此繁忙，面对病人，她都会付出十二分的耐心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门诊从早晨开诊到下午五六点结束，一天大概能看五六十个病人。”谈到这个，钱菊英略带遗憾地说道，“接诊的速度是快不了的，一小时看六个号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病人，因为这些病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远道而来求医问诊不容易，所以要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医治。”而在手术室一天的工作则更加紧张繁忙，从早到晚20例手术，加班成了常态，经常到晚上七、八点钟手术室里依然有人，工作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也并不鲜见。

1986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钱菊英在经历六年的本科学习之后，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山医院心内科任住院医师。在心内科工作两年后，钱菊英考取在职研究生继续深造，先后师从林佑善、沈学东、陈灏珠和葛均波四位导师。这堪称一个“明星”导师阵容，钱菊英为此感到幸运，“中山医院在心内科方面的研究是特别拔尖的，而这几位导师又都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心内科



▲ 钱菊英（右一）开展心脏介入手术

几十年来的辉煌历史也主要是由他们在书写，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么多的学习机会”。对本就有志于心内科临床工作的钱菊英来说，这份幸运当中，传递着心研所一以贯之的医术医德，也包含了一份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的气魄。这些，都为她日后的成长谱就了医者底色。

钱菊英致力于研究血管内超声和多普勒血流速度测定对冠状动脉病变评价方面的应用。1996年起，钱菊英率先在国内开展经血管内超声的体元模型三维重建；1997年，钱菊英又首先在国内开展经冠状动脉内多普勒血流速度测定的研究。1999年，钱菊英从德国埃森大学医院心内科进修归来，在德期间她从事冠心病的血管内超声和多普勒检查研究，学习了冠脉介入治疗技术，包括高频旋磨术等多项新技术，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同在1999年，于德工作近十年的葛均波，以首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身份回国，主持中山医院心内科的心导管室工作。此时正值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的蓬勃发展阶段，冠心病介入治疗相关技术渐趋成熟，国内能够实施PCI手术的医院已经由最早的几家、几十家发展到几百家。随着葛均波院士和钱菊英教授的加入，中山医院心内科翻开了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新篇章，心内科从最初一年能做80多例PCI手术，到现在每年能做6000例以上，且成功率超过98%。

葛均波、钱菊英的归国还带动了华东地区首个急性心梗绿色通道的高速运转。自开通之日起，绿色通道就担负着与死神赛跑的重任。在钱菊英的回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参与绿色通道是抢救一名81岁的心梗病人，那是大年初一，她和葛均波院士都是在与家人团聚的年夜饭桌上被紧急召到医院的。“最早做这个急诊介入治疗的地点是在枫林路180号的9号楼底楼……有的病人病情实在危急，在入院的路上就需要抢救了。”往事历历在目，病人的心跳何尝不牵动着医生的心跳。令钱菊英欣慰的是，经过严格的梯队建设，从最初只有寥寥数人能够主刀到现在，年轻的医生中也已经有十几人足够胜任这项工作了，而未来伴随

着全国 1000 家“胸痛中心”在全国铺开，“绿色通道”的救助经验必将惠及更多患者。

中山医院心内科在老一辈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陈灏珠院士等人的领导下，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很多新技术介入治疗手段，包括我国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首例人工心脏起搏器植入术等，有着辉煌的历史。近二十年来，中山医院心内科在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的带领下更是蓬勃发展，目前是我国国内综合性医疗机构规模最大的心血管病中心，以及最重要的心血管疾病诊疗临床和科研基地之一。它聚集了多名心血管领域高端人才，涌现出一批医学领域重大科技成果，多项研究站在了学科前沿。其中，在血管内超声研究、新型冠脉支架研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极大推动了我国心血管临床诊疗规范和技术革新；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心肌桥特有的“半月现象”和“指尖现象”，使心肌桥的检出率接近 100%，并修正了传统治疗方法，成果已被录入国内外心血管病教科书；在国际上率先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RACTS 研究），确立了西洛他唑在冠脉支架内再狭窄防治中的作用和地位，2003 年被美国 TCT 会议评为该年度十大“最新突破性研究”。此外，还有国际首创“逆行导引钢丝对吻技术”、首例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首例经皮二尖瓣修复术、首例完全可吸收冠脉支架研发和植入等，这些近年来心血管领域重要的创新型技术均源自中山医院心内科。

放眼世界，这样的站位带来的则是更为严苛的自我审视。钱菊英承认，虽然我国在某些技术上已完全不输于其他国家，但创新的部分，还略有欠缺。在这方面，她对葛均波院士的创新精神甚为敬佩。一直以来，葛均波致力于做新技术的推动者，以技术融合医术，是行业内“最高难度”的代名词，他的行动力与决断力深深影响着身边同仁，更为病人带来了福祉。针对传统冠脉药物支架的固有缺陷，2005 年，由葛均波主持研制的“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支架”，使致死性血栓的形成和发生由原来的 1.2-1.9% 降至 0.34%，每年超过 8 万例冠心病患者获益。后来，可降解支架的使用扩大到俄罗斯、新加坡、印度等国。如今，团队又着手研究设计一种新型支架，目标是让支架既可以实现金属支架一般强有力的支撑，又能够完全降解，且没有生物炎症反应。该款支架在 2017 年 1 月已经完成 1230 例人体实验，目前已完成病人 1 年的

随访，正在上市审批阶段。此外，他牵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联合富有创新活力的青年临床心血管医师、工程师、企业等，其初衷在于从临床角度改良、创新医疗器械，弥补实验室制造的不足。

钱菊英强调，保持创新能力，需要多出去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和管理模式，同时也需要做临床资料、样本的收集和整理等细节工作。另外在学科交叉和应用方面，心研所很早就开始与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的王威琪院士、微电子系的汪源源教授等团队开展合作。除此之外，心内科还建立了与多所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的机制，让更多优秀的年轻医生“走出去，带回来”，打造一支“精锐之师”。

距离下一台手术还有一点点时间，钱菊英带笔者参观了心内科风雨 60 年历史的展示墙，陶寿淇、陈灏珠、诸骏仁、浦寿月、林佑善、蔡迺绳……面对一串响亮的名字，钱菊英的脸上写满了骄傲与亲切，他们或是教科书上的泰斗，或曾对她耳提面命，倾囊以授，或曾与年轻的医生们一起，推着急救车，踏碎了无数月夜星光。

王春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平时办公室基本是不太可能找到一个外科医生的，他们大多不是在手术，就是在去手术的路上。手术结束后的短暂间隙，我们在手术更衣室旁的休息间里见到了心外科主任王春生教授，他的脚上趿着一双轻便易换的鞋子，身着还没有来得及换掉的手术服。王春生告诉我们刚刚结束了第四台手术，下午还有三台手术要做。他的嗓音略显疲惫沙哑，但是思路却清晰缜密，反映出他在手术台上的细致、严谨与果断。这份高强度的工作，也恰是王春生的职业自豪感所在。

15 岁就考入上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的王春生有一份堪称完美的履历，毕业后他顺利进入中山医院心外科工作。心外科的准入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时任心外科主任的王敏生教授又以严厉著称，在临床实习中，不论谁犯错都会被他不留情地批评，但是似乎只有王春生是唯一的“例外”。

“我完全是王主任手把手带出来的。”聪明的王春生也意识到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在做住院医师时，

他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把经手的每一个病例都记录下来，并把病因总结、消化、吸收为宝贵的个人经验。通过严师的耳提面命和自己勤奋刻苦的钻研，王春生的专业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以至于后来，王敏生手术时都会要求这位“嫡传”的得意徒弟在场。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的锻炼和学习，为王春生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4 年，王春生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两年后，中山医院杨秉辉院长飞鸿传书，情真意切地邀请王春生重回中山医院心外科，重塑并再造心外科的辉煌。一面是科研、医疗技术发达的美国，一面是求贤若渴、令人魂牵梦绕的中山医院，王春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998 年，年仅 34 岁的王春生学成归国，被破格任命为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当时的中山医院心外科，因人才断层、技术落后，正处于发展的低谷。期望和压力，同时加在王春生身上。上任之后，王春生锐意推动制度改革，着力增加科室的手术数量、床位数和监护室数量，患者周转率也明显上升。同时，他带头做手术，并勇于尝试和挑战最危险的病例，用自己的勤奋和专业赢得了同仁的尊重，赢得了病人的信赖。

复兴中山医院心外科，如果要重振在业界的位置，就必须要在一个有竞争力的手术项目上取得突破。为此心外科把目标对准了“心脏移植”这道难题，并决定齐心协力打赢这场战役。此前，王春生在美国求学时曾接触过移植技术，国内也有过成功案例。但当时在中山医院，这还是一块尚未被攻克的高地。

“2000 年为了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顺利进行，整个科室甚至整个心研所都被全力调度起来。”王春生回忆道，“那台手术动用了一百多人，在手术的前一夜，我们有位院领导半夜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紧张地失眠了。”王春生带领由心外科（陈志强、洪涛、丁文军、陈昊等）、心内科（王齐兵）、心血管麻醉组（姜楨）、体外循环组（胡克俭）及护理人员等组成的心脏移植小组，为一位患扩张型心肌病的 12 岁女孩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例儿童心脏移植手术。此后，心外科又做了几十例心脏移植，由此中山医院成为了国内第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做心脏移植的医院，在数量上，也逐渐占据了国内心脏移植的半壁江山。王春生本人也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心脏移植专家之一、心脏移



▲ 王春生（左）与当时国内第一例儿童心脏移植患者

植技术规范 and 准入制度的主要制定人。

学无止境，随后王春生带领团队又攻入了心肺联合移植的“禁区”。

此前，国内无人尝试心肺联合移植，王春生团队接手的第一例心肺移植手术是在 2002 年。当时可谓困难重重：患者已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手术，术中移植供体晚到了几个小时，期间只能靠体外循环维持患者生命……种种意外状况，令手术过程惊心动魄，所幸最终有惊无险地宣告成功。17 年后的今天，89 岁高龄的患者仍然健在。经此一役，国内心肺联合移植的“禁区”正式被王春生团队攻破。

高难度的心肺移植，凶险无比的主动脉夹层手术……曾经这类耗时长、多急诊的手术都需“心外科第一把刀”王春生亲自完成，他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这种情形其实不利于心外科的健康发展。七八年前，王春生挑选了两组医生加以重点训练，手把手地带他们连续做了十几台主动脉夹层手术，使团队迅速成长，成立大血管亚专科的条件也水到渠成。“亚专科化是心外科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在后备人才充足的情况下，现在的年轻医生很难全面发展，但是在专业化程度上需要做到当仁不让。”王春生说。他根据心外科最具优势的临床方向，带领科室设立了五个亚

专科，为心外科在各个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夯实了基础。

科室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常规手术的微创化。王春生主任回忆起一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女性，当她愈后一年回访时，对胸口的术后疤痕仍是耿耿于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王春生敏锐地意识到了心外科和心内科的融合趋势，开始思考微创手术的必要性。事实上，自葛均波院士任心研所所长期间，便已积极尝试推动心脏内外科“杂交”治疗的模式。王春生强调，心脏科是一个整体，外科手术中虽然会不断利用到现代化科技，但也热切期待心内科的介入方式以减小患者创伤，最后两者形成交集。“在这点上，我们和葛均波院士是达成共识的，即心脏手术会逐渐向微创化的方向发展。对我们心外科来说这是新的挑战。”如今，心外科的先心病和瓣膜病等常规手术已经做到了微创化，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经过黄家驷、石美鑫、任长裕、王敏生、蒋振斌等老一辈专家多年积累，以及在新生代王春生主任的带领下，中山医院心外科目前已成为国内排名前四、华东排名第一的中国最顶尖心脏外科中心，尤以微创心血管手术、心脏移植术、大动脉手术、冠脉搭桥术、心脏瓣膜手术等为最主要的医疗特色。

王春生在心外各领域全面开花的成长经历是一个特例，但如今心外科一例例漂亮的手术却不再是偶然。五个亚专科的人才梯队，令心外科星光熠熠。尽管如此，在每一台新手术面前，王春生仍然习惯于把既有的成绩抹零，要求全体科室人员身体力行来自医学泰斗张孝骞的八字箴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着行医时间愈长，王春生体会愈深，对生命也愈加敬畏：“不要觉得做100台手术都很好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无论何时都要有像第一次上手术台那样如履薄冰的心态，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舒先红：“你是我的眼”

舒先红从办公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刚刚出版的、厚厚的《超声心动图在经导管血管治疗中的应用》递给记者。这本书作为“东方心脏文库”系列图书之一，由我国著名心脏病专家陈灏珠院士总主审、葛均波院士总主编、潘翠珍和舒先红教授主编，是中山医院心研所近年来在心脏介入超声领域的开创性工作

和经验成果的总结。书中精选心研所开展介入治疗以来的200余例病例，包含彩图300余幅，视频150余个，是关于超声心动图在心脏介入治疗中应用的参考工具书，也是国内首部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动态影像的医学专著。在2017年5月的东方心脏病学大会(OCC)上，举行了该书的首发式。用手机扫描书上的二维码，病例的超声心动图就会跳出来，“这是左心室，这是左心房”“这是房间隔缺损的三维图像”，舒先红指着心动图给记者进行简单的科普。

超声心动图在经导管心脏病介入治疗新技术方面的应用，是近年来舒先红团队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超声心动图现已成为心脏介入治疗不可或缺的评价手段，它不但可以直观反映心脏和大血管的结构形态，而且可以实时显示其生理活动情况，以及心脏功能动态评估等，而且在心脏介入术前筛选临床病例、术中监测和引导、术后即刻评价疗效以及术后随访等方面都发挥着其他影像学方法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怎么形容超声？有句歌词唱得好，就是‘你是我的眼’。”舒先红介绍，心脏超声具有无创伤、易操作、可重复、价格低廉等优势，是做心血管诊断影像学的首选手段。有人一度把心超科室看做辅助部门，但在临床工作中，舒先红深切地感受到，心超在临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功能。“手术的时候主刀医生非常依赖超声，超声医生的探头，主导着医生心导管和介入器械的方向：进一点、退一点、左、右、再进一点……”舒先红爱笑，说话语速也很快。

从心内科医生到超声与临床的结合，从学生、医生、教师蜕变为学科带头人、心脏超声诊断科（以下简称心超科）主任，在这条锐意进取的路上，舒先红一直致力于为心脏疾病的诊疗“擦亮慧眼”。

1990年，舒先红以全年级总分第二名的成绩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获免试保送资格攻读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研究生，师从中国超声心动图学先驱之一、时任中山医院副院长的姜楞教授。1992年转为硕博连读，师从心研所时任所长陈灏珠教授。

姜楞是引导舒先红走入心内科和心超科的领路人。“当时姜老师隔年才招一名学生，我刚好赶上，成了姜老师收的第一个女学生，也是姜老师在国内的关门弟子。”心内科出身的姜楞，不仅是心内科的行家，更是中山医院心超科的奠基人，对国外最先进的技术了如指掌，一直积极学习和引进。她知识渊博，

雷厉风行，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每次查房的时候，哪怕我躲在人群的最后面，或者角落里，姜老师也会把我单独拎出来提问。”言及此，舒先红还能将导师当年那句“小舒在哪里？”模仿得惟妙惟肖。姜楞的提问不会局限于心血管方面，内科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都会涉及。舒先红在紧张、汗颜之余，总是迎难而上，每次查房前翻教材、查资料，充分做好功课，知识储备也因此日渐丰厚。

自从进入医学院起，舒先红就很崇敬陈灏珠院士，1992年，舒先红由硕士转读博士学位，正式师从陈灏珠院士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习。陈灏珠的儒雅与严谨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严谨治学，又平易近人，从未见到过陈老师发脾气”。

在临床技能的培养上，陈灏珠院士也言传身教，带着舒先红听诊和查房，许多疑难病例都先让她提出诊疗意见，然后再作指导。在英文查房时，陈院士也会及时指出翻译不够准确之处。从心脏诊断“望触叩听”时代走来的陈院士，其专业而精准的临床判断能力，更是无人能及。舒先红告诉记者：“陈教授的听力特别好，心脏杂音判断得特别准确。他的听诊水平早已全国著名，能听出Ⅱ度Ⅰ型房室传导阻滞。”

舒先红一直很感念陈院士对自己方方面面的培养。在没有升博士生导师以前，舒先红曾作为导师组第一成员和陈院士一起带博士、定课题，并且在31岁时就担任了全国心血管病继续教育学习班的授课老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为了舒先红讲课的知识更加完善，陈院士亲自修改教学材料，在她主办的国家级全国心脏超声学习班上亲临指导以及授课。除此以外，陈院士还让她参加编写权威教材，如《实用内科学》《实用心脏病学》。在她翻译Braunwald的《心脏病学》时，陈院士还亲自用红笔定图、审稿和修改。

“在科研方面，陈老师亲自为我修改论文，包括英语单词的准确应用，甚至标点符号、验证、分析数据以及选图。支持我出国开会发言，让我担任第13届国际心脏超声多普勒年会的秘书长，推荐我担任专业杂志的编委。鼓励我申请国家级科研基金，并担任推荐人等，这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对我的个人成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舒先红说。

1995年，在陈灏珠鼓励下，舒先红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内科从事博士



▲ 舒先红（中）在指导学生

后研究工作。“我在美国的四年里，导师一直勉励我回国效力，给我讲中山医院和国内的大好形势，年底还给我寄贺卡，这都坚定了我学成归国的信念。”

1998年舒先红学成回国，羽毛丰盈，回到了挚爱的中山医院。不久沈学东主任赴美，心超科的重担便落在了舒先红的肩膀上。须知，自1984年成立开始，中山医院心超科的总体医疗和科研水平就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和世界先进水平，多项研究工作均为国内首创或最早开展的单位之一，这片“江山”，是舒先红曾经的恩师陈灏珠、姜楞、沈学东等前辈共同打下来的。如何让中山心超科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不到33岁的舒先红感到了压力，更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在科室同仁的支持下，舒先红推动建立了一系列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对科室临床工作在“质”和“量”上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建立和完善病例登记制度，让每一位心超病人都拥有一个永久属于自己的超声号，方便日后检索和对照；日常的录像和磁光盘用于记录典型病例的超声图像资料；工作再忙也坚持随访病人；一旦发现和手术结果不相符合的病例，就在全科范围内进行讨论，把这些书本上难以看到的、点点滴滴的临床经验逐步积累、丰富起来。同时，舒先红自身亦不断向更高的科研水平挑战，在国内率先或较早开展并推广了多项超声心动图新技术，如实时三维经胸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心肌应变和应变率显像、经静脉实时心肌声学造影显像、斑点追踪显像、心肌扭转评价等无创新技术。如此，心超诊断与外科

手术的符合率不断提高，从舒先红刚归国时的95%，提升到98.8%，再到目前的99.6%，为世界之先。今天来看，心超科这双“眼睛”，着实没有辜负前辈的奠定之功，也没有辜负舒先红们的延续之力，十几年来，心超科始终与心研所的整体发展齐头并进，保持着一双“眼睛”应有的“洞见力”。

多年以后成长为学科带头人的舒先红，因为性格跟姜楞很像，常被人称之为“小姜楞”。舒先红既是心超科主任，亦是心内科主任医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出诊时，舒先红习惯随身携带两件工具，一个便携式（经胸）超声检测仪，一个听诊器，她把超声当做“眼睛”，把听诊器当做“耳朵”，“眼耳并用”，不断在心血管疾病的诊疗中，探寻着常人肉眼不可见的“心脏秘密”。

学而不怠，诲人不倦。导师的榜样力量和殷切教诲，一直激励着舒先红锐意进取，并取得众多成绩和荣誉。2003年，舒先红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中山医院最年轻的教授，紧接着在第二年成为中山医院最年轻的博导。她还在2001年获得了“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职工”称号，并同年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2002年入选“上海市医苑新星”人才培养计划，2004年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获得上海市第十届“银蛇奖”二等奖，2015年获得上海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17年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以及2019年获得第二届上海“医树奖”一等奖等。如今，舒先红还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分会超声心动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更多人服务。

舒先红也像当年的恩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培养下一代学生，她要求学生“眼睛擦得亮一点，看得多一点”。在2019年6月的美国超声心动图协会（ASE）的年会上，舒先红团队有17篇论文入选，创造了心超科的新历史，也创造了ASE年会科室论文数量最多的新记录。桃李芬芳，是对心研所薪火相承的最好褒奖。

姜楞：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光

2017年5月的上海，天朗气清，温情洋溢，第十一届东方心脏病大会（OCC）在上海世博中心开

幕。OCC首创于2007年，十年间影响力愈来愈大，中山医院心研所一直是OCC的重要参会及承办单位。在会场里脚步匆匆的，多是心血管病方面的医生、专家、学者，其中不乏闻名遐迩的泰斗级人物和业界权威，如陈灏珠院士、葛均波院士，以及国内现代心脏超声的开创者之一：姜楞教授。

姜楞教授是受OCC心脏影像论坛坛主舒先红教授的邀请，特地从美国赶来，并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短暂的午休时间，姜楞坐下来，一句一句，向笔者勾勒出中山医院心研所心脏超声科最初的轮廓。这是一个“上海乃至全国心脏超声科发展的故事”，忆及这段堪称“开天辟地”的经历，谈及心研所的先贤前辈，姜楞神采飞扬，而又充满敬意。

姜楞在分配到心研所心内科工作几年后，被选入了由心研所老所长，著名心脏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带领的人工瓣膜替换团队，并参加了首例人工瓣膜替换术病人的救治。作为心研所的创始人之一，石美鑫所长始终倾力于心研所的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并时刻关注着国际上心血管专业的发展动向。他远见卓识，提出要力改当时心脏超声与心血管临床“隔离”的



▲ 姜楞参加第十一届东方心脏病大会期间

状况，认为必须由心血管临床医生拿起心脏超声的探头，才能与世界接轨。1980年初，在石美鑫所长的支持下，时任心内科主任陈灏珠教授委派姜楞去负责心研所心脏超声诊断室的建设和开发。那时姜楞已经是心内科的副主任，熟练掌握心导管及心脏除颤起搏的技能，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心脏外科”学术领域，环顾周边的重重阻力，她起初很是犹豫，但最终还是咬咬牙接下了这个任务。随后，一台简易的Aloka 1二维心超仪被安置于心研所大楼底层的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并配备了一名刚毕业的超声技术员，就这样，心研所的“心超诊断室”成立了。在兄弟医院同行的帮助下，姜楞勤学苦练，并挑灯夜战汲取对她来说全新的知识。次年，世界卫生组织给中国两个出国进修心脏超声技术的名额，在石美鑫所长、陈灏珠主任和浦寿月副主任的积极鼓励下，姜楞从毫无准备、犹豫不决到决定报考。凭借着在上医和中山医院打下的坚实基础，她在上海和全国范围的考试中名列前茅，成功拿到了出国留学的名额，于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MGH）学习。

“在那里我得到了国际著名心超专家、二维超声心动图的奠基人 Dr. Weyman 的直接指导，接受国际一流的心超正规训练，饱阅了大量的心超专著和有关文献。”在美国，从事心超的医生都必须先是从心血管临床医生开始做起，她亲眼目睹心超在心血管临床医疗和科研中的价值，对心超这门新兴技术从怀疑、观望、坚信，乃至爱不释手。她更加领会石美鑫和陈灏珠教授的嘱托，心中涌动着回国奋斗的豪情与责任感。

两年后，姜楞学成而归，在国内率先引进了彩色多普勒和经食道超声技术，并率先开展了术中心脏超声的应用。在一例例疑难杂症的诊断中，她所引进的现代心超技术初露锋芒。不久，心内、心外科的青年医生以及原中山超声波室和放射科的干将们纷纷加入，包括沈学东、曹期龄、施月芳、朱慧君和潘文明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心超队伍很快壮大起来。心超室的发展从此驶入了快车道。依托心内、心外科的丰富资源，心超团队利用先进的技术做出了许多突破，并在多种心血管病的诊断中，特别是在瓣膜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方面，无创性心超诊断部分替代了传统的有创性心导管检查，为心导管检查起到重要补

充作用。由此，全国各地慕名前来进修的同行络绎不绝，转来的会诊病例也与日剧增，小小的心超室可谓“人满为患”。她记得有一次心超室的一块煤气砖烧不起来了，大家都说“室内的氧气不够用啦！”，彼时场景在姜楞的记忆中仍然十分鲜活。

每日繁忙的超声诊断工作，除了使团队的临床经验与日俱增，还积累了大量有手术和病理结果可参照的病例。大家在工作之余，都会随访和总结病例，书写论文或病例报告，因此加班已成为家常便饭。她回忆说：“当年沈学东是我的‘右手’，有一次他因为忙到深夜才回家，半夜被夫人惩罚拖地板。”这么多年过去，说到这个“梗”，姜楞仍是忍俊不禁，“同事们生活中的琐事，是当年我们工作之余难得的调味剂”。她自己也曾因为忙于工作，未能顾及到生病的儿子，丈夫“告”到院领导那里，结果告出了一个“全国三八红旗手”。

在那时，牺牲和奉献是这个年轻的心超团队的主旋律。当时没有加班费和奖金，也没有职称评定之忧，每个人都出于自己内心对心超的热爱，所以没有人埋怨工作的辛苦。他们有时也会“苦”中寻乐，用发表论文所得的稿费在节假日集体携带家属外出旅游和休整。这样的团队凝聚力无疑是惊人的，科室的成员紧密团结，与心内、心外科及其他辅助科室合作，为治病救人和推广新技术不遗余力。另外心超室还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心超学习班，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学术交流理念，与国际紧密接轨，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众多心超专业人才，“心超培训基地”也成为中山医院心研所招收研究生的一块亮丽的金字招牌。

心超团队的创造力也是惊人的，曾获得过很多部级和市级的科研奖项。1987年，姜楞与当时上医解剖学教研室的左焕琛教授合作，制作了一套在国际领先的，由实体解剖对照的食道超声系列标准切面图谱，并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这项成果后来被 Dr. Weyman 收录到他于1992年再版的巨著《二维超声心动图》的专章中，并将一张食道超声配有彩色多普勒的实例作为该书的首页封面。至今这个系列切面图谱仍是学习和掌握食道超声的重要参考。“这是具有特色性的现代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结合，是我们上医的骄傲。”姜楞说道。

1990年“世界心超之父” Dr. Inge Edler 来华访问并参观了中山医院心研所的心超室，那时他们正在

开展心肌灌注超声显像的实验研究。Dr. Edler 在参观后，禁不住地连说了两个“没有想到”，一是 40 年前他是世界上拿起超声探头扫描心脏第一人，没有想到后来心超的发展速度会如此惊人；二是他压根也没有想到中国竟有如此先进的心超室，甚至已经超过他所在的那家瑞典医院。来自业界这么高的评价和肯定，对当时的心超室同仁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2017 年恰逢心研所在全国率先引进“经食道超声技术”30 周年纪念，敢为人先的心超科至今仍然当仁不让地保持着国际先进的水平。当年从这个心超室走出来的博士生葛均波、舒先红和潘翠珍等青年医生，如今都已成长为心血管病领域的权威和精英。这一条由姜楞为首的老一辈心超团队闯出来的创新之路，仍然时时刻刻担负着引领国内心超高水平发展的重任；无创、简易以及可移动的心超技术在未来，特别是在经导管瓣膜病及先心病干预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姜楞作为中山医院心超室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铸就它奋进的灵魂，“每逢回国，我都会找机会踏进心超室，和手中紧握接力棒的后起之秀们一起饮水思源，展望未来”。

姜楞欣慰地看到，这里的故事还在续写精彩篇章，一辈一辈的年轻人，正手持超声探头，由“心”开始。

邹云增：精准医疗，必然要求创新

枫林校区明道楼的六楼，是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的所在地，“邹云增实验室”即驻扎于此。心研所副所长邹云增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并于 1991 年赴日本做分子心脏病学研究，师从闻名亚洲的分子心脏病学专家、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矢崎义雄和小室一成教授；后又赴千叶大学协助小室一成教授创建新的内科实验室。“也许是缘分，我有幸认识了葛均波院士，他的爱国精神感动了我，我觉得是该回国为老百姓服务了。”邹云增与葛均波院士既有“山东老乡”的缘分，又是心内科同行，两人惺惺相惜，所见略同。2004 年邹云增受葛院士之邀回国，担任心研所中心实验室主任，同时又是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的双聘教授。

心研所中心实验室是葛均波院士于 1998 年 40 周年所庆之际成立的，由 1958 年研究所建所之初的生化、药理、病理等实验室合并而成。经过 40 年潜心发展，心研所在临床方面的建树在国内堪称一骑绝尘，但医学的进步需要紧密地同步于时代，临床的发展更需借力于基础研究的推动。随着社会的改革与转型，物质、医疗条件的改善，饮食、生活习惯的变迁，我国的心脏病病种也在世纪之交发生了质的变化。邹云增介绍，曾经高发的心肌炎、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降低了，代之而起的是代谢性疾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等，而且发病率越来越高。同时由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老年性心脏病病例大幅增加。病种的变迁，迫切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分子生物学科研队伍。邹云增回国之初，国内心血管领域鲜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与国外的差距较大。基础科研需要摆脱低水平徘徊不前的状态，向分子心脏病学突破，这个重任就这样摆在心研所的面前。

先是在日本东京大学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后又在千叶大学积

累了创建实验室的经验。邹云增回国后，在葛均波院士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际最新型的高分辨率小动物超声检测系统实验平台，用于无创监测小动物的心脏功能。动物实验的研究模型是否成功，超声是很重要的评价手段，但是以前在国内评价实验老鼠的心脏主要依靠人体检测的超声仪器。邹云增将这台机器引进并放置于生物医学研究院，对外开放的十多年间，该平台吸引了众多高校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络绎不绝地前来取经、接受培训，其影响力逐渐辐射到全国，许多国家级项目，如 973 课题、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也都借由这个平台完成超声评价功能，可谓战功赫赫。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心研所中心实验室不仅科研地位越来越高，实验室人员也越来越多，目前分在两处：复旦大学枫林校区明道楼六楼和中山医院 19 号楼二楼。邹云增说：“尽管在国内综合医院中我们已经算非常大的实验室，但仍需要不断扩容。”实验室的目标是未来建成国内一流的心血管病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基地。

作为国内分子心脏病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邹云增的研究方向包括高血压、心肌肥厚、心肌再生的干细胞研究，他的多项科研成果已在国内创造了多个第一。其中，机械负荷直接激活血管紧张素 AT1 型实验及临床研究为众多高血压患者带来了福音。“研究发现，临床上有两种受体活化方式，针对不同的病人应选用不同的阻断方式，达到降压目的。其中 AT1 受体被机械力活化，容易导致高血压。我们根据这一理论选择有效的阻断剂，如奥美沙坦，目前也在申请专利。”邹云增团队因此于 2014 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将研究成果和药物推广出去，将有更多的高血压患者得到对症下药的治疗，“这就是精准医疗。”邹云增说，“目前很多针对心脏病的药物治疗还未达到效果，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不断攀高，而且目前的指南大都来自欧美等国家，虽然先进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亚洲人。那我们就需要从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开始，也就是找到和扫除基因层面的危险因素。”邹云增认为，想要未雨绸缪，研究方向就要前移，分子生物学的使命，一个是防治结合，另一个是临床和基础相结合，最终实现针对个体的预防和治疗。“要做出有创新的基础研究，才能做出有特色的临床转化。”

邹云增既是科研人员，又是一名心内科医生，不

时有病人打听到他的实验室，跑来递上病例和检查报告，耐心的邹云增便需要时不时地在医疗、科研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当笔者问及哪一种状态更接近人生的终极追求时，邹云增回答：“一开始是想做一个好医生，觉得治病救人是最重要的。”当他留学之后，意识到中国人口众多，医生资源匮乏，能做好预防医学，把病人挡在去医院的路上，才是邹云增的根本目的，也是基础研究的终极使命！

杨英珍：最根本是服务人群

中山医院 19 号楼，从小木桥路进门走到底便是。此间静谧，容纳着几乎所有落地于中山医院的研究机构，市井喧嚣在其背后渐渐隐去。在二楼的卫生部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一名技术员将小鼠的心肌细胞从培养皿取出，在显微镜下放大 400 倍后，细胞有绿豆大小，“你看它们一皱一皱的，那就是心脏在跳动”。这些跳动的细胞，恰是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的“实验品”。

病毒性心脏病包括病毒性心肌炎和扩张型心肌病，以往扩张型心肌病五年生存率只有 50%，近些年经过努力，国内外的治疗效果均显著改善，病死率明显降低。“1979 年，我们建立心血管病毒研究室的初衷，就是控制病毒性心肌炎不要成为慢性心肌炎，最后演变成扩张型心肌病，以减少扩张型心肌病的病死率、病残率。”心研所在病毒性心脏病领域的基础研究是国内最早的，迄今为止也是国内最领先的，作为实验室的名誉主任和创立者之一，杨英珍无疑是这段历史的重要书写者。

上世纪中期，立志学医的杨英珍考入原上海医科大学，因为喜欢心脏学科，她又考取国内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中山医院心内科的创始人陶寿淇教授的研究生，并于 1962 年取得硕士学位。杨英珍的毕业论文是《家兔动脉粥样硬化的中药及运动干预》，也是中山医院最早从事冠心病研究的一项科研工作。她犹记得，恩师陶寿淇逐字逐句地修改她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陶教授的治学精神使我毕生受益，为我以后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准线。”在陶寿淇的悉心指导下，杨英珍开始了在心内科领域绵延一生的探索与研究。

1978 年，一位肿瘤医院的医生因突发早搏猝死，



▲ 邹云增（中）与团队研讨交流



▲ 1996年杨英珍（左一）和研究生们在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院讨论

经上医微生物教研组闻玉梅教授等所做的解剖分析和心肌病毒分离后，发现这位医生是因感染“柯萨奇 B5 病毒”，引起心肌炎导致死亡的。“当时心脏早搏患者较多，其中很多和心肌炎有关系，病死率很高。”发现这一发病机理之后，杨英珍、浦寿月等几位同事便将共同创建的早搏门诊转换为国内第一个心肌炎专科门诊。后又受卫生部委托，心研所开始于 1979 年建立心血管病毒研究室，杨英珍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那时的杨英珍已是一名高年资的临床医生，为了这一份新的科研工作，她像小学生一样勤学病毒学基础知识、苦练基本技能。1981 年底，杨英珍赴美国进行病毒性心脏病方面的深造。“临走前，石美鑫所长跟我说，你一定要回来。”杨英珍牢记师长的殷殷嘱托，在美国学习了先进的知识、见识了先进的实验室制度和设备、学会了高科技的计算机之后，她毫不犹豫地回归心研所，为研究室的建设与学科的成长，投入了全部精力。“我回来立即用科研经费给实验室买了计算机，IAPX 286，我们是中山医院最早用上计算机的实验室。”杨英珍笑道。

在美国学习时，杨英珍接触到干扰素，知道它对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有一定效果。回国后，杨英珍想到：“黄芪在肝炎治疗中有效，心肌炎既然也是病毒性的，那就试试黄芪。”这个想法灵光一现，随后被付诸实践，杨英珍就此开创了中西药结合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方法。陈灏珠院士建议杨英珍申请中科院的科研课题，并参与了课题研究工作，当 1989 年研究室拿到“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杨英珍把

陈灏珠的名字也写在其中。“虽然陈院士根本不计较这些，但他对我的成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杨英珍以医者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前辈的感激。直到现在，该方法仍然得到多国专家的认同。

研究室的事业一步步建立，杨英珍也越来越感到分子水平基础研究的重要性，1993 年，杨英珍向时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汤钊猷申请，带科室的年轻医生去德国著名研究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学习分子生物学知识，吸取新的经验。“医生的知识一定要应用于临床才有价值。”为此，杨英珍像当年的石美鑫所长一样，要求跟自己出去的医生，“一定要回来”。科室人员学成归来后，研究室的整体研究水平更上了一层楼。1994 年，研究室获批卫生部“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

三十多年来，杨英珍一直专注于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与治疗，从一般的生化病理到分子生物学，从实验到临床的各个细节，杨英珍不但亲力亲为，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病例在研究过程中是很关键的，但当时中山医院的接诊量有限，杨英珍就去别的医院收集病例；为了供全国的医院做课题研究，杨英珍自制药品“健心冲剂”，由中山医院出资在全国推广；为了研究牛磺酸对病毒性心肌炎的作用机理，杨英珍一次次奔波、一次次苦口婆心，最后成功说服相关部门将牛磺酸划入医保范围。

杨英珍注重合作与分享。她曾牵头国家“九五”攻关课题，与全国十几家大型综合医院进行广泛的合作；曾赴云南楚雄等地调研“克山病”，为云南不明原因猝死提供了大量病例，造福一方；她从事心血管内科继续教育二十年，在全国各地医院圈粉无数……

多年来，实验室不断收获荣誉，每一项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扩散至全国，便应了上医校歌的那一句“为人群服务”，这是杨英珍做基础研究的初衷所在、心愿所系。如今，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敞开大门，欢迎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科研、医疗人员。

85 岁的杨英珍仍不时来医院上班，接待她多年的老病人。“宁可看得少一点，慢一点，病情和方案也要讲得清清楚楚。”通过这种方式，杨英珍觉得“自己反倒学到很多，因为知道病人接受治疗以后的情况”。看到病人在患病多年之后仍然健康地存活，并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杨英珍从心底觉得幸福和满足。

心研所：守护心脏，医者仁心

原上医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专业第一名可以自由选择实习的医院和科室。而中山医院作为第一大附属医院，心研所作为国内顶尖的心血管病研究机构，总是被有志于心脏病学优秀毕业生踏破门槛——葛均波、钱菊英、王春生、舒先红……而今，他们已成长为所内骨干、业界翘楚。而早年的前辈：黄家驹、沈克非、陶寿淇、石美鑫、陈灏珠……不但是国内心血管学在晨光熹微之中的探路者，是学生们懵懂无知少年时的筑梦师，也是整个心研所无法忽略的灵魂人物。

翻开心研所六十年的历史长卷，1947 年，中山医院开创心外科，著名心胸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黄家驹任首任科主任，1948 年，陶寿淇开创中山医院心内科，1958 年心研所（时称“上海市胸病研究所”）成立后，黄家驹教授，著名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教授先后担任所长。这一时期，研究所经历了组织建设逐渐完善、业务工作稳步发展、科研工作成果累累的时期。1973 年研究所改归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中山医院领导，由著名心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出任所长。人员归队集中、设备得到增添，各方面工作得以逐渐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在石美鑫所长、陈灏珠副所长的共同领导下，研究所再一次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生部定为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并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从事心血管病临床和基础研究以及承担教学、培训任务的研究机构。1984 年国内著名心内科专家陈灏珠教授担任所长。1988 年，心外科建立了上海心脏瓣膜研究中心，1989 年，心内科被国家教委和卫生部定为重点学科，1994 年心内科被定为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同年，心脏病毒实验室被定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996 年上海医科大学入选“211 工程”建设，心内科为建设项目之一，1997 年陈灏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 年复旦大学与原上海医科大学强强合并。2002 年，研究所被上海市卫生局定为上海市心血管临床医学中心，同年，心内科再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并被列入“211 工程”二期重点建设项目，2008 年，心内科经教育部认定，被列入“211 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研究所的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临床和基础研究同时大放异彩。心研所现由

葛均波担任所长，陈灏珠任名誉所长。

六十年来，前辈们以高超的医术，更以高尚的医德，站成了心研所的精神标杆。

黄家驹老所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身体力行者，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主张：“能用非手术疗法治疗的疾病就一定不要拿起手中的手术刀。”他对朋友真，对病人爱，对医道精益求精，永不休止。

石美鑫老所长在从事外科专业的学习成长过程中，曾受业、师从沈克非教授和黄家驹教授，是黄家驹的开门弟子。在石美鑫记忆中，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国心脏血管外科迅速发展时，黄家驹大力支持、鼓励并组织、领导中山医院胸外科医师开展心脏血管外科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工作。

而石美鑫本人，一生育人、救人、创新无数，始终牢记上医“为人群服务”的教导和“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敢于开展高难度的胸心外科手术，使不治之症成为能治之症，尽心尽力为病人解除病毒，恢复健康。他用诚心、真心和

爱心与世结缘，一直在手术台边站到 83 岁。

在心研所前辈面前，前辈们宛如一座座宽厚温和的大山，代表了上个世纪心血管病研究治疗的最高水平，又深沉地勉励后辈勇猛精进，继续超越。

陈灏珠名誉所长至今已从医 70 年，也执教了 70 年。“救死扶伤、崇尚医德、全心全意”是他几十年来恪守的誓言，也是他行医的准则。他说：“前辈教授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流传下来的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他们身体力行，把患者当亲人。”

心研所现任所长葛均波对病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您是我的家人……”葛均波特别能理解和体贴患者的心情，对任何患者都一视同仁。他认为，作为一个好医生，在对待病人的时候，要记得灵魂和躯体组合起来才叫生命，因为“病人是有温度的”。

在人群心血管问题呈井喷式爆发的今天，中山医院心研所的医者，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从宣传预防到治病救人，他们一直冲在第一线。在这块土地上，六十年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是“守护心脏”的医者仁心。作为心研所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必将在心脏医学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糅合，不断丰富中山精神、上医精神的内涵，谱写出一首激昂慷慨的盛世长歌。

“毅公书屋”收藏记

□ 文/张春梅 王乐 整理/王雨薇



编者按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陈毅元帅的名字总是闪闪发光。他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更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文人，其深厚的文学积累与高超的文学造诣总让人们为之心折，成为千万学子及有志青年的榜样。而“毅公书屋”在复旦的落地，以及“陈毅元帅藏书与文献研究中心”的揭牌，更使得陈毅元帅的品格和精神走进高校，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复旦的青年学子。

缘起：陈毅藏书与复旦

自2013年陈毅元帅夫妇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新四军广场落成后，陈毅元帅家属一直希冀能在上海设立陈毅元帅相关文献研究中心。后来陈毅元帅的子女经由福寿园国际集团推荐并牵线联系，最终择定与复旦大学合作，将一批珍贵的陈毅元帅藏书、资料、相册等文献资料捐赠复旦大学图书馆。

这对于复旦大学而言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因此，几乎在获得这个消息的同时，复旦大学图书馆就开始积极地筹备这次捐赠。通过多次的联络、协调，怀着将这批珍贵藏书保管好、学习好、研究好、运用好的共同意愿，复旦大学图书馆和陈毅元帅的家属很快达成了捐赠的共识。

于是在2016年7月5日举行的陈毅元帅文献资料捐赠座谈会上，陈毅元帅家属同意将陈毅元帅的藏书文献等资料捐赠给复旦大学；同年10月25日，在上海大酒店举行的陈毅元帅藏书文献资料捐赠签约仪式上，陈思和馆长代表复旦大学与陈毅元帅家属签署捐赠协议。自此，陈毅元帅的藏书开始逐步进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毅公书屋的筹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2017年3月3日，时任图书馆党委书记的严峰带队奔赴北京，将27箱图书、68本相册，以及叶剑英元帅亲笔题词的“毅公书屋”牌匾原件打包，通过专业物流运抵复旦大学图书馆。4月22日，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赴北京，接收影印珍本、钦定四库全书以及书籍，并负责安全运抵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前期准备工作，2017年10月12日，随着“陈毅元帅藏书与文献研究中心”在我校图书馆揭牌，一批特殊而又珍贵的陈毅元帅藏书文献资料陆续进入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书库。

在揭牌仪式上，为此次捐献牵线搭桥的福寿园国际集团也向陈毅元帅藏书与文献研究中心捐赠了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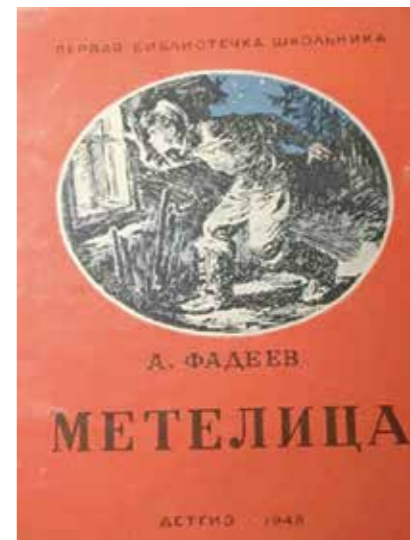
毅元帅半身纪念铜像。该集团主席白晓江表示，福寿园愿意促成陈毅元帅藏书及文献资料留存复旦大学，既是信服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研究能力，更是双方互助共建的应有之举。

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

陈毅元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陈毅元帅是解放后上海市首任市长，他的清廉、正直，办事雷厉风行，处处以身作则，以及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风范，始终为上海人民所怀念。除此之外，陈毅元帅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其著名的《梅岭三章》中“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正气凛然，不仅体现了陈毅元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也再现了我们党和人民不畏艰难、雄

气勃发、愈挫弥坚的革命精神，值得当代人学习、继承和发扬。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也在2017年3月14日的藏书与文献捐赠仪式上发表讲话，希望继承和发扬好革命先辈的精神，并表达了对陈毅元帅家属的感谢和敬意。



▲ 陈毅元帅藏书封面（部分）



▲ “陈毅与上海——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主题展览

那些年，不曾忘记的亚丁援教岁月

□ 文/柯国庆 刘畅

编者按

2016年12月中旬，柯国庆和家人从上海出发去英国度假。此行他是要赴一场特殊的“约会”——去爱丁堡重访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号”。有人会问，为什么柯国庆要万里迢迢赴此次之约？时间要拉回三十年前，从他在南也门亚丁大学支教经历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但仍然注重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与其签订了一系列协议，通过向其派遣医疗、教育、体育等专家组成员，支援当地各方面发展。

那时候的也门分为南北两国，地处红海口的南也门又称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首都在亚丁。由于国对口支援该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因此，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教师作为国家教委（1998年更名为国家教育部）外事局专家处的外派教师在亚丁大学执教。

1984年，复旦大学的五位校友被派去南也门首都亚丁支教，分别是曹叔维、吴富良、马国选、柯国庆和袁双生。其中，曹叔维、吴富良、马国选三人，是国家师资培训班培养出来的师资储备人才。

1963年，为了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发展，国家教委特地在上海、南京等大学设立了师资培训班。作为培训点之一的复旦大学承担着培养数学援外教师的责任。曹叔维、吴富良、马国选三人从1963年开始在复旦师资培训班学习了五年，从师资培训班毕业后分别分配到了同济大学（曹叔维）、华南理工大学（吴富良）、华东师范大学（马国选）任教，等待国家教委需要援外人才的时候再接受派遣。而柯国庆和袁双生则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教师，柯国庆来自69级物理系，袁双生来自70级化学系。因为师资培训班的教师人手不足，为了填补师资缺口，补充新鲜血液，因此，1984年秋天，柯国庆和袁双生作为复旦大学本校派遣的教师和曹叔维、吴富良、马国选三位一起，一同派往南也门的亚丁大学支教。在亚丁的一年半里，他们经历了艰苦，收获了友谊，也赶上了南也门一场惊心动魄的内战，最终在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号”的人道主义援救下，安全撤离亚丁。在吉布提被中国国家政府派出的专机接回祖国，正如柯国庆和曹叔维回忆，这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次用专机大规模撤侨。

复旦的师资培训班，共二十六位学员，除了四位后来离开教育系统选择其他工作的学员以外，其他人几乎均去过第三世界支教。而在柯国庆和袁双生之前，复旦没有派本校教师去第三世界支教的先例，只有一位南京师资培训班的华宏鸣老师，在师资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到苏州大学教书，在去也门及索马里援教归国以后，重新分配到复旦大学教书。在柯国庆、袁双生俩人之后，复旦物理系的吴中亚老师作为新一批援外教师，继续派往也门。

无论是六十年代的师资培训班，还是八十年代的高校派遣教师援外，中国在自身同样艰苦的时候，依然愿意为也门等第三世界国家施以援手。援外教师们故事，虽然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缩影，但也足够令人感动，足以折射出中国与世界人民共奋进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 1986年1月从亚丁湾撤退的复旦校友（左起：袁双生，曹叔维，柯国庆，马国选，伍富良）

研究的新起点

“陈毅元帅藏书与文献研究中心”正式揭幕，标志着陈毅元帅藏书与文献资料的研究与运用的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切是多方关注和努力的结果。

学校高度重视陈毅元帅藏书和文献收藏研究工作，焦扬书记专程对陈毅元帅藏书与文献研究中心进行调研，并对这批珍贵文献的收藏、研究、运用提出了要求；图书馆完成所有捐赠图书的编目、上架工作，并对捐赠照片进行了数字化，并重新定制藏书柜及保护用具，以便对所捐赠的原始文献进行良好的保护性收藏和研究。今后复旦大学还将进一步联合福寿园国际集团、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多方资源，力求将中心建设成为研究陈毅元帅、新四军将帅人物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学术单位，更好地发挥文献、研究中心的教育和纪念功能，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先辈的革命精神。

除此之外，为更好地发挥陈毅元帅藏书文献资料的研究及利用价值，在图书馆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还搭建“陈毅元帅藏书文献数字化平台”，未来陈毅元帅的藏书文献资料将按照资源类型向学者、研究人员展示并提供授权使用。

2019年5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依托获赠的陈毅元帅图书、照片等珍贵资料，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与上海市杨浦区委联合主办了“陈毅与上海——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时间持续近一个月，吸引了校内外众多观众前来观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就是其文献资料的教育意义之所在。

后记

陈毅元帅的藏书文献资料是研究党史、军史、外交史和上海在建国初期的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此次捐赠，丰富了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料库，进一步拓展了红色文献收藏的基础，更是红色经典文化研究和展览的典范，为复旦大学捐赠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陈毅元帅藏书章

陈毅元帅早年留学法国，文武全才，敏而好学，在戎马生涯之余又有广泛的阅读。此次陈毅元帅家属陆续向复旦大学捐赠的内容，包括陈毅元帅生前收藏使用的中英文图书1385册、线装图书955册、相册68本、叶剑英元帅亲题“毅公书屋”牌匾原件、李岚清校友在纪念陈毅诞辰110周年之际书写的陈毅诗词书法原件等各类珍贵材料。其中部分收藏的书籍还印有独特的个人藏书章，附有签名、题词、笔记，以及附文说明、友人赠阅记录、家人浏览记录等。后续陈毅元帅家属还将分期分批向复旦大学图书馆捐赠陈毅元帅藏书、文集、信函和照片等重要文献资料。所赠陈毅元帅的藏书涉及中、俄、法、英、日、波兰、德语和西班牙语等共八个语种，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农业、生物、军事等多个领域。陈毅元帅诗名远扬，当代诗人臧克家评价陈毅元帅：“上马杀敌，下马写诗，将军原本是诗人。”柳亚子赞美陈毅元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

曹叔维：炮火中授课的数学老师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教育部着手建设师资培训班，全国范围内储备援外教师，以帮助第三世界的国家开展教育事业。

在此契机之下，上海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曹叔维，以数学援外教师的身份，分配到复旦师资培训班进行学习。

1963年10月，曹叔维到复旦报到。和他一同在复旦学习的还有来自其他高校数学系的毕业生，一共十二位。次年，又有另外十四位作为第二批储备援外教师进入复旦，开始零基础学习英语。

五年以后，已经掌握英语技能的曹叔维和同仁们面临分配，先去高校工作，等待国家有援外任务时再出国。十二位同批次复旦师资培训班的学生中，其中四位分别去了中国波兰海洋运输公司、中国远洋公司、上海港务局和上海市港口机械厂，离开了教育系统。另外八位依旧选择在各个高校发展。

曹叔维选择去同济大学任教，当时恰好国家刚刚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同济机械与能源学院的采暖通风专业缺少教英语基础教育课的人选，就让他顶上。每当采暖通风专业的学生们上专业课时，一向好学的曹叔维就会坐到教室后边听一听，由于学数学出身，很多东西都有共通之处，久而久之竟也学会了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结束了以后，同济要把我调回基础教研组，英语和数学两个教研组都要我。我说我都不去，我就在暖通，要讲采暖通风的专业课！”

1984年秋，距离曹叔维从复旦师资培训班毕业已经十六年，他早已在同济暖通专业的讲台上站了多年，并且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就在此时，国家教育部给同济外事处打了一个电话。

“一个月后，曹叔维，派往也门亚丁大学援教。”

曹叔维的妻子接到消息以后心里很不平静，她平时要上班，家里有老人要照顾，还有两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但我有什么办法呢，绝对会支持的，不会拖后腿。”她摆摆手说。当时公派出国服装要求，要置办西装、衬衣、长裤。“准备的时间太短太紧张，他那个时候很瘦，衣服领子要高一点，胸围要小一点，后来都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给他做的，但是西装实在没办法做，就去跟百乐门的人请求，可不可以加班加点帮我们做出来。”这边曹叔维的妻子一心一意

地为他准备行装，那边早已不接触数学学科的曹叔维只得找出几本英文版的数学教材，复习备课。

此次被派往也门的一共有六位教师，其中同济大学的曹叔维、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国选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富良负责教授数学，复旦大学的柯国庆教物理，复旦大学的袁双生和另外一位来自河北的老师讲解化学课。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他们先从全国各地飞往北京语言学校报到。

因为担心吃不惯也门当地的食物，北京语言学校派了一位厨师与六位教师随行。他们从北京飞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转机，换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前往也门，总计航程超过19个小时。

在他们一行人之前，已经有两位中国教师在也门支教，于是一下飞机，这两位就开着亚丁大学为中国教师组特别配备的越野车来接他们。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的办公室主任也早已等候在一旁。

中国教师们居住的地方在亚丁的富人区，毗邻机场，离亚丁大学也不算太远。学校为中国教师们安排了一栋小楼，据曹叔维回忆是“他们国家革命前有钱人家住的地方”，条件还算不错。一楼是乒乓球台和厨房，楼上有三个房间，大房间里能住下三个人，小房间里能住两个人，随行的厨师住在楼下，房间里还配备了窗式空调。

因为厨师不会英语，所以每次他去集市买菜，中国教师们就轮流陪同作为翻译。小楼前面有一片空地，因此之前来支教的老师让曹叔维他们从国内带些菜种子。教师们在这片空地上先后种植过空心菜、苋菜和上海的小青菜。空心菜需要许多水，后来条件实在不允许只得作罢；苋菜长得高，比较容易存活；上海小青菜则需要专门的土壤，大家只好去临省的奶牛场用麻袋弄些免费的牛粪回来，改良土壤。中国老师们轮流值班为菜地浇水，久而久之，大家竟也对蔬菜种植多了些经验。

每到周末，曹叔维他们几个人就开着车去亚丁的海边，海滩上有许多螃蟹，最美味的是当地的梭子蟹，大家抓得开心，带回来也十分新鲜，吃着欣喜。

亚丁的饮用水水质不好，含有重金属元素，口感发苦，之前来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可以用水来泡茶喝盖住苦味，因此中国教师组的每位老师手中总有浓浓的一杯茶。据曹叔维的同事柯国庆回忆，国家教育部第

二年派专家来慰问他们，发现亚丁的水问题这么严重，痛心地说：“从今天开始给你们专供水，每天你们每人都要保证一瓶450毫升的矿泉水，就到超市去买，钱给你们报销！”自此饮水条件才逐步改善。

中国教师们也在亚丁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亚丁大学的学生们上课。也门曾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亚丁大学也参照英国高等教育模式办学。该校校长曾在英国留学，毕业于剑桥，副校长是前东德留学归来。

中国教师组的教学任务很重，一个星期每人要上12节课，一节课45分钟。当地人听课用英文，平时交谈讲阿拉伯语，本身的英文水平也不算很好，基础教育也不够扎实。“虽然说是高中毕业来读大学，但是我一问，学生们连三角函数都不熟悉。我只能在上课之外，找个时间在空的实验室里面，再给他们补中学数学的内容。”讲完了课，就要考试，曹叔维自己出考题，在打字机上用蜡纸打印，再送去油印。虽然平时是师生关系，但曹叔维记得学生和他们之间相处很友好。“有一次我中午睡觉睡过头了，结果学生就开了个小车，带了好多人到我住的地方来，他们以为我生病了才没去上课，一起来探望我。我当时很不好意思，连声说不是不是，快快快，我们一起走，回学校去。”曹叔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非常通情达理的，特别是对中国教师非常友好。”

很多时候，曹叔维都会想念家乡，唯一能够和家人进行联络的方式只有每月一封书信。中国外交部的信使按时来到亚丁，援外教师们把准备好的家书给信使带回北京，再投进邮筒里寄往国内各地。

1986年1月，亚丁因为内部派系的政治斗争，爆发了内战。

在上海，《新民晚报》最先报道了亚丁爆发战争的新闻。曹叔维的妻子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急得直接打电话到编辑部：“你们的消息是真的假的？”因为



▲ 柯国庆在教授大学光学课

消息不通畅，她没有收到有关丈夫的任何音信。“我很担心他，但是又不能在家里讲，孩子太小了还不懂，我妈年龄大了，如果知道了只会更发愁。所以亚丁打仗的消息，全家只有我知道，我只好去单位里和同事讲，她们都很好，都来关心我。我不知道给谁打电话能得到确切的消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我单位的领导也很好，到处帮我问。”提到当时的情况，曹叔维的妻子仍然心有余悸。

而此时的亚丁，已经断水断电了几天。

最初是还在教室里上课的曹叔维等人听到外面有枪声，大家就到街上看，因为当地社会一向动荡，学生们也没有过于慌张，还提醒中国教师们要及时储藏水和食物。教师们把喝空的矿泉水瓶都拿出来，装满水，又把浴缸里也放满水。果真如学生们所言，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断水断电了。

中国老师们定下规定要珍惜用水，每天每人用多少要定量，除了正常饮用、洗漱以外，不能再额外使用。晚上没有灯，从北京语言学校来的厨师就自己做油灯，粘好灯芯以供照明。教师组住的小洋楼离机场很近，作为交通枢纽的机场是内战双方攻守的重要场所，炮弹就落在小洋楼不远的地方，震耳欲聋。大家只能躲在楼里面，焦灼地等待着救援。“我说人家‘兄弟打架’我们要是在这里牺牲掉算什么名堂。当

时真是发愁。”曹叔维叹了口气。

尚未收到大使馆命令的教师们只能等待，就这样过了整整五天。“后来有一天清晨，使馆里就来了辆车，说你们教师赶紧收拾一下东西，英国大使馆有船撤侨，愿意帮助中国侨民撤离。”英国的“不列颠号”停靠在亚丁的海滩附近，这艘皇家游轮本要跟随英国女王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但听到亚丁发出战争求救信号，就安排女王改乘飞机，用这艘船来亚丁营救各国侨民。

海滩上的各国侨民依次排队上救生艇，再由救生艇送到大船上去。曹叔维和几位教师率先登上了不列颠号，中国厨师和使馆的一些人落在后面，他们在海滩上走，后面的子弹在他们脚下扫射。“他不扫你人，只是扫射脚下，不让你外国人走掉，要留你们当人质。”曹叔维记得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中国厨师一行人也因此没来得及登船。

“不列颠号”开到亚丁对面的吉布提，在吉布提的中国大使馆，也有中国援外的其他成员如体育组、医疗组，还有中建公司的一些工人在等待。“我们就在那里等国内的消息，也等着中国厨师和使馆的人来汇合。第三天的时候，中国厨师他们终于也逃离了亚丁，来到了吉布提。我们打电话给教育部，最后是中国政府派飞机来把我们接回了北京。”

后来曹叔维才知道，这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次用专机大规模撤侨。

回到北京，正值寒冷的冬季，曹叔维只穿了一双拖鞋和背心，教育部的人给他们准备了毛衣毛裤和军大衣，大家把所有的衣物全都裹在身上。回到北京语言学校，让他们休养几天，又安排语言学校的校医为他们看病、调理。

这时，曹叔维终于能够给家里打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那个时候才真正听到他的声音了，终于放心了。”曹叔维的妻子说。

柯国庆：“重返不列颠号”

1984年，和中国教师组一起到达亚丁的时候，柯国庆背着自己的出国前特地买的新相机：理光品牌、单镜反光、50毫米标头、1.8光圈——花了他足足四百三十块，是当时月工资的整整两倍。

柯国庆在复旦物理系工作的时候就格外喜欢拍照，从1970年到1978年，复旦许多大型活动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后来还经由复旦新闻系摄影教研组老师的推荐，加入了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也参加过上海市摄影展。

“在从亚迪斯亚贝巴飞往也门的飞机上，快要降落的时候，我隔着玻璃窗从空中鸟瞰着拍了一张照片。亚丁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西北方向的红海和亚丁湾连成一个L形状，这张照片把也门和海湾的地形拍得极为清楚，后来送给了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的唐大使，他很惊喜和欣赏。”柯国庆说。

从那天开始到1986年初亚丁爆发战争、中国教师组撤退，许多留存下来的珍贵照片都是柯国庆用他的理光相机拍下的，也成为无比重要的历史材料。

与曹叔维不同，柯国庆并未参加过教育部组织的师资培训班，而是复旦本校派出援教也门的教师之一。

1970年从复旦物理系本科毕业以后，柯国庆留校做助教，83年升为讲师。改革开放以后，当时许多物理系的老师都在考虑公派出国考察，他也联系了美国的一所学校想要继续攻读博士。

就在这时，物理系的系主任找到柯国庆，告诉他因为师资培训班的教师人手不够，需要新鲜血液填充，所以有一个公派名额，希望复旦能够指派教师支援也门亚丁大学的教育工作。

当时柯国庆的孩子只有三岁，夫人是上海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工作繁忙。他当时和父母商量。“我父亲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你还是要听组织安排。”柯国庆想了想，答应了。

去亚丁大学教书需要使用英语，他虽然不是学英语出身，但早年跟着复旦英语系的老师打下过基础，平时也看许多英语电影锻炼口语。因此，在学校要求柯国庆试讲的时候，他完成得很好。系主任告诉他，基本上学校是满意的，但是还需要加强，于是又在复旦培训了半年左右，才正式派往也门。

“84年秋天，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儿子去送我。他年纪很小，抱着我的脖子不放，他知道我要离开了，很懂事的。但是我觉得我当时也有点懵懵懂懂的，想着总归出去还是会回来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1986年南也门内战爆发，柯国庆和中国老师们住的房子离空袭的目标机场很近。他坐在二楼的阳台



▲ 皇家游轮圣诞卡片，全貌还原“不列颠号”在亚丁湾救援场景

上，外面是震耳欲聋的炮弹声，连同整个房子都在震动。“我当时觉得很危险，但是也很无奈的。幸亏有个录音机，我还录了一段音给我儿子。我说儿子，你听到外面这是什么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空对地的导弹轰炸时爆响的声音，爸爸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呢。”柯国庆的语气突然有些放缓，“其实也是说想把它作为一个遗嘱的。只是想我手上要留点东西下来。但是很遗憾，这盘录音带在我撤离的时候因为匆忙没有带出来，就留在那里了。”

战争爆发之前，柯国庆和同事们一样，在亚丁大学开展教育工作。

他负责给亚丁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讲解普通物理、实验物理和近代物理的基础部分。亚丁大学物理系除了他以外，还有两位美国留学归来的印度教师、莫斯科大学毕业的伊拉克系主任等等。

在一张留存下来的照片中，柯国庆站在讲台上，面前摆着实验器具。“内行一看就知道，我这是在给学生讲光的衍射。”

亚丁大学的学生们来自也门及周边的一些国家，从东非到西亚，有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

埃及人、索马里人等等。校园里氛围开放，那些在外必须佩戴头巾和面纱的也门女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脱下来，露出所着鲜艳夺目的服饰。据柯国庆回忆，因为阿拉伯妇女喜爱黄金首饰项链，因此几乎每一位女学生都有金饰在身。

也门的学生们宗教上信仰伊斯兰教，当地有许多宣礼塔，每到固定的时间都会通过扩音器召唤信徒做礼拜。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学生们听到扩音器的声音，就到走廊里去做起礼拜，中国老师们只能在教室里等待。有时候考试考到一半，学生做不出来答案，就举手说老师我要做礼拜，中国老师们只能放行，让他们在外面祷告好再回来继续考试。

亚丁大学的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些中国老师，周末的时候常常邀请他们去海边玩。柯国庆还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也门当地的革命节，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涌上街头，革命卫队在广场上游行，高呼革命口号。柯国庆拿着相机，被当成了外国记者，但也因此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三十年过去了，柯国庆非常怀念也门的这些学生们。“想一想他们也都四五十岁了，不知道他们现在

都怎么样了。”柯国庆记得，自己当时最喜欢的一位学生叫阿里那比尔，他勤奋好学，后来考到中国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又到同济继续深造。“阿里到了同济以后来拜访我，他说老师我到中国来了！他还带了个女朋友，是他在华师大的同学，是一位中国女孩！”

战争爆发以后，柯国庆和教师组的同事们一起在宿舍等待撤离的消息。撤离的那一天，他背了个小包，包里只有两件衣服和他的那台理光相机。

“离开的时候是一个清晨，我们撤退的地方并不是码头，只是交战双方在中间地带临时划定的一段停火海滩。海滩上飘扬着各个国家五颜六色的国旗，以及等候在沙滩上的数百名不同肤色的各国侨民。”

逃离的各国侨民需三四人一组，手拉手向在海滩上救生艇的方位走去。柯国庆的身边是一位法国妇女，抱着一个很小的孩子。他们一起蹚着水，但在齐胸深的水中人很难站住，法国妇女个头不高，柯国庆看她动作吃力，就帮她把小孩托起来，再一起往上爬。救生艇的船舷有些高，最后是两位水手协力把他们拉上去的。

到了“不列颠号”上，柯国庆几乎已经全身湿透。他询问水手船上哪里有浴室，推开浴室的门，柯国庆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浴缸也有热水，他于是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衣物，带上相机来到甲板。作为服务英国女王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号”上有专门的军乐队，此时正在为大家表演节目。中国援教组的老师们倚在船舷边休息，中建公司的工程师和工人光着脚，穿着短裤躺在躺椅上。各国侨民们受到皇家礼仪的高规格接待，水手列队奏迎宾曲，洁白的长桌供应着饼干、牛奶、咖啡和英式红茶。“我于是拍了许多照片，后来这些照片在1986年十月不列颠号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时，委托出席晚宴的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转交给英国皇家邮轮的船长了，他们都觉得这十分珍贵。”柯国庆说。

不久以后，柯国庆还收到了不列颠号船长、海军少将J·Ganier发来的信，在信中，船长对他表示感谢，并提到：“我由衷自豪能够在亚丁为那么多人服务，也高兴地得知你平安回家。我将把你的照片传递给水手并出示给皇家海军看，他们必定会为执行了这样一次人道主义的行动而骄傲。我们这次出访受到上

海人民以及所有政府机构非常热情的接待，确信我们这次载入史册的访问必将极大促进和连接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及合作。我们深信不久会再次访问中国，并满怀希望期待着这一天。”

柯国庆一行人安全回到祖国以后，因为也门局势紧张，这一批撤回国内的中国教师组没有再返回亚丁。但在亚丁经历的惊心动魄，却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

2016年12月中旬，柯国庆和他的家人去英国度假。他提前给退役多年并停泊在爱丁堡港的“不列颠号”管理中心写信，表达想要拜访的愿望。并很快收到管理中心的回复电邮，约定圣诞前夕24日上午登轮。

这次重访不列颠号，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和我一起上船的还有我的亲家，他问我说，柯老师，假如那个时候回不来了怎么办？我就回答他了：假如回不来了，也就没有今天了。”在“不列颠号”上，柯国庆和家人仔细参观了驾驶室和所有船内展览品和陈设，还有他曾经待过的宴会厅和甲板。“不列颠号”的管理人员很重视他们一行人的参访，并决定要把柯国庆的这些照片资料放在有关这艘船的历史陈列里面。

“这艘船是我命中的一个运气，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人性关爱。我重新造访这艘船也是一种感恩，因为它救过我，所以我是放在心里的。”

“我现在只想到好的东西，很少想苦难的事情。虽然在亚丁支教的故事里是有苦难的，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还是充满喜乐的。人生是没有后悔可言的，一路过来有很多风险，但是我觉得每一步都是蛮值得的，这是属于我的人生，是我的体验。”

三十年后，柯国庆重访不列颠号，是重拾回忆，也是心怀感恩。当他走在曾经到过的宴会厅和阳光沐浴下的甲板，触动的不仅是深深的回忆还有三十年岁月流逝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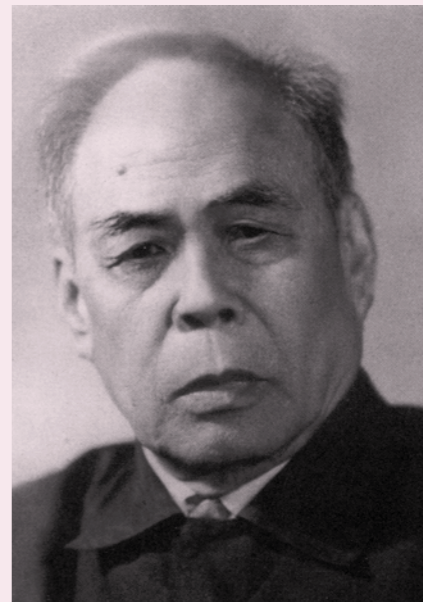
再见，不列颠尼亚！🇨🇳

周谷城与周予同六十年的君子之交

□ 文/晋谊 傅德华



▲ 周予同先生（1898-1981）



▲ 周谷城先生（1898-1996）

周谷城与周予同二位先生同为上世纪复旦大学历史系名闻遐迩的老教授。二人同姓、同年出生、同学、同行又同校任职，不仅有缘如此，更有多年的深厚友谊，被并称为“复旦二周”，载入史册。

患难与共见真情

周谷城先生与周予同先生相识于大学期间。二人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学习，周谷城在英语部，周予同在国文部；二人同生于1898年，不过周予同于1916年入学，周谷城则晚一年。“五四”运动发生时，二位先生都曾参与。周谷城先生回忆：“我曾直接参加，摇旗呐喊；只是没有走在前线，没有被捕。”而周予同先生则为核心人物

之一，作为北京高师的代表参加了五月四日的各校联合讨论，又与好友匡互生写下遗书，带领学生们参与了轰动一时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自北京高师毕业之后，二人虽去向不同，但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继续着反帝爱国的行动。1924年国民大革命开始，周谷城先生先后在长沙、武汉从事农民运动工作。此时的周予同先生也在上海坚定着反帝爱国的立场，曾与老友胡愈之、郑振铎等公开写信揭发、谴责“四·一二”惨案。也正是在“四·一二”惨案之后，周谷城先生所在的湖南反动势力逐渐复活，武汉亦无法立足，于是他被迫来到了上海。虽经老同学匡互生介绍得以在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教书，不过不久后就因在授课时宣传进步思想，被怀疑与江湾出现的许多进步标语有关。虽然流言并非真实，但在舆

论压力下敏感的周谷城还是决定离开劳大，并搬迁到市区。再次变得生活无着的周谷城找到老友周予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周谷城说“没有饭吃”，周予同就介绍他到自己任主编的《教育杂志》去写社论文章以卖文赚钱，并拿出了十元钱帮助他。周谷城先生回忆，这虽然是小数目，但在当时对他是很大的支持，卖文的稿费更使他有了维持生活的希望。然而，就在不到三年之后，胡适在《新月》上发文将周谷城先生“封建势力犹存”的观点批驳讥讽了一番，商务印书馆编辑得知后唯恐得罪胡适，赶紧通知周予同不许周谷城再发表文章。周予同先生只好转达此事，并义愤填膺地说：“岂有此理！真是笑话，难道反封建都错了吗？封建是要反的，一定要反。”时隔五十余载，周谷城先生仍能忆起当年这段话对自己的支持和鼓舞。

不约而同转向史学研究

周谷城、周予同两位先生在大学期间虽然分别在英语部、国文部学习，但之后志趣却逐渐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研究，成为同行。周谷城先生自幼爱好广泛，从族立小学到省立中学时就爱好英文、国文、历史，并熟读了诸多史书典籍。考大学时，虽希望考入北大政治系，但因家境所限，最终选择了北京高师英语部。毕业后，他发表了一些著作，主题涵盖历史、哲学、时政等多方面，虽然“好像很杂”，但自己认为“在我的思想系统中非写这些不可”。周谷城先生初期主要研究中国史，1939年在暨南大学教书时更完成了上下两册的《中国通史》；后因进步立场被压迫，转而开始了几十年的世界史研究，在1949年又写作了《世界通史》。周予同先生从中学开始接触中国古文化方面的书籍，到北京高师学习国文时期又接触了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等先生，为研究经学打下了基础。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之后，周予同先生逐渐认识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史学界对经学的认识仍表现为极端偏见的两极分化，其发展仍然落后于现实，因此经学史研究有必要立即开始。于是1925年起，他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经学史，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已有五本著作和十余篇论文发表，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经学史研究范围。到解放后，周予同、周谷城二位先生分别专攻中国史、世界史，因而被朋友

们并称为“东周西周”。

成为同校任教的同事

两位先生都素来关心教育事业，毕业之后也都各有多年的任教经历，不过从1935年开始，二人在上海暨南大学首次成为了同校任教的同事。1932年秋天，周谷城先生应校长之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兼任了一年的历史社会系主任；1935年春，周予同先生到暨南，继任了史社系主任一职。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在重庆复旦任教的周谷城先生随校回到上海，出任了史地系主任，又立刻将周予同请进了复旦，二人得以再次成为同事。在几十年同校任教的生涯中，二人学术、政治活动上的交往愈加密切。

在复旦校园里，周谷城先生常常西装革履，发型精致；而周予同先生往往一身讲究的中式打扮，举手投足间似有一种儒生风范。二位风格迥异，却都德高望重，年过半百时就分别被复旦师生尊称为谷老、予老。

周谷城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讲世界史，也开形式逻辑课、美学课；讲课主要是按照固定的讲稿读，不过常在一堂课的最后几分钟作一段海阔天空的“神聊”，涉及读书方法、史学动态，也会讲到自己的经历，精彩迭现。周予同先生上课则不用讲稿，板书整洁、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而又要言不烦，颇具学术性、启发性，同样很有个人特色。“二周”个人气质迥然不同，讲课风格也各有千秋，但在课堂上都常称赞对方。当时的历史系学生回忆，周谷城先生提到周予同先生赞叹不止，他曾在课堂上说“他是经学史专家，国宝。他要是死了，经学史就没人懂了”；还曾向学生推荐道“周予同先生研究经学，功夫深，造诣高，建议大家多读他的文章和专著，善于从中学习治学的方法”。

在学术上，二位先生还有着和而不同的交流。周予同学中文着重经学，对经学的看法颇受钱玄同的影响，周谷城则更重视钱的《文字学音篇》；对于经学的产生，周予同初认为在封建时代，周谷城则认为在奴隶时代。周谷城先生还曾不止一次向周予同先生笑说地提起，由周予同先生注中国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已亡佚）；他本人注《旧约》《新约》、佛教经典、祆教经典、古兰经，

加上中国六经恰为世界六经，二人合著，也许可成一部比较宗教学的小书。回忆起学术上的种种交往，周谷城先生还对周予同先生在学术方面的雅量大加赞赏。

反帝爱国立场同样坚定不移

周谷城、周予同二位先生对参与政治的态度略有不同，周谷城先生自认一生“除读书、教书和写作之外，从未放弃政治”；周予同先生则更多将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上，常说自己一个非党非团的民主人士，不敢与党员、团员并列。但二人反帝爱国的立场都同样坚定，到复旦共事之后，政治活动中的交往与合作也愈加密切。1946年暑假，周谷城先生与张志让、周予同、翦伯赞、潘震亚、蔡尚思等进步教授发起并组织、领导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这一公开的爱国群众组织，简称“大教联”。这一组织从成立到1949年间由三四十人壮大到一百余人，在国内外影响甚大，在解放前的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抗日斗争和解放后的教学改革中都起到了很大作用。194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凶残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惨案传到上海后，复旦师生群情激愤，罢课三天，引来了学校当局对部分学生的野蛮逮捕、袭击。周谷城先生听闻后非常愤慨，紧急草拟了一篇宣言以揭露宪警特务对学生的迫害，陈望道、洪深、朱伯康等人都在上面签了字，其中周予同的签名是周谷城未征求其同意代签的，事后被告知时，周予同先生说：“代我签名很好，正表示了我的心志！”这篇宣言送给《大公报》后虽只被摘取几句刊登，并加上“教授说话了！”的副标题，但影响竟反而更大。周谷城、周予同二位先生互相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也可见一斑。

同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前后，《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的一部分著名人士召开了座谈会，二周都在与会专家之列。前一次，周予同先生不看文章的来头和背景，第一个发言讲吴晗是个好人，质问“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公然替他打抱不平。一个多月后，政治气候已经明朗，吴晗

也已经公开发表了检讨。这时座谈会再开，从不口是心非的周予同先生仍然首当其冲发言，坚持“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他并未想到，这仅仅几百字的发言，却埋下了不久之后“文革”“首批周予同”的祸根。如出一辙地，周谷城先生也坚定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曾一口气作九篇形式逻辑论文舌战群儒；1962年发表文章提出了“无差别境界”“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元也在批判者之列，而这些观点不久后就列在了条条“罪状”之中。

1966年6月10日，上海市委召开了动员“文化大革命”的万人大会。次日，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上海“文革小组”发表社论，八位名人被点名批判，其中就包括周谷城、周予同两位先生；八位名人当天随即就被抄家、批斗，被迫游街。“复旦二周”之名虽非讽刺，但正是此时伴随着“反革命学术权威”的帽子传到了全国。

在这场运动中，两位先生都坚定立场，从未屈服，也都受到了身心的双重打击。特别是本就患有心脏病的周予同先生，病重时还被拉到曲阜批斗，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以至于“文革”结束后虽然很快恢复声誉，却只能久卧病榻，再也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

发表文章聊表思念之情

拨乱反正之后，两位先生的名誉很快恢复，情况也逐渐转好；但缠绵病榻的周予同先生再也无法继续事业，并于1981年7月15日溘然长逝。不久后的7月31日，周谷城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怀念周予同教授》一文，以聊表思念之情，并回顾二人同学时代以来数十年的交往事略，字里行间足见情感之真挚。

正如周谷城先生在怀念文章中所言，“我与予同的关系，无论从学术活动方面讲，或从政治活动方面讲，都是相当密切的”。二位先生一生中在教育学术上和反帝爱国的政治活动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二人相识、相知六十年，在变幻着的时代背景下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这样的君子之交令人敬佩，也使人感动。

当五角场遇上复旦

□ 文/读史老张

五角场比复旦“年轻”

拟定“当五角场遇上复旦”这个题目，不少朋友一定会问：复旦是从徐家汇迁来的，为什么不说“当复旦遇上五角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五角场比复旦“年轻”。

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后，没有固定校舍，借吴淞水师提督衙署办学。辛亥革命后，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司令部占领，复旦被迫借徐家汇李鸿章公祠为校舍。后来李鸿章后人曾多次以租金涨价要挟，搞得李登辉校长心神不宁。李登辉是印尼华侨，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后到复旦任教，1913年任校长。1918年，李登辉拟建复旦自己的校舍，即赴南洋募捐，共向华侨实业家募得12万银元，在江湾购地70亩。

“江湾”之名，源于虬江。现在的五角场地区和复旦邯郸校区都位于吴淞江故道的虬江流域。虬江横贯五角场地区；复旦校园北侧的界泓浜是虬江支流，南侧和西侧的走马塘过去也称虬江。复旦与五角场同处

虬江，也同属江湾。李登辉校长为什么会看中江湾？据说他早年到吴淞任教时，每天路过江湾，对这里的自然风光赞不绝口。另外，江湾地价低廉，交通也相对便利（淞沪铁路在江湾镇设有车站）。1922年，江湾校园建成，复旦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校舍的历史，正式有了自己的校基（即今邯郸校区西部）。因此，立校江湾，李登辉校长功不可没。

为什么说复旦是“立校江湾”而不说是“立校五角场”呢？因为江湾校园建成时，还没有“五角场”。大家都知道，五角场这个地名，源于“五条路”（翔殷路、淞沪路、邯郸路、四平路和黄兴路）的分岔延展。它的广义范围，大致为今天东到军工路、西到大柏树、北到殷行路、南到走马塘。“五条路”中，最早的一条开筑于1922年，最晚的一条拓宽完工于1932年——比复旦立校江湾晚了整整十年。

“五条路”完工后，这一带也不叫五角场，而是叫“新市区”，这与1929年起国民政府提出的“大上海计划”有关。当年，国民政府雄心勃勃，拟在这一带建造

一个有别于租界、独立发展的新市区，先后建造了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市立公园和虬江码头等，并新辟了若干条整齐划一的马路，这些马路都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打头的字命名。新市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新上海”或“新中国”。著名旅法画家赵无极先生少年时代就住在这里，他晚年深情地回忆了在“新中国”生活的场景：

父亲不愿住在租界里，在被称作“新中国”的城区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新房子，共三层楼，形似一个立方体。

在那里，我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心考入美术专科学校，好像这栋新房子象征着我所向往的新生活。房子很大，有大片草坪，一如西式洋房，花园也特别精致。父亲每晚由司机开着轿车送回家。

读书期间，我每年夏天都回家住上一个半月。（《赵无极自传》）

赵无极所住的这间“新房子”，今天还保留着，

就在政通路54号五角场街道办事处内，人称“小白楼”。他所说的“新中国”城区，就是今天的五角场。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新市区被日军占领，日军赶走大量原住民，并开始向这里移民。这一带地名大部被改，如黄兴路被改名为“仓永通”、翔殷路被改名为“明治通”、平昌街被改为“旭街”……这些地名都带有殖民地色彩。原来的“五条路”这里，被他们称为“五条辻”。抗战胜利后，日本移民被遣返，不少原住民迁回，复旦也从重庆夏坝复员返沪，新市区开始人丁兴旺，因为“五条路”的关系，百姓将这一带称为“五角场”——“五角场”的称呼从此在民间流行。

“五角场”真正闻名，是在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被正式命名为官方名称的是“五角场村小学”。1956年，江湾区将原邯郸路办事处和市中心办事处合并，成立了五角场办事处，“五角场”的名气开始响了起来。1958年7月，五角场划入杨浦区，1959年6月又划归宝山县。1962年，撤销五角场办事处，建立五角场镇，1984年9月，五角场镇划归杨浦区。上世纪90年代，五角场镇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五角



▲ 70年代末复旦大学鸟瞰

场镇和五角场街道。2019年4月，五角场镇被改名为长海路街道。因此，相对于复旦在江湾立校来说，五角场要“年轻”得多。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人担心，现在将五角场镇改名为长海路街道，只保留了五角场街道，五角场地域是否缩小了？我想不会。地域不会随着行政区名的变更而缩小或消失。比如，江湾区撤销了，江湾还在；吴淞区撤销了，吴淞还在；闸北区撤销了，闸北还在。同样，无论将来五角场行政区名如何变化，五角场一定还在。

复旦改变五角场

“五角场”地名出现稍晚、五角场比复旦年轻，并不妨碍我们对五角场历史的探寻。五角场地区在历史上属于江河冲击平原，复旦立校前，这一带人迹罕至、芦苇丛生；复旦立校后，这里人气渐升、不再荒蛮。古时候，有没有文人墨客“到此一游”呢？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发现。除了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在此策马驰骋、留下了“走马塘”的河流名称外，我还没有找到古人吟咏此地的篇章。但是，复旦在江湾立校后，这一带就有了人文气息，也有了诗。

当年，复旦师生曾遴选出“复旦八景”（桃园春色、柳径莺声、板桥春水、平芜朝烟、隔岸秧歌、远市灯光、秋篱月影、梅林皑雪），并以优美的诗句来赞颂这里。例如，写走马塘：“记得春来门外望，渔篙多在板桥头。”（《板桥春水》）写农民插秧：“一曲农歌听到耳，声声似重劝麻桑。”（《隔岸秧歌》）写夜色：“何处屢楼开夜市，错疑一簇是春星。”（《远市灯光》）写雪景：“雪花更为添颜色，占尽人间第一春。”（《梅林皑雪》）在师生们笔下，原五角场地区的自然风貌成了仙境。正是复旦，为这一带的原始荒蛮抹上了文化的油彩。

更重要的是，因为复旦的到来，这一带的道路交通、商铺市集，出现了现代城市的特征，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里，我试以几条五角场地区的道路兴衰为例：

政民路。政民路是五角场地区第一条成熟的马路。它位于原复旦后门（北门），筑于1922年，是叶家花园业主叶贻铨为方便进出而建的煤屑路。历史上，它先后被命名为叶氏路、澄衷路、叶盛路、政澄

路等，都与叶氏家族有关。这条路东接叶家花园、西连淞沪铁路江湾车站，复旦在江湾立校后，因前门道路尚未开辟，这条路是师生出行的主要通道。由此，它开始兴旺起来——饭馆、水果店、西服店、弹子房、溜冰场一字排开，非常热闹。1930年，入读复旦人数增多，这条路上还开设过不少校外宿舍，如“良友”“地保家”“Eton（伊顿）”等。后来，复旦校园南侧的翔殷路（今邯郸路）筑好，前门成为师生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才逐渐萧条。假如没有复旦后门，这条路就不可能兴旺；假如复旦后门是正门，这条路真有可能一直兴旺下去。

邯郸路。邯郸路是今天五角场地区最有人文情怀的道路之一，它与今天的翔殷路是“五条路”中最特别的两条道路。从地图上看，翔殷路和邯郸路是一条直线，原来两者本是一条路，开筑于1922年，东起军工路、西达东体育会路，因跨引翔、殷行两乡，取名为“翔殷路”。复旦江湾校园建成后，南面的老校门（2005年百年校庆时以原样重建）本是为迎接门前筑成翔殷路而建的。然而，开学两三年，翔殷路一直没有筑好，师生只能走后门。“走后门”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如前所述，被迫从复旦后门（北门）出行；另一个是校方走关系、通路子——后来正好由复旦校友陆达权任职淞沪护军使署，复旦门前的翔殷路才于1925年筑好，复旦前门（正门）道路开通。1932年秋，复旦校车由正门沿翔殷路直通市中心。1933年12月，闸北华商公共汽车公司开辟4路公交车，从上海北站经过翔殷路直抵江湾市政府。至此，从市区到复旦的道路正式打通，翔殷路成为今五角场地区第一条市政意义上的道路。1947年，淞沪路以西的翔殷路被命名为“魏德迈路”；1950年，魏德迈路被改名为“邯郸路”。

国权路。国权路曾经是解放前后五角场地区最热闹的马路之一。国权路原名“协睦路”，筑于1939年日军占领时期，本来这条路非常荒凉，因有日本驻军，一般人难以踏足。抗战胜利后，复旦由渝返沪，这里的百余幢日本房舍被复旦接收，改为师生宿舍（俗称“三村四庄”）。因为国权路正对复旦校门，是师生从宿舍到校的必经之路，国权路便热闹起来。与此同时，沿街店铺也应运而生，来喜饭店、沈志记食品店、仙宫理发店、国权照相馆、万和酱油店和成渝饭店等，都是国权路上的“名店”。其中，“来喜

饭店”名气最响。当年有一个笑话：假如学生囊中羞涩，就可以到来喜饭店碰碰运气，说不定能享受免费用餐——因为复旦教授大多喜欢在此用餐，见到学生，他们往往会埋单请客。当年，住在复旦“三村四庄”的复旦子弟，对国权路情有独钟，他们往往把国权路比作“南京路”、把政肃路比作“淮海路”……国权路的“繁华”可想而知。1964年，复旦校门东移，建造到今天的位置，正好斜对国年路，国权路的地位才有所下降。

以上几条道路的故事，足以证明复旦在五角场历史中的地位：原来这里一片荒芜，复旦来了，它们开筑、发展、兴旺；复旦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它们的兴衰。它们的故事，也正是五角场历史的写照。可以说，没有复旦，五角场的历史就会改写；复旦的出现，对于五角场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次相遇，情定终生

五角场遇上复旦，就慷慨拥抱了复旦；反过来，复旦的发展，也离不开五角场。复旦在江湾立校后，除了抗战期间被迫西迁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里（1937年，复旦曾有过一次迁址无锡大雷嘴的动议，但后来一直未能实现）。解放后，随着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复旦正式成为国家重点高校，定位上海。复旦从此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在此发展。本世纪初，因扩招教改，复旦曾有在外区扩大校园的设想，但一直立足五角场。用复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老师的话来说：“这里（指邯郸校区）是复旦的‘根’，我们不会离开。”因此，“当五角场遇上复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两情相悦，火花四溅”“一次相遇，情定终生”。

在五角场与复旦相遇的过程中，五角场始终对复旦充满善意。以复旦校园扩展为例：复旦校园原在翔殷路北侧70亩（今邯郸校区西部一隅）；1935年，复旦将校园东南侧的私人庄园“燕园”并购入校；抗战胜利后，校园向南拓展，有了“三村四庄”（国权路、国年路是其南部校园的中轴）；解放后，复旦校舍又开始东扩，在国定路西侧建造了学生宿舍；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将政通路以南、国定路以东的一块农田扩建为女生宿舍；本世纪初，又向西北拓展，将政民路建筑机械厂188亩土地以每亩65万元单价买

下，后又将国定路以东原轻工业专科学校校园扩并为新闻学院；直到本世纪初，将新江湾城的一块地变成复旦新江湾校区。

改革开放后，五角场又与复旦一路携手同行。1980年，有关部门斥资一千万元，改造五角场泵站，五角场地区和复旦校园屡遭水淹的局面明显改观；1983至1984年，因迎接五届全运会和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邯郸路改造拓宽，增加了非机动车道；1988年，为了方便复旦师生过往邯郸路，在国年路口建成了五角场地区第一条人行过街地道——“复旦地道”；1993年建成的内环线高架，原是打算经过邯郸路复旦校门前的，后因复旦教师提议，绕行中山北二路；1989年，复旦师生和五角场居民盼望已久的朝阳百货大楼在五角场中心拔地而起；2000年，中环线高架建设经过邯郸路，为了不破坏复旦校园景观，从大柏树开始，高架路转而进入地下通道；2018年，连接复旦邯郸校区东门的政通路改造，根据复旦师生的建议，增设了“拉杆行李箱通道”，这条马路后被评为“五星级”。

讲到这里，我不妨做个总结。“当五角场遇上复旦”，既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课题。历史上，五角场与复旦已经写下过不朽的篇章；未来怎么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历史如何把握。我的老师沈渭滨教授说过：“不要让历史停留在课本上。”意思是，历史不仅仅是用来“读”的，更是用来“做”的。了解历史，是为了知道我们到底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今天，五角场与复旦的不少历史，有些还深埋在某个角落，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历史档案、建筑遗存和文物都是无言的、沉默的，不会说话，但它会深深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必须保护好、利用好。例如，许多老建筑，看起来破落不堪，但它有故事，就决不能一拆了之。我有个设想，希望有一天，五角场地区的某条马路，也会被列入“历史文化名街”的名录中。

我在研读复旦校史时发现，五角场历史与复旦校史有很多地方是重合的。作为复旦人、五角场人，我们有责任讲好复旦故事、五角场故事……让我们共勉。

（根据作者2019年5月24日在“大隐·五角场人文讲坛”上的演讲整理）

夜来幽梦忽还乡

写在《复旦人》十周年之际

□ 文/章晓野

2009年，我遇到了《复旦人》，参与她的创立，见证她的成长，留下自己的痕迹，这是我人生重要的缘分。在我心里，《复旦人》是一本“大学私有杂志”。在这里，你可以窃窃私语，无需铺垫，自有人懂。2019年，《复旦人》正好走过十年。因为《复旦人》结识复旦人，校友们对母校的依恋与怀念，自然真挚地流淌在字里行间，留在杂志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因为有《复旦人》相伴，我的十年也变得深情几许。每天路过编辑部，竟然有点近乡情怯，不思量，自难忘。

《复旦人》刚开始试刊，没有固定的记者，于是问团委《复旦青年》借了几个学生记者，我负责一场北京校友活动的报道，这是一场近千人的青年校友聚会，由八十年代的校友为主体组织：《复旦三十年，我们的校园故事》。我带了当时新闻系大三的同学张小叶。这是一场近千人的青年校友聚会：《复旦三十年，我们的校园故事》，由八十年代的校友为主体。我不希望仅仅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而是想记录这场活动的情感源起，还原他们生活的那个校园和年代。小叶刚结束新闻单位实习，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小叶采访了近30位校友，有些人可能最后只是一句话，但正是这些非常有信息量的口述真实还原了当年的校园生活和八十年代的青春理想。于是，有了试刊第1期《三月，我们相聚北京》。文章开篇我写了引子，想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扫过尽量多的场景，记录下尽量多的复旦人：

“2008年夏天，北京。

对季翔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寻常的同学聚会。聚会的地点是他的新家。不久前，一批相熟的复旦校友来看北京奥运，顺便成了季翔新家第一批客人。现在，这座四合院里聚集了好几位当年的学生会主席。众人把酒言欢，各叙往事。张璐说到自1997年200多位校友北京聚会之后，不觉十年已逝，年轻校友越来越多，却一直没再聚起来，不免有些遗憾。大家纷纷附和，当场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张璐大醉成为那场聚会的注脚。”

后来，我带着小叶写了第2期《相聚陆院 重上井冈山》。正好我是活动组织者，参加的大都是我比较熟悉的90年代初入校的校友。二十年后一起乘坐火

车重回军营，大家激动难抑，彻夜难眠，青春回忆融化在迷人的春风里，记忆里那个夜晚格外明亮晃眼。在去南昌的火车上，小叶开始穿插采访，我也是被采访对象，当车厢逐渐安静下来后，随着摇摇晃晃的火车，只剩下我和小叶的“卧谈会”一直延伸到黎明。我们一起大嚼“来伊份”“泡椒凤爪”，被辣得几天不知道饭菜味，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来伊份”这个专做零食的牌子。这些采访的细节后来都出现在文章中，留下很多专属的回忆。文字秉承记录风格，娓娓道来，如那天凌晨站台清新的空气，铺陈开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场景。“回忆是为了印证，历史通向未来。”文章最后说出聚会之深意。

“1991年，高峰拿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他还在乡下。9月12日，高峰从老家苏北盐城出发，在南京站踏上了去南昌的火车。他随身带了一个包，里面放了四本《毛泽东选集》。在火车上认识的第一个复旦同学，很巧也是他在南昌陆军学院的邻铺，后来成为他的亲密好友，现在是复旦经院的陆铭教授……”

离开校园后，正值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批有军训经历的学生成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他们中有开创“盛大”奇迹的陈天桥，有杰出的西部志愿者91国政的马骅。陈天桥说：“在我迈向18岁成年的那一年，我在南昌经历了特有的酷暑和严寒整整一年，但是我在江西带走了我的信仰。”回忆是为了印证，历史通向未来。”

有了两次成功的尝试，我也更有自信，指挥着学生记者们，形成了《复旦人》口述的基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试刊第4期，我带着朱江燕等一批学生记者野心勃勃地策划采写《3108琐忆：今晚我们一起去听讲座》。3108是复旦的文化地标，写得有点辛苦，几易其稿，但是坚持了这种记录的风格。我们采访了在3108做讲座、组织讲座和听讲座的三类人群，探讨这个教室对于复旦人的独特意义。文章结尾我有感而发，也可以说是我对杂志意义之所在思考：

“回忆起3108，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这里既有时代的留痕，也有个人的印记。3108并非一个圣地，谈起她时，复旦人没有刻意将之定性或定型。她不低俗，也不曲高和寡，各种类型的文化、不同体系的思想在这里汲取营养，开阔眼界，在一种彼此认

同的文化氛围中，建立起与这个校园、这座城市、这个社会和国家或深或浅的联系。”

此后，第5期《三十而立：庆祝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成立30周年》的“复旦世经帮”、第8期《海那边有个家》的“复旦军三届”、第14期《重温一九五二》的“工商管理52届”。《重温一九五二》是我们根据管理学院校友中心的口述材料整理，我和小记者在整理时几度落泪。工商52届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走进复旦的学子，他们的故事闪耀着“理想、信仰、奉献”的时代光辉。在他们的口述里，既有新中国初建时的复旦校园，城市脉搏和国家新貌，也有在时代的洪流中始终温暖着他们的同窗师生情谊和母校复旦精神。可以说，正是复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复旦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追求支撑着《复旦人》，按我们心中理想的样子丰沛地成长着。当《复旦人》接到李岚清学长为杂志创刊题写的“我是复旦人”和“复旦人”印章时，这对于只有两个非编制专职人员的编辑部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小叶同学现在应该毕业也快十年了，如今媒体生态已经天翻地覆，还记得你在校园里做过的《复旦人》吗？真的有点想念，也衷心祝福你。

李斯嘉最初是我在《复旦人》遇到的颇有灵气的一位学生记者，后来毕业时她没被当时的《东方早报》录用，“流落”到《复旦人》编辑部。斯嘉同学是广西人，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复旦来读研究生，长得文静瘦弱，偏爱棉质休闲，属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偏偏喜欢味道极重的螺丝粉，走路风风火火，脾气有点急躁火爆。最初经我手的一篇文章是写复旦话剧社聚会的新闻稿。虽然文字有点累赘，稍显“矫情”，但她硬是把一篇新闻写出了哲学的气息，让我大感意外。此后，她成为编辑部的主力，几乎每期都有她的大稿，是“美丽复旦”的固定编辑。在《复旦人》几年的时光，她的文字越来越简洁有力，对复旦精神的把握亦见微知著。《理性的静默：恒隆物理楼》《立人生物楼：立其楼 立其人》《遗传学楼：“摩尔根学派”在中国》《东一号楼：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培养皿》等，斯嘉视角全面，细节深刻，人物传神，到后面她的稿子自然生成，几乎无需我这个主编操心。如今，她已经被宣传部“挖”走，偶尔在校园看到她，一阵风似地走过，看到我时会大叫一声“晓野老师”，带着酸爽螺丝粉的味道，久久不散。

邓昌娥是《复旦人》编辑部第一个专职编辑，最初是《复旦人》招募的记者，在创业创新还没有成为国家战略的年代，《复旦人》就开始有了“创业与梦想”专栏，后来昌娥成为了这个专栏的主笔。校友会开始做十年返校，于是返校视频、十年专稿也成了她

的任务。我想她应该采访了有数百位年轻校友，带过数十人的学生记者队伍。曾经《复旦人》准备将“创业与梦想”的文章集结出书，整理时发现数年的积累，浩浩荡荡，我们都被自己感动了，《复旦人》已然成为非常有价值的记录者。昌娥做的专题中，“上医情怀”应该是她最不熟悉的领域。在邵仁厚、章滨云两位老师的协助下，昌娥和编辑部一起写出了《医者的世界：记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平凡的一天》《红房子：每一天都是新的》等佳作。为此，她和小记者们第一次深入到手术一线，说“被吓得不轻”。因为《复旦人》编辑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专职的，几乎所有的栏目包括日常事务，没有合适的人，她都需要顶上。找不到记者，找不到摄影，就直接自己上，找美编跑印刷厂只好亲力亲为，包括将稿费清清楚楚地发到记者和校友的手里。还好她是新闻系毕业，经常可以找到很专业的外援，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久而久之，我当成理所当然，直到后来，编辑部不堪压力，控诉造反，昌娥几次泣不成声。我已经记不得当时自己是如何劝慰的，但最后总是老生常谈：“复旦资源那么多，学生那么优秀，你们要自己培养队伍呀。”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可见的结果就是编辑部的门越关越深。

和斯嘉一样，昌娥也长得文弱秀气，说话不急不徐，胃不好，吃饭时总是慢条斯理。小小身量，能量巨大，能写能导，镜头语言非常好。我一直有点好奇，昌娥说话条分缕析，逻辑清晰，表达准确，她的文字却始终洋溢着青春气息，缺点沉着冷静。对于我这个有点偏执的“老人家”来说，我总是要“敲打点拨”说，人和文字都要长大呀。我不知道，最后她的离开是因为“压力”还是我的“唠叨”。2018年的春天，在又一个返校季如火如荼之际，昌娥和斯嘉先后都要离开了，编辑部一下就空了。仿佛与这个房间有着什么牵绊，我也要转换跑道了。在离开的前几天，突然间，编辑部传来李智展和斯嘉激烈争吵的声音，我跑过去，看到智展泪流满面，斯嘉不知所措。校友办的同事悄悄拉住我，说可能智展有点情绪，因为斯嘉和昌娥都走了。我大恸，不知道如何安慰，只好转头安慰自己，斯嘉还在复旦，昌娥还在上海，她们都有了更好的平台，应该为她们高兴。就像离开这个校园的复旦学子，《复旦人》只是她们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外面的世界很大，她们还要开创自己的精彩人生。

时间过得飞快，幸好《复旦人》很快来新人了。如今，每次走过那个房门，我仿佛还能闻到里面飘出的螺蛳粉的味道和编辑部姑娘们没心没肺的大笑。

想念你们。📞

温润如玉 饮水思源

□ 整理/张丹枫



林太珏先生简介

(Mr. John Ling, 1937-2013)

祖籍广东汕头，1937年出生于上海，林家兄弟姐妹共十人，他排行第六，后随父母移居香港。林先生年轻时开始创业，后回内地投资，展现商业才华。晚年他致力于慈善事业，捐资助学，奉献社会，垂范后人。2019年，根据林太珏先生的遗愿，其家属将其在雁荡路房产售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复旦大学，襄助复旦大学教育事业。

▲ 林太珏先生高中时留影

2019年5月18日上午，“林太珏环境楼”揭幕仪式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举行。仪式上，华侨林太珏家属向复旦大学捐赠八千万元，用于支持复旦大学教育事业。

林先生从小受父母熏陶，培养了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勤奋坚毅的作风。林先生一生尽展商业才华，年轻时开始创业打拼，从成衣代理人做起，直到开工厂办企业，不断做大企业规模，成就了一番事业。独立自主和勤奋坚毅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祖国改革开放后种种可喜的变化，让林先生深受鼓舞。为报效祖国，从1990年开始他就在国内投资，先后在北京、深圳、无锡等地创办服装和纺织印染企

业，艰辛的努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使他的每家企业在当地都颇负盛名。

2000年后，凭借企业家灵活的头脑和敏锐的判断力，具有老上海情结的林先生将目标投向了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他在上海商业区淮海中路雁荡路买下了一幢建于1923年的法式老建筑，改建成为一幢见证上海新旧历史变迁，承载美味佳肴的西餐厅——满迪牛排馆。2002年林先生又投入巨资，创立了高端民营医院——上海申德医院。2010年，他又一次挑战自己，在日本北海道 NISEKO 滑雪场附近建成了 M-HOTEL 酒店和 MONTY'S 西餐馆。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的事业之路走到了终点。

如今，林太珏先生离开快六年了，但他所有的家人、朋友和员工还一直在效仿他、感恩他、怀念他。

大家敬佩他对工作的积极态度。林先生认为工作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视工作为乐趣，为施展自身能力的人生舞台。他自己对待工作更是不知疲倦、乐在其中。他兴办的实业遍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员工来自五湖四海，人数多达几千人。

大家感恩他对下属的慷慨无私。虽然工作上他对大家非常严厉，但生活上始终对每一个员工倾注爱心。他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面前，像一个宽厚、慈爱的父亲。一旦员工本人或家庭遇到困难，他立刻慷慨解囊给予关怀和资助。在他的每一个企业中，跟随他超过十年以上的员工比比皆是。哪怕在病重期间，他依然牵挂着他的企业和员工。林先生的人格魅力，造就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也感染了他的员工常怀感恩之心，激励他们诚信做人，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大家怀念他对人生的奉献态度。林先生很富有，但生活却异常简朴，从不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他乐善好施，多年前就向国内的一所儿童福利院捐款，用于资助因健康问题需要接受治疗的儿童。他还连续多年向贫困地区的小学捐款，帮助改善那里的教学条件。

更难能可贵的是林先生一生低调，从不宣扬自己，做善事不求回报。2013年他病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嘱托家人把他的遗产捐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与个人成功的关键。

林太珏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复旦人感恩林太珏先生及其家属的慷慨捐赠，林先生的为人和善举也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复旦师生不忘初心、立德树人、饮水思源、奉献社会。

(文章根据捐赠揭牌仪式上林太珏先生的姐姐 Lydia 的发言整理。)



▲ 复旦大学“林太珏环境楼”揭幕仪式合影留念

2019 年复旦大学校友会 开展寒假学生走访校友活动回顾

编者按

复旦大学像一条柔软而坚韧的纽带，既连接着一代代复旦人的情感，也贯通着一代代复旦人的精彩人生。

众多杰出的校友是复旦大学的宝贵财富。一届又一届优秀的复旦人从校园走出，走向了各行各业，面对时代馈赠的机遇，塑造出“复旦精神”，闯下一片开阔的天地，既是复旦的名片，又是后来者的引路人。

“复旦校友走访活动”是复旦大学校友会联手校团委、学工部、研工部、学生职业发展服务中心共同推出的项目，旨在通过假期走访校友，促进在校生与校友之间互动交流，让校友了解母校发展，助力学生成长，汇聚育人力量，传承校友文化。

2019 年寒假，共 42 名学生一对一走访了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校友。走访对象以秩年毕业校友、选调生校友及各地校友会推荐的优秀代表为主。活动共计形成 42 篇走访报告，《复旦人》杂志节选走访报告中的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 走访学生：陈斌贞（华山医院）

走访校友：刘晓莉（福建厦门）

复旦人的气质里镌刻着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也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我们都应该时刻谨记复旦人在社会上应有的担当和素养。

□ 走访学生：陈可（基础医学院）

走访校友：姜雨孜（浙江金华）

姜学姐是一位既具有积极的工作状态，又兼顾家庭的细心而温暖的妈妈。她让我明白，原来在我的人生轨迹之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道路可以选择，只要坚定自己的理想，未来将无限可期。

□ 走访学生：陈鹏程（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闫永成（河南三门峡）

闫永成校友非常注重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以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能力。现行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大，人才标准要求高，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立长志，更重要的是要永葆一颗旺盛的求知欲，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 走访学生：陈子薇（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胡捷（上海）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认真做事，无愧于心，这是胡学长对复旦学子的殷切期望，也是胡学长自己的生活写照。

□ 走访学生：邓丝雨（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王迪杰（上海）

王迪杰校友强调，在校生仍需尽早接触社会，脚踏实地，锻炼和提升自我。新闻行业看重个体的社会经验，新闻报道需要洞察社会的能力，这就要求有志于投身新闻媒体的学子们尽可能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对社会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

□ 走访学生：段宇涵（马克思主义学院）

走访校友：张海鹏（河南安阳）

怀念在复旦的日子，也认真履行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天道酬勤，医者仁心，这八个字牢牢刻在了张海鹏校友的心中，也彰显于他的工作生活中。“未来走向社会，希望同学们都能在该努力的时候不后悔，真心待人必有收获。”

□ 走访学生：范家乐（脑科学研究院）

走访校友：王贺松（浙江宁波）

王贺松校友身上有学生时代的青葱朝气和步入社会后的沉稳谦和。“在学校的时候要把专业学习踏实，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尝试，然后认准一个目标，并不懈地为之奋斗。”

□ 走访学生：韩春秋（哲学学院）

走访校友：符瑜（上海）

在符瑜校友的身上，我看到了复旦人应有的气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他在毕业后一直将这种复旦精神贯彻到工作中，领悟新的知识，把握新的机遇。同时，他亦平和和坚毅，笃志力行，将所学的知识技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是我学习的榜样。

□ 走访学生：韩旭旭（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走访校友：沈滨（上海）

心有情怀，脚踏实地，心怀善意，有所作为。沈滨校友一直践行着“在法的框架下，做一个有情的政策操盘手”。他相信只要每个人都立足当下，做好各自的分内事，并不断寻求创新和完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 走访学生：贺婷（旅游管理系）

走访校友：史乐尧（江西上饶）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件简单的小事，是史乐尧学姐的心得。选调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担当，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也离不开每一个辛勤工作的螺丝钉。

□ 走访学生：胡召玉（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走访校友：杨华（重庆）

杨学长希望所有复旦学子不仅能有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在校时掌握完备且牢固的基础知识；毕业就业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踏实做事，积极向上，为身边更多的人带来正能量。

□ 走访学生：黄雨洁（中国语言文学系）

走访校友：边茜（浙江杭州）

对自己保有清晰的认知，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树立信心，这既是边茜学姐对所有复旦在读学子的真诚建议，也是她自身所行的真实写照。“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愿吾侪皆能自知自信，坦然前行。

□ 走访学生：黄雨琦

走访校友：葛飞（浙江杭州）

葛学长是一个很有拼搏精神和明确目标的人。他相信人生需要不断地学习、奋斗和自我完善。人生的精彩也在于奋斗，在于创造自我价值，在于永无止境的追求。

□ 走访学生：贾一帆（经济学院）

走访校友：郑炜（内蒙古包头）

毕业多年，郑炜学长仍与同学们保持着联系，关注着母校的发展。从事媒体行业近30年，郑炜学长也用自己在复旦新闻系学到的知识为故乡的传媒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才智，经营着一段始于复旦，并终将绵延一生的事业。

□ 走访学生：金晶（法学院）

走访校友：金孔羽（浙江杭州）

“人生不设限，迈出舒适圈”成为金孔羽学姐个人经历的注脚，而她在转换与蜕变中所表现出的清醒与勇敢，在当下普遍焦虑的时代中更是弥足珍贵，毕竟“人生不是一条轨道，而是一片原野”。

□ 走访学生：金梦华（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走访校友：李曼（浙江杭州）

她是一位年轻，很具亲和力，很有职责心的医生。心怀感恩，有敬畏；踽踽前行，有信仰。“做一个不断进取的复旦人”是这次访谈中，李学姐对所有学弟学妹们提出的殷切期望。

□ 走访学生：李加祺（哲学学院）

走访校友：柳健（江苏连云港）

柳健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普通的连云港市民，一位普通的复旦毕业生。他不仅专注自己的事业，更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看到母校越来越好，这样的情怀也是所有复旦人的期待。

□ 走访学生：李平（高等教育研究所）

走访校友：魏晓红（浙江杭州）

魏学姐既是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也是一位扎根地方的万千复旦人中的一员。她认为学习知识务必要全面，不要太功利，不要单纯地被考试的指挥棒所牵引，而是要从长远的角度去看问题，只有拥有全面的专业知识，才能够掌握未知的将来。

□ 走访学生：李淑豪（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高湉棋、孙慧（吉林长春）

高湉棋、孙慧两位校友言谈间多次提到校训，细微处时刻不忘母校教诲。作为复旦人，应该有着与这所学校相匹配的眼光与气质，有着比他人更宽广的视野和抱负，更踏实的工作。我们同处一个伟大的时代，面对困难和选择，青年学子应该务实笃志，不忘初心。

□ 走访学生：刘东兴（中国语言文学系）

走访校友：夏慧敏（上海）

夏学姐认为，自身的专业学习应该摆在第一位。但在专业学习外，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调节自我。每一种职业都不一定完美，每一个人都会有生活的压力，但要如何化解这些压力，如何与生活和解，是人生中需要不断学习、感悟的大课题。

□ 走访学生：罗若婷（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走访校友：魏勇（广西贵港）

说到工作经验，魏勇学长认为新人入职时，做事应该脚踏实地，积极向上。作为选调生，平时更要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要保持年轻干部的蓬勃朝气和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 走访学生：吕志杰（新闻学院）

走访校友：李志远（上海）

公务员是李志远学长的理想职业，他认为，学生要将自己的人生规划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结合，让自己的脉搏和时代脉搏共同跳动。青年大学生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多接触社会，详细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脉络，更好地服务民众。

□ 走访学生：马汲清（社会科学实验班）

走访校友：石立民（广西南宁）

珍惜在复旦上课的机会，持续不断地学习，拓宽知识面，是学姐对所有在校生的期许，同时学姐也希望母校能增进同广西的校地合作，她也期待更多广西的学弟学妹们能回家乡工作，为广西发展做贡献。

□ 走访学生：毛方正（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走访校友：赵政（北京）

从童年到本科，他的梦是青色的，关于环保，关于青春，关于志愿者，关于绿水青山和美丽中国。从硕士到现在，他的梦又添了一抹亮丽的蓝色，是澜湄，是水资源，是和平，是国际舞台。他是赵政，奋斗在北京的复旦青年。

□ 走访学生：欧阳沁苑（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走访校友：黄曦鹏（四川乐山）

“知民生多艰，又知为政不易”，学长这句话让我体会到他对待事业的热爱和服务人民的赤诚之心。近年来复旦学子越来越多选择去往基层，去往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工作创业，我们是螺丝钉，祖国哪里需要去哪里，黄曦鹏学长就是其中的一员。

□ 走访学生：彭诗琪（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谭显荣（湖北武汉）

谭学长将在复旦所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之中，在艰辛的追梦路上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时刻彰显自信、踏实而又豁达的复旦人风采。

□ 走访学生：孙冰清（基础医学院）

走访校友：严耶恩（上海）

“多元发展才能共创未来”，这是严耶恩学长成功背后的求学真理。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我们要珍惜在学校学习的机会，丰富自己的阅历，像严学长一样成为新中国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 走访学生：王风范（新闻学院）

走访校友：钟征宇（上海）

即便迈出了校园，钟学长依然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不断启悟、思索，在他看来复旦赋予我们的不是名校的招牌，也不是多么无可替代的技能，而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与视野，还有价值观的塑造，这是一份让我们受益终生的礼物。

□ 走访学生：吴蔚（材料科学系）

走访校友：余勋玲（湖北武汉）

回忆起复旦岁月，余勋玲师兄总会想起座位要靠抢的自修室，以及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心境。他期望青年学子不拘泥于书本知识，多去接触社会，了解世界形势和产业发展，只有放眼世界，才能着眼未来。

□ 走访学生：夏煜瑶（哲学学院）

走访校友：许行（上海）

许行学长心系复旦学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在校的时光，因为走到社会上后没有那么自由和包容的环境给我们试错。未来，人生将面临很多选择，一定要遵循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梦。

□ 走访学生：肖杨（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黄中原（重庆）

黄学长知识涉猎面很广，敢于挑战未知，并能平衡好事业与生活。这份从容源于他对生活保有强烈的好奇心，和不断学习的能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走访学生：谢珊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走访校友：荣宇（河南洛阳）

荣学姐的职业道路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她始终认为只要勇敢去想、努力去做，好学的人永远不会丧失学习的能力。她建议复旦学子要有更广阔的胸襟，在明确自身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选择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行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 走访学生：熊维（法学院）

走访校友：魏新宇（吉林梅河口）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魏新宇学姐说从事任何工作都要保持耐心，保持学习的积极状态，尤其是在基层锻炼。还应当多走出象牙塔，多参与实践活动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遇到问题时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 走访学生：徐黎佳（基础医学院）

走访校友：盖延廷（上海）

盖学长是白衣天使中的一员，治病救人是他的赤诚初心，砥砺前行是他的求知态度，仁心仁术是他的人生追求，披星戴月是他的工作常态，但他却不悔献身医学，也在病人痊愈后的笑脸中收获感动。

□ 走访学生：杨雅茹（文献信息中心）

走访校友：陈新（浙江杭州）

人生有很多种可能，陈学长建议我们要有及早树立目标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朝着目标不断努力，才有持续奋斗的方向。

□ 走访学生：杨泽璇（新闻学院）

走访校友：郑子昂（上海）

在基层为群众服务的经历，使刚走出校园的郑学长较快了解具体的社情民情，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与真实诉求，在行动上、感情上接地气。基层锻炼可以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和能力，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 走访学生：俞卓淇（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走访校友：吕挺（浙江杭州）

只有能够不断为未来做打算的人，才能在困难来临时安然自若。吕挺校友的向上、知性和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建议我们在校期间不断充实自己，锻炼沟通表达能力，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 走访学生：张思佳（法学院）

走访校友：沈宇锋（浙江杭州）

沈宇锋学长认为，律师要兼具公益精神，法律的职能不仅在于定分止争，还在于确立社会价值。怀揣家国情怀，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 走访学生：郑泽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走访校友：杜楠（上海）

“找准定位、勇于尝试”是杜学长基于多年工作经验对复旦学子提出的就业建议，“以人为本”是他教给我们的处世准则，亦是质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 走访学生：周婷（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走访校友：杨本立（上海）

因梦想而稳重，因逐梦而充实，这是杨本立学长的真实写照。他正按照自己的爱好做着喜欢的工作，他也希望所有复旦学子明确目标，学会取舍，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获得自我的成长。

□ 走访学生：朱宁（中国语言文学系）

走访校友：王彪（安徽合肥）

与王彪校友的沟通中，他多次提到“突破”这个词，努力突破的收获是自我的成长和进阶。而在复旦的学习则给予他敢于去突破的勇气，他说：在复旦学习，会让人变得更加通透和自信，这是基于精神上的不断丰满，以及知识积累的厚积薄发，只有把自己沉淀下去触底，才能体会到凭空一跃的满足。

□ 走访学生：邹萌（哲学学院）

走访校友：陈悠（福建福州）

用十年时间做一件平凡的事，却成就了不平凡的陈悠学姐。毕业后她选择回家乡做一名环保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甘于奉献，默默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同时，陈学姐也希望更多的复旦学子能够回到家乡，助力家乡建设。

更正

本刊2018年12月第31/32期中“上医情怀”专栏《精心绘制16位一级教授油画像向母校献大礼》内容勘误如下：

- 1、第94页荣独山应为胡懋廉
- 2、第95页胡懋廉应为荣独山

特此更正，感谢大家对本刊的关心和支持！



▲ 胡懋廉



▲ 荣独山

■ 复旦大学多个项目获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2019 年 1 月 3 日，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正式公布。由复旦大学牵头完成的“入耳入脑入心 同向同行同频：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和“中国根、复旦魂——打造重实效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系”2 个项目获一等奖，“卓越为公：政治学一流专业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等 5 个项目获二等奖。

■ 复旦大学举行《三国戏曲集成》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5 日，《三国戏曲集成》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三国戏曲集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今汇集三国戏曲最多、最全、最完备的图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 复旦大学教授周鸣飞领衔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

2019 年 1 月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周鸣飞领衔项目“瞬态新奇分子的光谱、成键和反应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

■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荣获多项 2018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质量奖

2019 年 2 月 13 日，2018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获奖名单公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主任潘柏申获 2018 年度上海市市长质量奖（个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获 2018 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组织）。

■ 复旦大学与徐汇区合作办学、合作办医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2019 年 2 月 24 日，复旦大学与徐汇区人民政府合作办学、合作办医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徐汇区政府大楼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徐汇区委书记鲍炳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等区校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 QS 学科榜单发布：复旦大学 10 个学科全球前 50，29 个学科全球前 100

2019 年 3 月 4 日，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 2019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排名显示，复旦大学有 10 个学科位列全球前 50 名，在中国大陆高校中位列第三（并列），29 个学科位列全球前 100 名，位列中国大陆高校第二（并列）。中国大陆高校中，仅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五大学科门类排名全部位列全球前一百名。在前 50 名学科中，本年度新增 3 个，分别是神学和宗教研究（第 31 名）、药学与药理学（第 33 名）、会计与金融（第 50 名）。

■ 复旦大学经济学与商学进入 ESI 前 1%，总入榜学科居全国第二

2019 年 3 月 14 日，ESI 公布了最新一次学科排名（2008.1.1-2018.12.31）。数据显示，我校经济学与商学（Economics & Business）成为最新进入榜单前 1% 的学科。继地球科学学科去年 9 月入榜，半年来复旦大学再次增加全球前 1% 的学科，总入榜学科增加至 19 个，位列中国大陆第二（并列）。

■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修发贤课题组发现来自费米弧表面态的超高电导率

2019 年 3 月 18 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修发贤教授课题组相关研究论文《外尔半金属砷化铌纳米带中的超高电导率》（Ultrahigh conductivity in Weyl semimetal NbAs nanobelts）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于《自然·材料》（Nature Materials）。

■ 复旦大学三名思政课教师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2019 年 3 月 18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冉、高国希教授以及青年教师陈果等出席座谈会。

■ 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2019 年 3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举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当天，第二届“复旦-长光科技论坛”举行，双方 15 位科研人员就光学、材料、医疗、半导体等主题作学术报告，深入探讨双方技术需求及合作领域，促进优势互补，为 2019 年度“复旦-长光合作基金”项目征集奠定基础。

■ 复旦大学获得第一届“上海市文明校园”称号

2019 年 4 月 10 日，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复旦大学获得第一届“上海市文明校园”（2017-2018 年度）称号。

■ 复旦大学多项发明成果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2019 年 4 月 10 日和 15 日，“第 47 届日内瓦发明展览会”于瑞士日内瓦举行，复旦大学“大视场低畸变高分辨率全景视觉系统”和“骨超声诊疗仪”两项发明获金奖，“柔性织物储能系统大规模制备技术”“超低功耗气体 LDAR 感知物联网设备”“自主交互中医体检机器人”三项发明获银奖，“可穿戴小儿黄疸光疗衣”发明获铜奖。

■ 复旦大学金力团队中国语言学研究成果首登《自然》主刊

2019 年 4 月 25 日，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综合运用语言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揭示了世界第二大语系汉藏语系起源及分化的时间和地点。该成果以《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为题，以原创性研究论文形式在线发表于《自然》（Nature）。这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首次在《自然》杂志发表科研成果。

■ 复旦大学袁正宏团队成功研究出建立体外维持成熟肝细胞功能的新方法并应用于病毒学

2019 年 4 月 26 日，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重点实验室袁正宏研究组与北京大学邓宏魁研究组、解放军总医院卢春春研究组合作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原代人肝脏细胞在体外的长期功能性维持》（Long-term functional maintenance of primary human hepatocytes in vitro）的

研究论文，首次证明利用化学小分子调控细胞信号通路，实现了功能肝细胞在体外的长期维持，并证实此肝细胞在体外支持乙型肝炎病毒（HBV）及丙型肝炎病毒（HCV）的长期持续感染。

■ 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第三届第十三次会议举行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第三届第十三次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基金会理事长焦扬，校长、基金会副理事长许宁生，校党委副书记、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许征，以及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及理事代表等出席会议。

■ 长三角区域肿瘤防治一体化医疗联合体在沪成立

2019 年 4 月 28 日，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发起的长三角区域肿瘤防治一体化医疗联合体在沪宣布成立。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邬惊雷，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以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郭小毛等有关医院负责人出席成立仪式。

■ 应勇市长调研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

2019 年 5 月 8 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调研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定位和建设情况并做出指示，就学科发展、研究进展等与科研团队深入交流。该创新中心充分发挥复旦综合性学科和科技优势，已承担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 104 项。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副校长张人禾，微电子学院、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相关专家参加调研。

■ 复旦大学多项成果获 2018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2019 年 5 月 15 日上午，2018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召开，表彰为上海科技创新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复旦大学获 3 项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 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 5 项二等奖和 7 项三等奖。同时，物理学系教授张远波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 **复旦大学多位专家获第十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和提名奖**

2019年5月18日，第十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评选结果揭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董健教授获“第十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物理学系周磊教授、化学系夏永姚教授、附属中山医院丁小强教授、附属肿瘤医院雷群英教授获“第十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称号。

■ **聚焦全球变局中的亚洲：“上海论坛2019”年会举行**

2019年5月25日至27日，“上海论坛2019”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变局中的亚洲：挑战、发展和新范式”，分为“新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秩序：全球变局与结构重塑”“新高度：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四个板块，共30场学术活动。同期举办的还有首次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全体工作会议与复旦—拉美大学联盟第二届理事会

会议。来自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高校、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嘉宾和代表共700余人参加了论坛。

■ **复旦大学与多伦多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9年5月28日，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和多伦多大学校长助理Chris Yip分别代表复旦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两校还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加国际智能与健康城市(Smart and Healthy City-SHCity)研讨会。

■ **复旦大学“杨咏曼楼”揭幕仪式举行**

2019年5月28日，“杨咏曼楼”揭幕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校党委书记焦扬，上海市原副市长、第十届上海政协副主席、1962届医学院校友左焕琛，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许征，杨咏曼女士、邓秉钧医生夫妇及其亲朋好友，以及上海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复旦大学相关部处负责人出席了揭幕活动。

■ **复旦大学获批建设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2019年6月7日，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复同意复旦大学承担的“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可研报告，项目建设总经费4.7亿元，实施期从2019年起至2021年。

■ **卢森堡大公国副首相一行来访复旦大学**

2019年6月12日，卢森堡大公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弗利克斯·布拉兹(Félix Braz)一行来访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宁生和副校长陈志敏会见了来宾。法学院和孔子学院等单位代表参加会见。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全国双创周启动仪式，复旦学生作为上海高校唯一代表参加活动**

2019年6月13日，以“汇聚双创活力，澎湃发展动力”为主题的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杭州余杭梦想小镇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浙江杭州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学生、第四届中国“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红色筑梦之旅”全国银奖项目参赛队员魏博磊作为上海高校唯一代表，受邀参加本次活动并与李克强总理亲切握手及交谈。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建设启动**

2019年6月14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建设启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介绍上海医学院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建设相关概况和进展情况，校党委副书记许征介绍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相关财务政策及要求。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主持会议。

■ **吉冬梅、金炯校友荣登福布斯“2019中国最佳女性创投人”榜单**

2019年1月23日，福布斯中国发布“中国最佳女性创投人TOP25”。上海金浦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生命科学学院1991级本科、1996级硕士校友吉冬梅荣登榜单第十名，源星资本管理合伙人、管理学院1988级本科校友金炯荣登榜单第二十五名。

■ **陈启宇校友荣获“2018年上海市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季昕华校友荣获“2018年上海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

2019年2月26日，2018年上海市优秀企业家、上海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评选表彰会举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生命科学学院1989级本科校友陈启宇被授予“2018年上海市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UCloud)创始人兼CEO、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2009级硕士校友季昕华被授予“2018年上海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

■ **马玮玮校友荣获第七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称号**

2019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联合举行以“万家灯火·平安上海”为主题的第七届上海市“平安英雄”颁奖典礼。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 **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教授宋梁当选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2019年6月21日，加拿大工程院(Th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于加拿大魁北克城举办2019年度年会，并发布2019年度入选院士名单，共有54位杰出学者当选。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教授宋梁当选加拿大工程院院士(AI及5G智能网络领域)。

■ **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受邀赴中宣部宣讲**

2019年6月26日，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受邀赴京，以“砥砺前行 永久奋斗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与担当”为题，面向中宣部机关及直属单位600余位干部进行宣讲。

第一分院主办检察官、法学院2008级法律硕士校友马玮玮荣获第七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称号。

■ **侯保荣校友荣获2019年度NACE科技成就奖**

2019年3月27日，在全球最大的腐蚀国际组织——NACE(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主办的2019年国际腐蚀大会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以及中日海洋腐蚀环境共同研究中心主任，化学系1962级本科校友侯保荣院士荣获NACE国际颁发的科技成就奖。

■ **宓群校友荣登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2019年榜单TOP15**

2019年4月2日，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2019年榜单公布，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1986级物理系本科校友宓群再度入选，位列全球榜单第12位，荣登TOP15。在此之前，他更是多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佳投资人之一。

■ **于漪校友入选建国70周年“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

2019年6月中旬，建国70周年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公示，教育系1951届校友于漪以60年来对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贡献入选，成为名单中唯一来自基础教育领域的最美奋斗者。



■ **复旦大学2019届本(专)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

2019年6月21日，复旦大学2019届本(专)科生毕业典礼(上午)、研究生毕业典礼(下午)先后在正大体育馆举行。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等学校党政领导，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各院系及部分机关部处负责人，毕业生家长代表，中学校长代表等共同送别3000余名2019届本(专)科毕业生，及5526名研究生毕业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实验物理部主任、研究员、1991届物理系杨家敏校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1992届电子工程系张顺茂校友分别在本(专)科生毕业典礼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寄语毕业生。

■ 己亥春来 全球校友会开启春节联欢季

2019年1月至3月，北京、天津、福建、西安、上海、深圳、青岛、加拿大（多伦多）、新疆、甘肃、厦门、山西、南昌、加拿大（渥太华）、美国（纽约）、美国（北德州）等地区校友会先后举行年会、校友联谊、团拜会及慰问老校友等丰富多彩的迎新、庆新春活动，并将复旦大学校友会制作的新春光华窗花传递给全球各地的复旦校友。

■ 汇聚校友爱心 助力傅建设校友家属渡过困境

2019年年初，由复旦校友自闭症家庭关爱基金牵头联络，上海校友会联合发起捐赠倡议，经海内外

复旦校友纷纷伸出援手，通过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为经济学院因车祸不幸离世的1983届本科、1993级博士校友傅建设的两位自闭症女儿献爱心。截至2019年1月9日，共有3721名校友及各界爱心人士参与捐赠，共筹善款70余万元。

■ 柬埔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

2019年1月22日，柬埔寨校友会举行成立仪式，校党委书记焦扬为柬埔寨校友会揭牌，对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经柬埔寨王国政府内政部审批，柬埔寨校友会于2019年1月18日获准注册成立。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博士钱明光校友担任会长。

■ 法国校友会荣获2018留学工作先进团体称号

2019年2月23和24日，驻法国使馆召开2019年全法留学工作会议，复旦大学法国校友会荣获2018年度留学工作“先进团体”荣誉称号，是仅有的获此殊荣的2个校友会团体中的一个。

■ 百岁校友汤于勋先生书法作品展开幕式举行

2019年5月10日，由复旦大学校友会主办的汤于勋校友书法作品展开幕。上海市原政协主席蒋以任，上海市原副市长、校友沙麟，校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校原副校长方林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沈鸿根等嘉宾，汤于勋先生家属好友以及部分校内师生出席开幕式。

■ 复旦大学校友会举行2019“职场零距离”活动

2019年5月11日，复旦大学校友会与校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联合举行2019“职场零距离”活动，为学生搭建来自校友的职业发展咨询平台，来自金融、企业管理、生物医药、IT等行业的26位校友重返校园，带着他们多年的职场经验，与在校生共同分享。

■ 复旦大学建校114周年校友返校日活动顺利举行

2019年5月26日，适逢复旦大学建校114周年前夕，“家国志 卿云梦：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19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活动”举行，包括1969

■ 复旦大学校友会举办“来复旦寻找春天”——美丽校园基金主题返校活动

2019年3月24日，复旦大学校友会和校总务处在邯郸校区光华楼前草坪联合主办“来复旦寻找春天”——美丽校园基金主题返校活动，活动得到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复旦大学校友会首次组织以“自然”为主题的校友返校活动，特别邀请了美丽校园基金捐赠人校友共同返校，也吸引了200余位复旦校友及家庭报名参与。



届、1979届、1989届、1999届、2009届，共5届118个班级约3000名校友携家属重返校园，畅叙师友情谊。

■ 全城交响·上海交响乐团为你而来——复旦校友专场公益音乐会举行

2019年5月27日，由复旦大学校友会和上海交响乐团联合主办的“全城交响·上海交响乐团为你而来——复旦校友专场公益音乐会”在相辉堂南堂举行。上海交响乐团东海岸·弦乐四重奏应邀为六百多名校友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音乐盛宴。

■ 各院系校友代表在院系2019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发言

2019年6月毕业季，新闻学院1990届本科校友吴晓波，法学院1997届本科校友刘永龙，经济学院2000届硕士校友宋铮，生命科学学院2005届博士校友朱化星，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09届博士校友芮宏，材料科学系2009届硕士校友朱健，公共卫生学院2018届博士校友方卫等校友回到母校参加院系毕业典礼，给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学弟学妹们讲述他们的复旦故事，分享他们宝贵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 静安区携手复旦大学联合举办“复旦校友进静安”活动

2019年6月12日，静安区携手复旦大学联合举

办“复旦校友进静安”活动。校党委书记焦扬，校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中共静安区委书记陆晓栋，区委副书记、区长于勇，区委副书记黄红，区委常委、副区长周海鹰，以及校外联处，校党委政策研究室，静安区相关委、办、局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与四十多位复旦大学校友企业家座谈交流。

■ 复旦大学校友会举行2019届班级联络员会议·聘任仪式

2019年6月13日，2019届班级联络员会议·聘任仪式举行，全校三十多个院系及研究所的147位本、硕、博毕业生被聘为班级联络员。10年间，已登记在册的返校日联络员以及毕业季聘任的班级联络员总数已超过2000余人。

■ 复旦大学基层工作校友返校座谈会举行

2019年6月19日，复旦大学基层工作校友返校座谈会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校原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一华，各地组织部门代表，校友会代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部分院系学生工作负责人，以及十余位选调生校友共同参与了座谈。来自安徽、陕西、上海等10个省（区、市）的基层工作校友在会上对工作中的经历和感悟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 111周岁秦含章校友向母校捐赠珍贵档案

2019年3月19日，校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征，北京校友会会长、校原党委书记程天权，校对外联络与发展处处长、复旦大学校友会执行秘书长杨增国，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莉一行在京探望了111岁高龄的我国著名食品工业科学家秦含章校友。秦老向母校捐赠了章益老校长出具的其受聘母校任教的证明信。秦含章校友生于1908年，他于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1939-1940年），受聘担任理学院垦殖专修科教授。

张胜友： 大时代的阐述者

1948-2018，当代著名报告文学家、出版家。



张胜友笔下的四十年

□ 文/龚新叶

从一名普通记者到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再到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改革开放政论片第一人”，在张胜友身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他的经历，正是中国4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政论片“处女作”一炮打响

1982年春天，张胜友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那时候，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沈阳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家庭剧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单位领导派张胜友前去采访。采访回来，张胜友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篇通讯《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紧接着，1983年初，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张胜友又奉命采写了长篇通讯《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这两篇长通讯发表后，张胜友在新闻界“走红”了。

1991年底，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把电话打到张胜友办公室，给他布置了一个题目——创作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以电视影像为媒介，回顾改革开放10年来共和国的新变化、新成就。进入《光明日报》后，张胜友敏锐地关注着与改革开放有关的一切，频繁地找机会奔赴前线深圳。在那里，张胜友见证了无数制度的出台、实施，也目睹了无数企业的兴衰成败。这些经历让他对创作胸有成竹。《十年潮》完稿后，呈送邓办审阅。半个月后，邓办给中宣部回复：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十年潮》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光明日报》每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其解说词。外媒评述，这是中国为改革开放发出的第二波呐喊，为改革开放擂鼓助阵。邓办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观看《十年潮》后的评价：“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

撰写党的十四大献礼片

在《十年潮》热播之际，张胜友突然病倒，高烧39度。偏偏在这个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给光明日报社致电，请张胜友即刻赶往深圳撰写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政论片，这部片子将作为党的十四大献礼片呈现。此时，距党的十四大召开仅剩4个月时间。发着39度高烧的张胜友当天即飞赴深圳，入住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住过的深圳迎宾馆。在用5天的时间看完材料后，张胜友开始创作《历史的抉择》。

“我在迎宾馆用了20天的时间写完脚本，这20天里，除了下楼吃饭，我没走出宾馆大门半步。”张胜友说。片子拍完后，中宣部直接送到邓小平的家里去审片。邓小平觉得很不错，同时也想知道在场协审员的看法。于是，这部片子被送到十四大会场，成了十四大的献礼片，播放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们是国家级出版社”

1995年9月，张胜友走进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当时位于第四层的作家出版社，已陷入经营困境。作为国家级出版社，它的年发行总码洋才1200万元。然而，到2004年9月，张胜友正式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之时，作家出版社年图书发行总码洋已经飘升至1.8亿元。他告诉记者，在出版社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善于和作者打交道。

“原来是买断制，千字30元钱，10万字才3000元钱，我把合同改成了版税制，卖一本作家就抽成，卖得越多，作家抽成越多。”张胜友说，“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们真诚对待她，以后所有作家都会来投稿，这叫现代商业意识。作为一个走向盛世的大国，中国人也应该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了。”

（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15期）

对话张胜友： 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春笋文学社创办始末

□ 文/姜红伟



▲ 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左起：张锐、张胜友、卢新华、王兆军

编者按

张胜友先生的骤然离世，各界莫不为之痛惜。李克强、朱镕基、温家宝、俞正声等同志为胜友先生敬献花圈以表哀挽。王蒙先生到家吊唁，为胜友先生的告别仪式撰写挽联：“不负时代，不负人生，不负怀抱；留得业绩，留得贡献，留得深情。”二十四字高度概括胜友先生一生精彩。

“复旦于我就是那个时代的窗口，让我得以登高望远，博览众长。”2014年，胜友先生接受《复旦人》采访，深情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在复旦，他创办春笋文学社，主编风靡一时的《大学生》杂志，创作《大学生圆舞曲》，与同学们热烈讨论《伤痕》所传达的文学主张。从福建农村考入上海复旦，即使在群星璀璨的77级中文系，胜友先生依然绽放独特光芒。

离开复旦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胜友先生很快脱颖而出，大放异彩。他以自己的文字、思想和改革实践在人间留下温度、情怀和功业，无愧大时代，无愧复旦人。

几年前，来自黑龙江的姜红伟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张胜友，请他回顾当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春笋文学社的创办始末。特刊发两人对话，回想复旦大学7711的美好时光。

问：请问您们当年为什么要创办春笋文学社？这个创意是由谁提出的？

答：创办春笋文学社的创意首先是由我提出来的，因此也由此担任春笋文学社社长。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中聚集了一批知青文学作者，入学前一些人已在文学报刊发表各类作品，甚至在当地小有名气；复旦大学学术空气自由、活跃，入学后班上创作氛围浓厚，尤其是卢新华同学率先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并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加之上海市作家协会又及时给予大力扶持，因而萌生了组建文学社团的想法，且此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

问：请问春笋文学社是哪年成立的？

答：春笋文学社应该是在大一下学期（即1978年下半年）创办的。

问：请问春笋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有哪些同学？都发表过哪些作品？影响如何？

春笋文学社主要成员有：张锐（发表小说《盗马贼》，后改编成同名电影荣获1988年瑞士第三世界电影节弗里堡市大奖），王兆军（发表小说《在水煎包子铺里》），胡平（发表诗歌《上海，在中国的阳台上》），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荣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可雄（发表小说《杜鹃啼归》），周惟波、董阳生、叶小楠等人（创作讽刺独幕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参加上海市大学生文演汇演并获奖），颜海平（创作十幕历史话剧《秦王李世民》，参加全国话剧汇演并荣获1980-1981年优秀剧本一等奖），张胜友（创作《大学生圆舞曲》歌词，参加上海市大学生文演汇演并获奖，发表散文

《长征第一山》）。同时，张锐、胡平、张胜友还合作电影文学剧本《西铁城》。上述文学作品在社会上都曾引起相当关注和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卢新华的《伤痕》和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在他们还在大学学习期间即被编入了中文系讲授的《当代文学史》教材。

问：能否谈谈您同班同学卢新华和他那篇著名的小说《伤痕》？

答：《伤痕》讲述的是一个为错误时代所蛊惑、背弃自己深爱的母亲的少女，在真相大白后内心满目疮痍的故事。那是1978年春，我们大一时有一堂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老师分析鲁迅的《祝福》时，讲解说：许寿裳曾评价这部作品为“真正的悲剧不是狼吃阿毛，而是封建礼教吃了祥林嫂”。

下课后，卢新华特别有感触，联想到刚刚终结的“文革”，真正的悲剧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整个民族创下了深深的伤痕。于是创作了《伤痕》这篇小说，并贴在班级的墙报上。小说《伤痕》随即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论，有很多人称赞，也有人评价说不好。

卢新华是第一次写小说，几乎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三突出”文艺理论的影响（“三突出”指：反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当时我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我受“三突出”的影响比较深，我对卢新华说，如果是在1957年，二话不说你就是右派。

班上的争论引起整个中文系的争论，中文系的争论又引起全校的争论，引起校长苏步青的关注，校党委书记夏征农也直接参与了争论，他是与鲁迅同时代的左翼作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篇小说，他说“文革”摧残了多少人，给我们国家造成多么深重的伤痕！

整个事件引起《文汇报》记者的关注，他们悄悄向卢新华要了一份小说底稿，拿回报社。这年的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多字的学生习作。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仍被读者抢购一空。

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反思“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

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因为《文汇报》发表了《伤痕》，又引起全国文学界的大讨论。

问：当年，您曾经写了一首风靡全国高校的流行歌曲《大学生圆舞曲》，能否谈谈这首歌词的创作故事？

答：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心灵的复苏。大家跳起舞来，对于和祖国一同从十年浩劫中迎来新生的莘莘学子，那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状态。当时复旦大学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留学生的录音机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文革”时期我们只能听到样板戏等一些轰隆隆的音乐。记得第一次听邓丽君的《千言万语》，我有一种遭遇了一次电击的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

1978年的“五四”青年节，要举行全市中外大学生文艺联欢晚会。联欢会上，本来说是要跳集体舞，可是到跳舞的时候，留学生们却跳起了交谊舞。从那次开始之后，大学里就流行跳起了交谊舞。那时我发现中国没有大学生圆舞曲，就突发奇想自己能不能写一首《大学生圆舞曲》？

“鲜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美丽的花朵争相开放，四海的同学欢聚一堂，我们展开理想的翅膀……”，我几乎是一口气写完了歌词，歌词表达了当时大学生的心态、情绪、情感、理想，也折射了整个国家、社会的一种思潮。

这首歌最初由同学陈小鹰谱好曲后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当时参加文艺演出观摩的有上海歌剧院、上海舞剧院等很多专家，专家看中了我写的词，于是又组织两个作曲家重新谱曲，请了歌剧院的两位歌唱家来领唱，灌制成了唱片，很快在全国流行开来，首先在中央电视台推出，后来全国各省、市电视台都作为每周一歌来播放。

问：春笋文学社是否有自己的刊物？

答：春笋文学社没有专门创办自己的刊物。因为，同时期复旦大学学生会已经创办了人文社科类杂志《大学生》，由我兼任《大学生》副主编，因而，春笋文学社成员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文学评论等作品，曾大量在《大学生》上发表。当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的王沪



▲ 1993年，作家张胜友正在创作（摄影 林世英）

宁，也曾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

问：春笋文学社都举办了哪些有影响的文学活动？

答：春笋文学社创办之初即按各文学门类成立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文学评论等小组，类似于文学沙龙形式，主要是结合中文系的课堂教学，为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们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写作感悟、切磋提升写作水准的平台，老师也参与小组活动。

《上海文学》《青春》等文学刊物曾指派专人长期与春笋文学社保持联络，指导同学们的创作活动，《青春》编辑部还利用暑假期间，专门邀约春笋文学社赴南京，与江苏作协的作家诗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开展文学交流活动，让同学们获益匪浅。

问：春笋文学社是哪年解散的？解散的原因是什么？

答：春笋文学社无所谓解散不解散，只是随着同学们创作日趋成熟，毕业临近忙于写作毕业论文，或考研或即将奔赴四面八方，春笋文学社的活动越来越少，直至完全停止。

问：春笋文学社在当年的影响如何？

答：春笋文学社以鼓励、推动和扶持同学们的文学创作为宗旨，随着复旦中文系77级同学各类文学

作品在全国各地文学报刊上遍地开花，且不断有优秀作品获奖，春笋文学社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文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问：春笋文学社和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系密切吗？

答：春笋文学社与华东师大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厦门大学中文系等高校的文学社团联系较为密切。

问：春笋文学社和13家高校大学生联合创办的刊物《这一代》发生过联系吗？

答：通过《大学生》杂志与《这一代》建立起互通信息的交换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当年的大学生文学社团和大学生文学刊物创办的意义、价值和贡献？

答：当年的国家政治大趋势是：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启动改革开放……文学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高校作为思想解放的前沿，77级中文系又集结了一大批历经十年浩劫与上山下乡磨难的莘莘学子，他们中有不少知青作者，面对新时代、新气象、新生活，创作激情有如井喷，此时此地，高校的文学社团及大学生文学刊物的创办，正是应时势而生又水到渠成，对培育文坛新锐作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前行，发挥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当之无愧地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问：能否谈谈当年春笋文学社的成员现在近况如何？

答：除上述提到的春笋文学社创办时的主要成员，日后他们在文学领域各有建树，大多成为著名作家、学者、编辑家外，当年一批年龄相对较小的同学如李辉、陈思和、谭健、杨德华等，也都在文学事业上颇有造诣。

姜红伟，当代著名诗歌史学家，诗歌资料收藏家。现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第一家民办诗歌纪念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

按下诗歌的重启键

□ 文/杜立德

2019年5月25日，春风沉醉的夜晚。在申报馆 Press 咖啡馆里，举办了一场诗的聚会。它既是复旦诗社老友手抄诗稿的展示，也是一场有关诗歌、友谊、梦想和八十年代的重逢。

这场聚会来之不易，但也顺理成章。一切都是因为力奋兄的一张照片。我为此写了首诗，他说要一个手抄稿吧，他想留一些笨拙的东西。然后他就觉着可以搞点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就有了 Press 的这个故事。或许因为我们都有些年纪了，开始回忆起往事来了。还好，我们也确实有不少东西可以回忆，就怕老了，回想过去，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这一场活动之所以可以一呼百应，完全是因为那个曾经的八十年代和那个年代的复旦诗社。而这一天的复旦诗人，几乎囊括了天南地北，世界各处。上百个人都是为了曾经的复旦、曾经的复旦诗社和曾经年轻的自己。

许德民、孙晓刚、邵璞、张海宁、李彬勇、傅亮、李鸿冰、赵月樑、杜立德、刘原、甘伟、韩国强、杨宇东、徐沪生、陈先发、肖水，等等等等。这些手稿展出现的名字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当然他们的诗歌作品才是他们名字的真正代表。这些复旦和社会上的爱诗者，都是为着自己曾经的梦想而来。他们自己的梦想也许破灭或者远去了，所以他们想在时隔二三十年后来这里圆梦。我看到下边苍老的容颜上真诚且年轻的过往。世界变化太快了。诗人当道和商人当道也就是一瞬间，而现在或许是金融投资家的天下。我们



▲ 1982年复旦诗社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许德民、胡平、沈林森、孙晓刚，
后排左起：汪澜、张真、曹锦清、景晓东、周伟林、韩云

想乞求诗歌归来，也许就违背了哲学和自然。

不过，我还是固执地按下了重启诗歌之键。就是因为当下的复旦诗社还有那么些许生机值得我们努力。21世纪的复旦诗社，用它自己的方式生存并成为当今大学中的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是因为我也孤陋寡闻，却藕断丝连。

梦想诗意地生活着。其实这只是一个梦想。复旦诗社和延续到今天的复旦诗梦，真的只是一个梦想。

梦想，不是也很好吗？但愿复旦一直有诗，我们的青春有梦。或许这就是这场策划已久、如约而至的诗会的初衷。看看照片上我们忘情的笑容，复旦人就吟诵了一切。

诗与手迹

□ 文/张力奋

这个手稿展，起于一念。年末某晚，重读一首喜欢的诗，突然忆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读书时的校园诗人来。几个月后，曾任复旦诗社社长的杜立德看到一张我拍的黑白照片，起兴配了首诗。我当即让他手抄一首送我，留作纪念。这应该是这个手稿展的源头。

当年在复旦，我也爬格子，但不敢写诗，至少从没公开。最多在日记里，暗自摆活几行意象，夜深月明时做诗人的梦。那是八十年代，锈迹斑斑的国门刚重新打开，日常生活物资仍匮乏，粮票布票油票蛋票，票证通行，一切均配给供应。但更饥饿的是思想。大学里，我们的想象力与荷尔蒙在诗歌里孕育。万千宠爱，集于诗一身。

那个年代，诗最神圣，甚至溺爱诗人。我们敬畏诗。即便不写诗，也抄诗、读诗、买诗集，追捧诗人。那晚，我忆及的不少复旦诗人，就在“申报馆”这个手稿展上。

我向来有手稿情结。十多年前，我开始感叹，人类是否会很快陷入“无手稿时代”，那个称为笔迹的东西会抛离我们而去。其实，是我们遗弃了手稿而不自知：电脑输入、联想功能、无纸办公、语音留言、语音识别，最后我们终于提笔忘字。在互联网的伊甸园，我们遍尝鲜果、禁果，慢慢抹掉手稿的存在。

对手抄诗稿的请求，诗人们反应不一。好几位感觉为难。有的说，自己字不好。很多年没写字了，已难提笔。有的报告说，家里找不到纸。一位学长留言

“忽然发现家里竟无水笔，今天买一只交作业！”这几个月，我又回到编辑的老本行，催稿是专业，隔三岔五骚扰，直至他们“彻底就范”。

许德民是“文革”后复旦诗社的首任社长，帮我搬动了好几位诗友。邵璞交作业最早。除了诗，他字画也好，才敢胆大妄为，当年写出“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杨宇东曾任诗社社长，上交出上世纪在校时诗稿笔记本中的一页。他翻箱底还找到徐沪生一页诗稿、一篇未署名的诗论。它们是展览中不多的几件旧物。据宇东考证，诗论的作者应是中文系88级张青同学。可惜，张青因病去世已十多年，中年夭折，仅留下令人唏嘘的笔迹了。

笔迹，有情感与肌肉的记忆，会萌芽、发育、生长，成熟，最后力衰老去，颤抖中随生命消逝。有手稿的年代，我们看着笔迹变老。

这里有二十多份复旦诗人的手稿，他们都已年过半百。按当年入学的年份，他们是：周伟林、韩云、孙晓刚、张海宁、刘文祥、许德民、李彬勇、邵璞、沈林森、华彪、傅亮、朱国宏、李泓冰、杜立德、刘原、陈先发、邵勉力、甘伟、韩国强、施茂盛、杨宇东、徐沪生、张青。

诗是远方，笔迹与手稿也是。这个小展，放在中国近代新闻业的殿堂之一“申报馆”，是念想与怀旧，也为渐行渐远的手写时代叩个响头。

中国的方块字很美，书写更是。在手迹退隐之前，我们在这里找回自己。📖

致敬“老年轻一代”

□ 文/陈艾可

那天午后，申报馆二楼，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我迟到了，目光流年间，诗兄荣哥坐在最后，他招招手，我走过去，他向右挪挪，留出小半个凳子。整个朗诵会我与荣哥斜依分享一个吧凳，任碎花长裙洒满一地。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那种诗意、浪漫的整体氛围中，读书、读诗、写诗是自然而然的事，照亮了那一代人的爱情与前路。大学时代我却把精力全部倾注到恋爱上，没有切身参与到校园诗歌运动的浪潮中，只是独爱欣赏那些诗歌朗诵者的声线，多过欣赏校园诗人们创作的诗歌本体。谁曾想到三十年后，我这个理科生，一不小心成为上海书展签售复旦第一位“新鲜诗人”呢。

《复旦人》记者雪平采访我时写道：诗集《三月》的缘起要追溯到“蓝精灵”合唱团。这个主要由80年代校友组成的合唱团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写诗，至少一半人还会写古体诗，余者属于能读诗之列。艾可本属于能读诗的人。“但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诗意气场中，凭着一股冲动去尝试写首现代诗的确是个大概率的事件。”……第一首《致晶荷》在微信群中传到从不轻易发表评论的复旦诗人傅亮那里，他当即公开给艾可打了“一百分加三十分”，而且，就像多年后忽然发现，在复旦80年代学生里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如此天然生成的女诗人，令人兴奋和惊奇，当然要大加鼓励与发扬。复旦诗社第四任社长杜立德也鼓励艾可：“写诗的冲动是最宝贵的，一定不可以错过它。”

复旦诗人走过三十年，偶语诗书、穷经皓首，自是不言而喻；复旦诗人走过三十年，强大场域、愈久弥坚，吸引众多像我一样的大白晚鸟，学着在文艺水域里扑腾、展翅、飞翔。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社会演变，包括四个童年阶段、一个青春期阶段和三个成年阶段。每一个阶段应完成特定的任务。

80年代复旦诗人们在其中两个成人阶段如何演绎呢？

成年早期（18~40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埃氏认为只有具有牢固的自我同一性的青年人，才敢于冒与他人发生亲



▲ “老年轻一代”合影

密关系的风险。埃氏把爱定义为“压制异性间遗传的对立性而永远相互奉献”。我依稀看见年轻的诗兄们，子而立淋湿在《黄梅雨季》，只为了《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我伸手触摸那些单薄的身影，像风像雾穿过《生命树》，披着《女人的翅膀》勇敢无畏《月光下暴露自己》……

时间走到了成年期（40~65岁），我称之为“老年轻一代”，埃氏认为该阶段是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没有生育感的人，其人格贫乏和停滞，是一个自我关注的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这是一个人对下一代的关心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人们将获得关心和创造力的品质。一年前，我在自创平台“退休之后”中曾阐述：“老年轻一代，或已经退休，或走向退休的路上，或期待退休。年轻态，同理心。退而不休，瞻望未来，助人自助，创造价值。”的确，关心和创造力赋予了复旦老年轻的诗人们，责任的担当、传承的赋能、生活的激荡，还有父爱的柔情。在复旦，他们是老年轻一代的典型群像之一。

我经常喜欢对自己说，要把时间和生命浪费在喜欢的人和事情上。那天朗诵会结束，我走出申报馆，夜色已深。真正的情感此刻才开始弥漫开来。就像初恋，心中一凛，内心某些情结被撩拨。朗诵会，仿佛搭建了一个个暗号接头的场合，让某些生命里有着接近、或者类似东西的人互相寻找，并且找到彼此。这个初夏，特别快乐、特别骚动。真是浪费的好时节啊。📖

八十年代复旦詩人手稿展

己亥年春 鄭志列題

长安客

致敬豪情犹在的
80年代复旦诗人

□ 文/陈艾可

没有吉光片羽的往事
没有缠绵悱恻的愁绪
没有皮里阳秋的矫情
没有天马行空的孤傲

笑容依旧
当年油墨纸上的诗歌
如今
煎熬在浓郁西北的油泼面里
肆意摇滚

满手余香
当年3108教室的吟诵
如今
消磨在稀松平常的肉馍里
芬芳烂漫

白发繁星
当年校园诗人的光环
如今
洒落在金黄亲民的小米粥里
豪情万丈

都市里的长安客
餐桌上的哲学家

复旦人 发展基金

坚持原创 忠实记录

为加强并增进母校与广大海内外校友的联络与沟通，展示校友风采，传承复旦精神，汇聚力量，支持母校建设和发展。自2009年起，复旦大学校友会与复旦大学对外联络与发展处创办了面向全体校友、师生及各界友人校友刊物《复旦人》。

至今《复旦人》杂志已走过整十个年头，累计发行17万册。《复旦人》每年编辑、人员和发行等总费用为60万元人民币，杂志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广大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为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准，扩大赠阅量及出版发行《复旦人》衍生的系列丛书，特设《复旦人》发展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专业化采编、队伍培养、扩大赠阅范围、出版《复旦人》丛书等事项。截止目前《复旦人》已获捐赠413536.8元。

捐赠本着自愿的原则，建议为**100元/年**，捐赠者将获得赠阅全年《复旦人》，以及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证书，捐赠者姓名将登在《复旦人》杂志、复旦大学校友网及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网站。

《复旦人》发展基金捐赠名单 (2019.5.1-2019.10.11)

- | | | | |
|-------------|-----|-----|-----|
| 柳文龙 | 肖鹏 | 汤喜友 | 刘书伦 |
| 天津市群马商贸有限公司 | | | 刘隽 |
| 胡景钟 | 庞浩鹏 | 谢学泓 | 徐子璇 |
| 马恩祥 | 唐兴霖 | 胥雪瑾 | 杨家宽 |

捐赠办法

扫码捐赠：



银行转账：

人民币 (RMB) 银行转账
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帐号：4572 5923 3986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复旦大学支行
网点联行号：104-2900-0505-3

美元 (USD) 银行转账
Tax ID: 98-0483202
Account Name: Fudan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686 718 995
Bank's Name: Chase Bank
ABA Number: 021000021
Bank's Swift Code: CHASUS33

港币 (HKD) 银行转账
Account Name: Fudan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012-875-1-134176-5 (港币)
012-875-9-232765-0 (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Bank's Name: BANK OF CHINA(HONG KONG) LIMITED
Bank's Swift Code: BKCH HK HH
请注明”姓名+手机+捐赠项目”

现场捐赠：

请至复旦大学（邯郸路220号）一号楼117室办理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3:30-17:00
联系电话：021-55664929/55664307





复旦大学校友会
Fud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复旦大学对外联络与发展处
Department of Liaison and Development,
Fudan University